

# 炎黄春秋

3

1998

总第72期



胡耀邦倡导“四不主义”  
项南生前一次心迹的表白  
李庄：“帮文风”留给我带血的记忆  
成仿吾千里状告张国焘  
乐氏家族与三百年老店同仁堂  
罗素20年代预言中国未来  
清初震惊全国的虚捏垦荒案  
张光直自述台北“四·六”蒙难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新春联谊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戊寅年迎春联谊会，在文津俱乐部举行。应邀出席的在京顾问、理事、会员及有关单位朋友二百余人。详细报道见67页。

←会长萧克莅会向大家致意  
↓联欢会会场之一部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镗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  
戏楼胡同1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72452

64031144 转 2191 或 2004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M

出版日期: 每月 8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 价: 4.80 元

## 专 稿

- ②项南生前一次心迹的表白 ..... 项 南

## 春秋笔

- ④胡耀邦倡导“四不主义” ..... 朱晓青  
⑧忆周总理 ..... 于光远  
⑬共同战斗中的周恩来与张太雷  
——纪念两位革命家的百年诞辰 ..... 钱听涛  
⑱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 ..... 刘青等  
⑳乐氏家族与三百年老店同仁堂 ..... 李 仁  
㉔“文革”中“帮文风”留给我带血的记忆 ..... 李 庄

## 英杰谱

- ⑳项南之父项与年的传奇生涯 ..... 许人俊

## 殒星篇

- ⑳项英遇难调查实录 ..... 王春江  
㉔成仿吾千里状告张国焘 ..... 汤胜利

## 遗闻录

- ④①公审南京大屠杀罪魁谷寿夫目击记 ..... 金光群

## 人海浪

- ④⑤南开大学元老黄钰生教授 ..... 申泮文  
④⑥我在台北“四·六”蒙难经过 ..... 张光直  
④⑦蒋百里和他的“五朵金花” ..... 蒋连根

## 时代风

- ④⑧自发起草农业法的农民费桂龙 ..... 汤家厚

## 文荟园

- ④⑧邹韬奋和几位名人的交往 ..... 黄侯兴  
④⑦我和艾青的师生谊 ..... 丁 帆  
④⑦勇敢的义举, 勇敢的创作  
——评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 张黎群

## 他山石

- ④⑦罗素 20 年代对中国未来的预言 ..... 邱健国

## 两岸情

- ④⑦爱国思乡织锦诗  
——记“千联斋主人”谢鸿轩 ..... 郭静洲

## 古今谈

- ③人贵有自知之明——从两副对联想起的 ..... 叶笃庄  
④⑦琦善所为的另一面 ..... 李文林

## 古镜台

- ④⑦清初一震惊全国的虚程垦荒案 ..... 谭特立

# 项南生前一次心迹的表白

● 项南

编者按：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项南同志，因心脏病突发，于1997年11月10日不幸逝世。他一生刚直不阿，注重实际，敢说真话，去世前不久，还有一次同友人探讨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大事的赤诚谈话。这里发表的就是他的这次谈话的摘要。题目为编者所加。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作的报告，最大的特点，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有方向，有形象，旗帜鲜明。有关经济领域的论述，有理论，有深度，因而很有说服力。我国国情，是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超越了就要犯错误，走回头路。发展经济要看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更不能说股份制等于私有制。这些都是理论上的突破，解开了多少年来国有大中型企业搞不好的死疙瘩。报告对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国防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也都体现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精神。这是一个跨世纪的报告，可以管好多年，引导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我党全部历史，是一部辉煌灿烂的历史，但也犯过极其严重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为害最烈的是“左”，而不是右。我国知识分子，极大多数是好的，有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我们党应当为他们营造一种宽松、宽容、宽厚的氛围。不要给提不同意见的人，随便冠以右倾、右派、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这样做的后果，是永远落后，葬送现代化。

共产党员要光明磊落，有不同意见，可以说，可以写，也可以保留，但不能搞小圈子，背着大家写一些同党的路线唱反调而又不具名的文章。这些文章，以“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放肆地反对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人们已经有能力识别谁伪装革命，自以为是，动不动拿棍子打人。

坚持正确的新闻导向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并行不悖的。新闻媒体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在宣传鼓舞我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敢于揭露我们消极的不健康的现象，是一个政党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揭露这些腐败现象，其目的是要纠正它，制止它的滋生发展。报道不实，不能取得人民

群众的信任，而且会助长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的坏风气。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指出，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点十分重要，十分及时。这也是根治腐败现象，取信于民、长治久安必不可少的条件。现在应当尽快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党的议事日程，进一步加以具体化。

反腐败，一直是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关注的热点。当前反腐斗争，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不能只反下不反上。有的人超标准装修房子受到党纪以至撤职的处分，这是理所应当的。但传说有些负责人用更多的公款装饰豪华住宅却受不到谴责或处分，而往往这种人反

贪反腐的调子唱得比谁都高。二是警惕有人改头换面搞特权。他们自己不出面，叫儿女亲属炒股票，做房地产生意。这些儿女们利用父母的特权，一夜之间可以获取多少万元的暴利。对省市以上在职领导干部亲属做这类生意的问题，似应及早做出若干规定。

维护党中央核心领导的团结，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国家安定团结，繁荣昌盛的根本保证。唐朝的大诗人杜牧总结的历史教训，仍有现实意义。他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六国也。”党的兴衰成败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领导核心。

（责任编辑 舒元璋）

# 人贵有自知之明

## ——从两副对联想起的

● 叶笃庄

清代大学问家袁枚（1716—1797），诗、文俱臻高峰，著有《随园全书》，享盛名50年。他在江宁城西小仓山建造了一所别墅，名“随园”，故址在今南京市北。在随园内的一处书斋挂了一副对联云：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这是一副集句联，上联见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下联出自《左传》昭十二年。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是传说中的我国最古书籍，谁也没有见过，也可以说根本没有这些书，只是伪《孔安国尚书序》曾经提到过“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袁枚如此标榜自己，未免有些自负自傲，自吹自擂。

当时集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于一身的汪荣甫得知袁枚挂了这样一副对联，大不以为然，乃写信约袁枚一叙，届时袁枚避而不见。于是汪先生便对袁府书童留下话转告：“你主人回来，请把他读过的坟典索丘借我一阅”，说毕扬长而去。等到书童把汪先生留话如实报告之后，袁枚感到非常惭愧，便把那副对

联摘下来了。可见袁枚尚有自知之明，听得进别人的批评意见。

无独有偶，宋代大文豪苏轼，少年时读了一些书，自以为了不起，不知天高地厚，在门前竟贴了一副对联云：

识遍天下字  
读尽人间书

有一天，一位白发老翁路过东坡的门前，看到这副对联后，便把他叫出来，拿出一本小书向东坡请教，其中尽是难字、僻字，东坡从来没有见过，当然不认识了，他顿时觉得羞愧难当，深悔狂妄自大，马上在那副对联上加了四个字：

发奋识遍天下字  
立志读尽人间书

可见东坡也有自知之明，且知过必改。因而苏、袁这两大学问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个人的事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事亦莫不如此。《左传》有过这样的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就是说，禹汤有自知之明，能够接受批评，严以律己；自己有病，听从医嘱注意吃药，所以“勃然”兴起。而桀纣却缺少自知之明，不接受批评，不能自律，只责罪别人；自己有病，却叫别人吃药，讳病忌医，所以“忽焉”灭亡了。

以上两幅对联是我在私塾读书，塾师张树和给我讲“对对子”时所举的范例。至于是否确有其事，我没有做过考证，张老师也没有讲过它们的出处。不过我以为，这是讲故事，而不是讲历史，无须也不必做什么考证。但是，知过必改、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思想品质，却是每个有自尊自爱的人所必须具备的。

# 胡耀邦

## 倡导“四不主义”

● 朱晓青

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康生就插手中央党校，干了很多坏事。“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伙同林彪、江青、陈伯达变本加厉地残酷打击迫害党校的同志，弄得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中央党校成了重灾区。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校长，副主席汪东兴兼第一副校长，胡耀邦同志任副校长，实际主持日常工作。

胡耀邦受命于历史大转折的时候，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任务艰巨。当时客观形势要求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有胆有识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中央决定把复校后的中央党校办成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胡耀邦以身作则地坚决贯彻中央这个决定。同年8月，复校后的第一期开学，他就郑重地向中央党校的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宣布，我们在教学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中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校内研讨问题一定要畅所欲言，讲真心话；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顾虑重重，不要讲违心之言。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学好理论，提高认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党性。为此，我们除了要真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外，还要加一条：不装（档案）袋子。这就是很快为人们所喜闻乐道的胡耀邦提倡的“四不主义”。

这个“四不主义”显然很有针对性，它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中有过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优良传统；使近几十年

来的“言者有罪”、“以言定罪”、“按思想划阶级”等等“左”得吓人的错误，能够得到拨乱反正。但是，由于那些“左”的错误为害时间之长、流毒之广、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破坏之大、对受害人造成的创伤之深，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所以，我们不能设想胡耀邦一宣布“四不主义”，大家就相信了。中央党校的学员和工作人员中多数是老同志，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以后历次运动中，不少人吃过“钓鱼”的亏，“言者有罪”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无怪有的人说：咱们中央党校即使现在可以实行“四不主义”，可以不装（档案）袋子，但不可能不装进脑子。如果政治气候一变，来一个什么“最高指示”，让大家凭着回忆，互相揭发检举，“错误言论”材料一凑就出来了，我们还会挨整。所以不管你胡耀邦同志出于多么好的用心，我们实在是难免心有余悸。

胡耀邦说：同志们心有余悸，实际上是心有余毒。被过去党的“左”的错误做法整怕了，这个余毒未尽，是可以理解的。但同志们应该相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得到拨乱反正，过去那种随意整人的“左祸”很难再生（当然不是说不会再生）。大家应该相信党、相信群众。同志之间、人民之间如果连真话都不能讲，还谈得上和衷共济、团结一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吗？

由于耀邦同志大力提倡讲真话，中央党校校园内很快出现了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当然，一个民主的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形成，



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纠正一种积习已深的错误作风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1978年初，某省来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个厅局级干部，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联系自己工作的实际，在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了他所在省的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问题。这本来是理论联系实际，敢讲真话的好作风，是应该提倡的。可是与他同来学习的另一位带队的同志，写信告诉了该省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很恼火，便对这位讲真话同志的妻子说“你老公在中央党校讲了些啥，他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实际上是警告他“不要讲真话”。果然，这个妻子就写信劝告丈夫：你在中央党校埋头读书，好好学习就行了，不要管闲事，特别不要对省里工作说三道四，能保住你的职位就不错了。这件事被中央党校领导同志知道了，当时校委负责人冯文彬在全校学工人员大会上公开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们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是关系到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大问题。今后谁再这样搞，我就要请中纪委来检查（当然也包括那位省委负责人）。”从此，学工人员更加相信胡耀邦代表中央主持的中央党校是真心诚意坚决实行“四不主义”的，是真心实意让大家讲真话的，大家应该同党一条心，为了党的事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段时间，中央党校的民主空气很浓，大家思想也非常活跃，学习的收获也特别大。

中央党校学员杨廷贵 1977 年 11 月 11 日在小组讨论会发言，认为中发〈76〉四号文件是

“四人帮”的思想；1978 年 4 月 10 日，他又在小组会上发言，评关于三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1978 年 4 月 20 日，他写信给华主席和政治局各委员。他说：

华主席党中央指示，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旗帜，讲的很对，我坚决拥护。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不是毛泽东思想旗帜，没有弄清楚，甚至有些话前后矛盾，无法理解。

如 1977 年 3 月，华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的来看，讲的很好。特别是抓纲治国几项措施讲的很实在，但第三个问题中有些话矛盾较多，不好理解和执行。如华主席说，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的决策，必须维护；凡有损于毛主席的言行必须制止。请问，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党中央作出两项决定，说是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并且报上用通栏标题“坚决拥护中央的两项英明决策”，宣传了几个月，几乎党内外、国内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算不算毛主席的决策？怎么维护？讲话中又说：“中央准备在适当时间叫邓出来工作。”既要肯定和维护天安门事件两个决定，又要准备叫邓出来工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讲话中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决定的，是要批的。但“四人帮”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中发〈76〉四号、五号文件精神，批邓另搞一套。请问，既然是毛主席的决策，为什么不批，不反击了呢？“四人帮”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四号、五号文件精神，批邓另搞一套，如果不违背四号、五号文件精神，又该怎么个批法？怎么个反击法？四号、五号文件难道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旗帜吗？粉碎“四人帮”半年多，还那么讲对吗？

讲话中说，“1976 年 4 月，少数反革命在天安门制造反革命事件，……1977 年 1 月，少数人在天安门贴出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请问，天安门事件究竟是少数反革命制造的，还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制造的？天安门事件的性质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1977 年 1 月少数人在天安门贴大字报，发表演

说,既然是攻击中央负责同志,那当然是敌我矛盾,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公安局抓了没有? 攻击哪个中央负责同志,谁代表中央? 吴德同志在天安门的广播讲话有严重错误,激起群众公愤,将近一年时间,吴德不作自我批评,群众提出意见,就说是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我看这顶帽子可能大了点。

华主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讲的很好。但引用了四号文件中“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段话删掉就更好,更全面。这句话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但它提出的问题和回答的问题的实质是讲党内有个资产阶级。这句话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谈不上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请问,搞社会主义革命,战场都在共产党内吗? 共产党内确实有一个资产阶级吗? 毛主席关于走资派是一小撮的基本原理过时了吗? 那段话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能讲通吗? 我看不用它更好。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严肃性、纯洁性,我再次建议收回四号文件,全部销毁,再不传播。把毛主席讲的,而且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部分,由中央重新整理一次,正本清源,挽回影响。对中发(76)五号文件,也应作相应处理。这样做,对毛主席、华主席的威望,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要不,若干年以后,翻出这两个文件来,许多问题不好讲。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日月里,伟大领袖毛主席身得重病,工作困难,更不可能作具体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主席对全国情况掌握不全不准,在情理之中,完全可以谅解。这期间,中共中央曾下发了不少有错误的文件。在制定和讨论中,政治局委员没有表态吗? 没有说过错话吗? 如中发(76)四号文件、五号文件有不少提法和观点根本站不住脚,甚至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你们还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造成很大混乱。政治局首长没有责任吗? 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根据什么事实和理由,也是正确的吗? 事

到如今不作自我批评,请问政治局首长,你们怎样恢复和发扬党的自我批评传统作风呢? 特别是吴德同志的广播讲话,全国家喻户晓,影响极坏,事实证明有错误,至今不向群众作自我批评,这种顽固态度符合毛席东思想吗? 我看越拖越被动。

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说了错话,作了错事,造成损失,就应承担 responsibility,作自我批评。否则就是特殊党员或党性不强,有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了,检讨了,改变了,群众仍然是欢迎和信任的。否则,欠了一笔帐,群众是不原谅的。”

杨廷贵的发言和信,说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实在难能可贵。

应该说,从全国的大气候来讲,还是在胡耀邦等同志组织和发动、得到邓小平、陈云、罗瑞卿等同志支持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解除了“两个凡是”的理论武装,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才真正从禁锢思想的“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此时,中央党校实行的“四不主义”才在全国各级党校中程度不同地相继仿照实行,蔚然成风。

1978年12月29日,中央党校二部一支部学员王立本写了一封信给华国锋主席。它的主要内容是:

听了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精神以及你和叶、邓、陈诸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真叫人鼓舞! 对于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全会公报说:“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为此,特向你反映我看到的一件事。

我们曾经参观了北京市一个机械化养猪试验场,场领导和职工兴奋地向我们讲了 you 关心人民生活,亲临该场视察和题词的动人情景,我们深受教育。

在该场的会议室内,看到了广大职工对你的热爱,故将 you 在那里用过的物品,如热水瓶、茶杯、椅子等,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厨柜中。这种爱戴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这种形



式,事后一直在我的头脑中打转,有没有必要?不知你到过的基层单位,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形式?今后你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也都摹仿起来,在人们的精神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这种形式,我认为不利于恢复、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形式,要是真的成风,如遇有地位的大唯心主义者赫鲁晓夫,经过他的利用和发酵,就有可能发展到从人变成“神”,把人民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封建关系,借此来破坏民主生活,镇压革命者,进行他的卑鄙勾当。再者,凡是你到过的基层单位,假若都把你用过的物品陈列起来,数量也是可观的,实在是一种浪费。我认为将你在视察工作中用过的物品,让它在人民群众中继续使用,会使人感到平等,精神解放,而且又发挥了物品的应有作用。

我建议,从今以后,对健在的党、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不要用这种方式表示敬爱,可以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成就。今后,各级党组织,如遇此事,应说服群众。

胡耀邦说,华国锋主席接到这封信后,于1979年1月16日复王立本同志一信。主要内容是: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试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二部学员结业会上讲话时,讲了这件事情的全部经过。他说:华主席批复的王立本同志的这封信,很好。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内还有哪些封建作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的?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是宜早不宜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要讨论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叫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十二条准则》。这些年来,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全,许多歪风邪气可得要下决心把它压下去。今年,我们正碰着建国三十周年纪念,中央已经说过了,不要搞大规模的庆祝,特别是不要搞形式

主义的东西。过去我们把那么多的钱花到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上去,什么莺歌燕舞,粉饰太平。

胡耀邦说,我们许多老同志,可不要忘记过去艰苦奋斗的传统,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提倡实事求是精神。我们许多同志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都记得,我们党是艰苦奋斗的,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是实事求是的,党内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一套是非常好的。这十几年来,林彪、“四人帮”在这些方面的破坏非常严重。而我们有许多同志对这些破坏所造成的损失,遗留给我们的麻烦,给我们带来的困难,估计不足。实际上,我们还要再花好几年,甚至更多时间,才能把局面扭过来。

胡耀邦语重心长地对参加这次结业会的学员说:“我们经过学习,从中央党校毕业出去,担负着两个责任,也就是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上所讲的,第一是应该成为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对个人来讲就是成为坚强战士;第二,应该成为坚决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我觉得王立本同志的信之所以可贵,就贵在这个地方。他看出那些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的东西敢于提出来。我们需要这种作风,需要这种勇气。所以同志们临毕业的时候,我觉得华主席批回来这封信很及时,你们可以从中得到教益,把这个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我们有许多事情不要只停留在口头上,只讲不干,只说一说,不准备实行,这就不好。如果这样,讲得轻一点,叫口是心非;讲得重一点,人家会叫你两面派。我们学马列主义理论也好,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也好,都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是真干不是假干。

胡耀邦同志不幸逝世已经快九年了,他为党为人民所做的许许多多好事,并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人淡忘。他倡导的“四不主义”,他让大家讲真话,他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一桩桩、一件件事情,今天和今后还会深深地被人们怀念,被大家学习。

(责任编辑 舒元璋)

# 忆周总理

● 于光远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总理生前,我同他老人家有过多次接触,在一段时间内,总理曾直接领导过我工作。总理的音容笑貌、平易近人、远见卓识、忘我的工作精神,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在他诞辰百周年之际,特撰写短文,表示我对他深切的怀念。

## (一)在太原听周副主席演讲

我第一次见周恩来是在1937年8月上旬,地点是太原。

抗战前,我在北平民先总队部负责组织工作,“七·七事变”后党组织决定我离开北平到保定设立临时总队部,与全国民先联系,而原先总队部的队长李昌等在北平坚持工作。到保定,彭真同志要我把临时总队部迁往太原。于是在8月初我就在太原建立起民先临时总队部。我当临时总队长,并开始工作。就在这时候,八路军开始从陕甘宁边区过黄河向晋东北与河北察哈尔接壤的地区开拔,部队要经过同浦路太原车站,但不在太原停留,战士们只是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休息一阵,吃点东西,接受群众的慰问之后,就继续北上,因此在太原城内除了首长的警卫外,看不到一个八路军战士,只有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在太原城内停留,他们要同国民党山西当局接触商量事情。

在太原城内的几个革命群众团体,其中包括我们民先临时总队部和山西省地方队部,得知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别的几位将领正在太原城内,就决定联合起来邀请他们向太原城内的群众发表演说。

这次演说完全是几个民间团体组织的,没有山西官方的人士参加,地点很可能是成城中学的礼堂。那个礼堂的舞台不大,观众只能站在舞台的两侧和台前。整个礼堂很小,没有座位,站着也只能容几百人。太原的群众尤其是青年听说周恩来演讲,都踊跃参加,尽管我们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那天到会的人仍有一千以上,礼堂挤得满满的,但是秩序很好。

演讲的时间是在晚上。那时日本飞机常去太原空袭,实行灯火管制,不敢亮电灯,而是在舞台的栏杆上点起几十支蜡烛,总算可以看出演讲者的容貌和表情。周恩来那时三十九岁,在长征时蓄起的长胡须已经刮去了,显得非常英俊。他讲的主题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在演讲中讲在山西当局的合作下,准备与山西当局和各界人士一起抵御日寇向山西的进攻。他声音宏亮,那时没有麦克风,但是他讲的话在礼堂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那次演说中有一段话,给我印象最深刻最强烈,那就是他讲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为了准备与日军作战,前一年曾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界,可是有人不许我们抗日,进行阻拦。而阻拦红军东进抗战的不是别的军队,正是阎锡山统率下的军队。讲到这里,周恩来提高了嗓门,讲“那时红军为了开到抗日前线,被迫同你们的阎司令

长官决一死战。”然后他接着讲现在形势变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八路军已来到山西，开往前线与日军作战，希望得到山西各界人士广大青年的支持，也愿意取得阎司令长官的合作，共同抗日。在我听他讲这样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就在“阎司令长官”统治下的太原，他这样尖锐鲜明地发表演讲，真有气魄，真能长我们的志气。他的演讲很神气，我们听的人也觉得自己神气了许多。

## (二)在武汉中共长江局机关

没有想到在第一次见周恩来后，不到半年，我就有机会经常见到他。

从1938年1月开始，我在长江局青委工作，周恩来是长江局四个委员之一，另外三个是王明、博古和凯丰。由于他不分管青年工作，所以同他接触不多。只有1938年7月有一天晚上，长江局讨论青年工作，我们青委的4个人都参加了。但是那次会议上周恩来似乎正在思考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多讲什么意见。汉口的夏天是特别热的，飞虫特别多，会议室一盏电灯下面挂有一个倒圆锥形的纸口袋。有趋明性的虫子飞到灯泡附近落进那口袋后就飞不出来了，那时就用这种办法来杀那些飞虫。我注意到周

恩来一边参加会议，一边下意识地捏那个纸袋，把里面的虫子捏死，在会议上我同周恩来的接触就是这么一次。

但是那时我见到周恩来的机会却是很多的。我虽是长江局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但同时兼民先全国总队部武汉办事处主任，经常住在武昌。因此到长江局机关受到吃客饭的优待。在长江局吃饭，随到随吃，座位不定，因此同周恩来在一张小小的四方桌上一起吃饭的次数不少。不过那时大家都很忙，都是坐下就吃，吃了就走。当然，在餐桌上并非一句闲话不说，周恩来没有要对我讲的话，因此在饭桌上的交谈，我一件也回忆不起来。

在长江局机关，我听过他一次讲话，那是在1938年5月1日晚上，长江局机关全体人员都集中在一间大厅里过五·一劳动节。吴玉章是1878年出生的，1938年他正好六十岁，那天晚上大家也就给他过生日。会上周恩来讲了一篇向吴玉章祝贺的话。吴玉章是参加辛亥革命的老革命，1915年组织勤工俭学活动，1925年参加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他当过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长征时吴玉章是五老之一（其余四老是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和谢觉哉）。周恩来讲对吴玉章的业绩作了简短的介绍。那个五一劳动节之夜，大家过得很开心。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和李富春、聂荣臻、郭沫若等招待出席全国科学规划会议的科学技术工作者

### (三)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

能够经常见到周恩来、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从1955年开始后的几年之中。建国后,周恩来对我国的科学事业非常关心。1953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一个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就强调了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就没有现代化工业的观点。到了1955年,中央要他主持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他对科学工作更加集中了很大的注意力。当时中央机关中专门从事管理科学工作的机构只有中央宣传部的科学处一个,我是这个处的处长。国务院讨论科学工作的会议我常被找去。我又是周恩来1938年在武汉长江局时他的部下,周恩来的记忆很好,一见面还认识我,并且知道我在大学中是学自然科学的。因此他经常把我找去,问我一些事情,也要我发表一些意见。我记得他曾问过我多次我国某些科学家的真才实学、科学家之间的团结的状况、苏联和欧美各学科科学水平的高低、哪些科学家应该早一些吸收入党、科学家对我们政府工作有什么要求等等。而且都是单独的谈话,使我讲话可以更自由些。为此,他几次专门要我去西华厅他的办公室。前两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曾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们在周恩来办公桌上的台历上看到他记有何日何时约于光远谈的字,要我提供材料。因为他找我的次数很多,西华厅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台历记的是日子谈的是什么,我没有法子记得清楚。因此文献研究室要我写的材料我一直没有写。很抱歉,日子一长,连他们告诉我台历上周恩来哪天约我谈话的信也找不到了。

1955年中央准备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时,同时起草两个文件:一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上的报告,一个是拿到会上讨论的《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议》的草稿。我主要参加起草决议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胡乔木执笔。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是彭真主持的,我和科学处的林润青执笔。决议的草稿当然要经过周恩来审阅,听周恩来的意见,讨

论周的报告稿时,彭真就带上我参加讨论。讨论报告和决议是我多次见到周恩来的一种场合。

关于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事,在知识分子会议前几个月就开始酝酿。周恩来一直关心并领导这个工作。最初这个工作决定要主持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总理李富春来抓,李也建立一个做具体筹备工作的范长江、于光远等十人参加的领导小组开始工作。关于制定科学远景规划这件事,我见到周恩来不知道多少次。原来开始布置制定科学规划时只考虑了自然科学方面的规划。有一次在周恩来那里开会,我提议同时也搞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规划,他听了立即表示赞成我这个意见,并且要我负责去组织这方面的工作。

在我国设立学位制的问题,国务院议论得很早。当中国科学院提出建立研究生制度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务院正式通过了一个条例。这个工作的前前后后我都了解。这件事应该看作是在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开始。接着又考虑在全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建立学位制度的问题。那时党内领导干部中对在我国搞不搞学位制度是有不同意见的,学者们倒一致赞成。在我参加讨论这个问题的国务院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听到的都是赞成意见。但是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却一直没有表示赞成。那时许多工作都学苏联,而苏联也有博士和候补博士的学位制度,不好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人认为有了学衔就没有必要再要什么学位。大概由于毛泽东对这一直没有表态赞成(后来,在文革前不太久,毛泽东明确表态说,搞学位是鼓励成名成家的个人思想,是错误的)。我看出周恩来内心是赞成搞的,但谈话很慎重。有一次他对我说:“于光远,你再说说看,搞学位制度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回答说:“这是确立一种学术水平的标准,授予什么样的学位表明这个人到了怎样的学术水平。建立这样一个标准,可以鼓励一个人在大学毕业之后继续努力为达到硕士、或者博士这样的标准而努力。”他又问我:“你算什么学位?”我说:“清华大学毕业时授我一个‘理学士’,这是最低的学位。毕业表明学完了大学里

该学的课程,从字面上没有说达到什么水平,因此再授你一个学位,表明你达到的水平。虽然大学毕业生和学士实际上是一回事,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问题。”周恩来说:“是呀!博士就不是什么毕业不毕业的事了,通过博士论文,就是看他是否达到博士的标准,是不是?”我说,“正是这样”。那次我又一次看出周总理是主张搞学位制度的。

1955—1956年,周恩来频繁地找我。他每天工作得很晚,有两次,在半夜十二点多还打电话到我住的地方,我在床上听到他的声音。

在他心目中,我还算一个搞管理科学工作的内行。当国务院建立专家局时,他就对我说,你也到国家专家局兼一个副局长吧。国务院专家局局长是由齐燕铭兼任,副局长是费孝通、雷洁琼和我。我们这三个人都是兼任的。后来又调来赵守攻担任专职的副局长。签有“周恩来”三个字的要我担任专家局副局长的聘书,我还一直珍藏着。

#### (四)1962年广州会议前后

1957年后,毛泽东强调“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八大路线只实行了很短一个时期就抛弃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使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不能正常地工作。可是在周恩来和聂荣臻领导下的科学技术工作,继续按照八大精神贯彻实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取得很好的成绩。到了1962年,对已经取得的成就进行检查后,聂总认为可以说十二年远景规划的目标提前基本完成,提出应该编制新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十年规划。这个看法取得周恩来的同意后,就作为“科学口”的工作方针确定了下来。我们先是在北京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工作,然后决定在1962年召开制定新的十年科技规划工作的会议。我又有一段时间同周恩来有直接的接触。

于是1962年春研究1963—1972科学技术第二个远景规划的会议就在广州举行。这个会到了许多地区和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许多科学

家,同时在广州召开的还有一个讨论文艺工作的会议。研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这个会议在羊城宾馆(现改称东方宾馆)开,文艺工作的会议在越秀宾馆举行。开会之前的一个多月,周恩来、陈毅、聂荣臻都去了,他们住在小岛。

在这个科学规划会议还没有正式决定召开之前,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同志在酝酿一个要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肯定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思想。与此同时,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材料,对中国知识分子作了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分析。认为工人出身或非工人出身但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上加入了共产党的,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认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都是少数,因此就是两头小。而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两者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广大农民出身和城市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以及一般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而没有觉悟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程度、站在农民等小资产阶级立场、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就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的几个负责人,早些日子就到了广州做会前的准备工作。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酝酿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事,我已经听说了一些。陆定一的材料倒是发给了我一份在北京看过。我不那么同意他的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特别我认为中国不存在代表农民利益的知识分子阶层。陆定一这个材料的观点与周恩来、陈毅的观点确有很大的差异,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在开科学规划会议的前一天,我们几个人去小岛拜望周恩来、陈毅和聂荣臻,陶铸这时候也在。周恩来一见我就问:“于光远,你见到定一同志写的那个材料没有?”我说“见到了”。他接着问:“对这个材料有什么看法?说说看。”这是明显地是因为我是中宣部的人,要我明白地表示自己的态度。我讲了不同意陆定一的这种分析方法,不过当时我也觉得一概脱帽加冕似乎也太简单了一些。周恩来对我的看法赞成,并在来到科技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也讲到了“右翼”。在陈毅对两个会

议参加者作报告时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得到大家的热烈鼓掌。

这是一场党内意见不一致的争论而且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事的意义后来我才看出来,不限于要不要脱帽加冕这一件事本身。1962年阶级斗争为纲气氛已经很浓,广州会议后不久到了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明确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广州会议本来想保护一下知识分子,可是后来终于没有做到这一点。

## (五)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我

1969年8月下旬,我从北京出发去宁夏的中宣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和等待结论。干校是一个专门的军管组领导的。经过两年半时间,到了1971年3月,军管组告诉我,我的问题基本上审查清楚了,不久后将宣布对我实行解放、恢复我的党的组织关系和给我应得的党纪处分。可是二十多天之后,中央办公厅派来一个家伙来到干校,凭着他的权力改变军管组原来作出的初步决定,他个人作主重新对我作出了结论和处理意见。对我的处理有下面五条(1)三顶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2)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3)开除党籍;(4)撤去原党内外一切职务;(5)行政级别从高干降为一般干部。

这个处理结论在干校大会上向我本人宣布后,我不相信这个决定会作数,但我也不能束手待毙,得想一点办法,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聂总,向聂总汇报了我的处境,陈述了自己的心情和要求,并请聂总转周总理“过目”。通过我的夫人,把我的这一封信送到聂总的秘书甘子玉,甘子玉给了聂总。聂总把我的信给了周恩来,是周恩来保了我。周恩来如何保我的过程,当时一点不知道,而且直到现在仍然不知道,不过从后来的经过来看,在干校时向我宣布的那五条没有作数。在四个月后的1972年9月,决定恢复我的组织生活。

## (六)悼念周总理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时,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悲痛。从1975年11月以后,邓小平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毛泽东在听了他的联络员毛远新的几次歪曲情况的汇报后,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那时还没有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因此我还是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在周恩来的悼念词中不准写进他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康生的悼词中却有这样的“桂冠”,这使我很不平。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铺天盖地开展起来。从3月下旬起,北京、南京、西安等大城市群众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在3月下旬开始,北京就有群众往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送花圈、挽联诗歌。这时候我所在机关——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批邓中的重点。我在中南海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机关里天天挨批。但是我在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有意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历史博物馆西门前绕行一周,看看自发纪念周总理的情况和每天的发展。晚上,我和老伴两次步行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趁天黑看不清人脸时,去看群众写的那些东西。幸而都没有被人发现、没有引起什么严重后果。1976年4月4日,当局派人到天安门清理花圈、挽联、开始抓“反革命”。5日早上,走过天安门,我照老规矩,在广场转那个圈子。那天以后的一些日子,我倒真有些担心,因为只要“四人帮”的爪牙中有人认出了我,像我这样一个在“邓记谣言公司”里当一名掌柜的人,就会加上很大的罪名。可是那一次侥幸没有出什么事。

隔了一年,“四人帮”粉碎后的1977年1月,在天安门又一次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也是花圈、挽联铺天盖地。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也用机关名义送了一个花圈去。这次我又去了,并且是在白天堂堂正正地去的。

(责任编辑 方实)

## 在五四运动的风暴中

周恩来 1898 年 3 月 5 日生于江苏淮安；张太雷同年 6 月 17 日生于江苏常州，同在大运河畔，一个苏北，一个苏南，是同乡。周恩来幼年嗣父母和生母早逝，生父转徙异乡，不得不依赖伯父抚养。张太雷八龄失父，赖寡母扶育人，饱尝艰辛。他们少年时代的生活遭遇也竟是如此相似。更加巧合的是他们都在五四运动前到天津读书，先后投入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

天津的五四运动与北京紧密相关，早期领导人是谌志笃、马骏、李毅韬、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及年龄较长的南开老师马千里，特别是马骏、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冲锋陷阵，一马当先。周恩来加入后成为主角之一。特别是 9 月间他将运动骨干 20 人组织成觉悟社，深入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1 月，“福州惨案”发生。天津又一次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潮，延续了一个多月。到 1920 年 1 月 23 日，因学联派人调查魁发成洋货庄日货遭到毒打而造成“魁发成事件”，斗争更趋尖锐。1 月 29 日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集合五六千人闯省公署。周恩来等代表被捕，重伤学生五十余人，酿成著名的“九一八九”（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流血惨案。周恩来被拘押五个多月，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到 7 月 17 日才宣判开释。这时天津代替北京成为北方五四运动的中心，周恩来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主将，至今留下了一本《警厅拘留记》，记载了这场五四运动最后一仗的斗争过程。

张太雷的情况不同，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已是北洋大学法科三年级学生。他在 1918 年夏天就参加过天津的爱国运动，即反对段祺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五四运动在天津爆发后，据当时北洋大学与张太雷不同科的同学、后来参加天津学联领导工作并成为“觉悟社”首批 20 个成员之一的谌小岑回忆：“1919 年 6 月 5 日天津学生抗议北洋政府拘捕北京学生，在南开大学操场誓师后出发讲演；6 月 10 日（应为 9 日——引者）在河北公园召开群众大会；8 月下旬天津学生到北京天安门请愿……10 月 10 日因警察干涉学生集会游行，学生包围警察厅通宵达旦，北洋同学在第二天凌晨赶回学校的途中，我都记得有张太雷参加。”天津《益世报》6 月 2 日也报道，天津学生曾组织了普通演讲团 30 个，特别演讲团 14 个，到塘沽、大沽等地进行街头宣传。报纸专门报道了北洋学生林汝植、陈汝良、李则昂、张曾让（张太雷在北洋大学学名）组成的第二团在塘沽和东西大沽成功宣传的盛况。可见张太雷的确是天津五四运动

# 共同战斗中的周恩来与张太雷

纪念两位革命家的百年诞辰

钱昕涛

中的一个积极分子。张太雷在五卅运动时期已是一个同情十月革命、初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分子。1920年10月后他在北京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被李大钊派到天津建立第一个团组织。1921年初就被派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派到共产国际的第一位使者，这时中共一大尚未召开。从上述情况也可以看出，张太雷确立共产主义信念早于周恩来；周恩来是1920年12月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对各种思潮经过反复学习、思索和比较才确立共产主义信念，并于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至于在天津五四运动中周恩来与张太雷是否相识，因无确切史料，也难下断语。从情理推测，周恩来是社会上都知道的后期五四运动领导者，张太雷应该知悉。但周恩来就不一定知悉这位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湛小岑在回忆中也未提及两人关系。

## 在大革命的洪流里

周恩来和张太雷在1920年10月和1921年初先后离开天津，分别到了法国和俄国。周恩来在欧洲近四年，1921年加入中共后又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创建者之一，并在1923年3月继赵世炎担任书记。国共合作后又创建了国民党旅欧支部。1924年9月周恩来奉调回到广州，10月被任命为广东区委委员长，又由于当时在黄埔军校工作的张申府向负责筹建黄埔军校的廖仲恺推荐，周恩来同时在军校政治部兼任政治教官。11月，军校政治部代主任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遂由周恩来继任政治部主任。在这四年里，张太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俄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后，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及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执委。1921年8月中共一大后他回国，参与筹备召开了团的一大，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以后长期是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又与马林、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参加了西湖会议及党的三大，成为国共合作的早期倡导者之一。1923年8月随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访问了4个月，以后留在青年共产国际工作，一直到1924年8月根据陈独秀要求才回国，分配担任《向导》编辑并到上海大学教授英文。到1924年底，张太雷已成为党内重要干部了。

周恩来与张太雷重逢是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四大”是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的。周恩来以旅法组织代表的身份与会（代表粤区的是谭平山、杨殷）。张太雷也是20个代表之一。周恩来应该在会上与张太雷相识了。但周恩来在会上的情况除了留下一则托京区代表高君宇带信给

邓颖超的史料外，其他都成了空白。大会以后周恩来回到广州，参加第一次东征，党内也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委员长由陈延年接任。中共四大以后，张太雷第一次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是5个候补委员之一，分管团的工作。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团的三大，被选为总书记。不久孙中山逝世，随孙中山北上的鲍罗廷于5月中回到广州。党中央调张太雷去担任鲍顾问的助手兼翻译，团中央的工作则由任弼时继任。

从1925年5月开始到1926年冬，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周恩来与张太雷在当时全国革命中心广东根据地共同战斗，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的考验。在党内，他们都是广东区委常委，周恩来是军事部长（军委书记），主要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1925年9月第二次东征后，他脱离了黄埔军校，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后来又担任第一军副党代表。他有时也在广州，主要在东江前线，平定陈炯明残部后又肩负建立东江地区革命政权的重任，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一直到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前夕才回广州。

张太雷作为鲍罗廷的助手和首席翻译，则坐镇广州，协助处理所有的重大事件。据当时在黄埔军校工作的中共早期党员包惠僧回忆：“他（张太雷）同鲍罗廷住在一起。鲍罗廷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指导工作，张太雷差不多都参与谋议。……张太雷的工作，不仅要写作，要制订计划，还要行动，因此他在工作中锻炼成一个机警、细致、勇敢、沉着的人。……张太雷见首不见尾似的、白天随鲍罗廷活动，夜晚为鲍罗廷搜集和整理资料。鲍罗廷订阅国内外报纸不下数十种，张太雷每天要摘要翻译出来，提供鲍罗廷参考，有时鲍罗廷遇有疑难问题或是有关中国方面的问题，还要被咨询。当时中共方面要同鲍罗廷会商的问题，也由张太雷负责沟通联系，所以他的工作是日以继夜。”包惠僧说当时公认的大忙人就是周恩来、张太雷，还有陈延年及1925年10月回到广州的毛泽东。

在这一时期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内，虽然由于省港大罢工及农民运动的兴起，第二次东征后陈炯明势力被歼、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形势是好的。但是港英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窥伺，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左中右派的激烈斗争，使得中国共产党、苏联的政治总代表鲍罗廷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仍面临着许多挑战。苏联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中共广东区委等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也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在这些斗争中，作为中共的两位重要人物周恩来和张太雷，他们的态度和认识都是基本一致的，



特别是如何看待当时许多人认为是中派的军事铁腕人物蒋介石，周恩来和张太雷头脑都比较清醒。在共同斗争中，他们的友谊日益加深。

例如：在省港罢工期间，“主要决策问题，或由延年、中夏、恩来、兆征、太雷、彭湃分别商量然后再与鲍罗廷顾问商谈，作出最后决定；或由他们与鲍顾问直接商量，研究对策。陈延年同志或广东区委的其他同志，白天忙于各项工作，通常多是在晚上到鲍公馆来，有时要商谈到深夜。太雷每次都参加，既当翻译，又参与商谈工作。”1925年发生沙基惨案的那一天，“广州群众和香港罢工工人七、八万人，在广州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周恩来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共约二千人去参加。”周恩来也亲自参加了游行，走到沙面，遭到帝国主义武装袭击，死伤数百人，黄埔学生就死难23人，受伤53人。当时蒋介石畏惧帝国主义，表现动摇。“蒋介石不仅没有参加集会游行，而且事后知道了，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应当游行示威。”

又如在如何对待西山会议派及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大时如何对待国民党内左中右派势力，共产国际代表的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主张退让政策，鲍罗廷和广东区委的同志则坚决主张反击。张太雷就是主张在国民党二大上要“首先来一个示威性的反击”。周恩来是在1926年1月二大前夕从汕头回广州的。他也主张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他在第二次东征中已感到蒋介石表面与共产党合作，实际却想限制共产党。当时一般人把汪精卫当作国民党内左派，蒋介石是中派，西山会议派是右派。周恩来则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但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不同意。在这次大会后蒋介石第一次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常委，以后又成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从此就由军校校长和一个军的领导一跃为国民革命军的全军领导之一，为他以后篡权开了大门。

至于如何对待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一手阴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上，周恩来与张太雷更是一致的。周恩来主张反击，把蒋介石搞下台。张太雷在事发前一天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广东革命危机仍在呵》一文，认为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不应麻痹，还有敌人。事变当天就对王一知说：“李之龙决不会叛变，这里面有鬼。”张太雷在3月底代表广东区委起草了《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两广人民的一封公开信》，指出这是一起阴谋，“共产党决计不因为敌人的造谣而放弃他革命的工作。”他还在《人民周刊》上登了一篇一周述评：《三月二十日戒严》，文中指出：

“广州三月二十日的戒严牵连及俄国顾问住宅与罢工委员会，惹起广东一般人民的怀疑，使许多革命党人发生消极的观念，并使帝国主义者及一般反革命党欣悦异常”。但这次蒋介石的阴谋活动终于因为当时在广州的从苏联派来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首的视察团及苏联顾问季山嘉害怕反击会影响中苏关系（当时鲍罗廷于2月4日离广州去北京等地“休假”，4月30日才回广州），中共中央也主张妥协，陈独秀派张国焘到广州，把广东区委的正确意见压制下去，否定了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的主张，接受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已公开的共产党员，周恩来也被免去了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陈延年气得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老混蛋”。以后周恩来把撤出来的干部集中在广州大佛寺办一个特别政治训练班，亲任班主任，张太雷被邀到那里去作形势报告。他们两人是一直密切协作的。

更严重的是5月15日国民党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一个《整理党务案》，限制国民党高级党部共产党员人数、不得由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要全部交出。这一次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屈从了。陈独秀派彭述之、张国焘来指导出席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通过了这个《整理党务案》。周恩来、张太雷都扭转不了大局，但周恩来仍指示在黄埔军校内部未公开的党员不要交出名单。张太雷写了《到底要不要国民党》一文揭露蒋介石。蒋介石6月28日在黄埔军校对学生发表“训词”，攻击了这篇文章。

##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

1927年7月，北伐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形势发展很快，到11月，武汉、九江、南昌都攻克，吴佩孚、孙传芳主力被打败，张太雷随鲍罗廷及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12月20日到达汉口，他在此工作了七个月。周恩来留在广东区委到年底才被陈独秀调到上海党中央任中组部秘书（实际代替部长陈独秀管全党组织工作）及中央军委委员。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势力急剧膨胀，右派面目日益暴露。先是反对迁都武汉，要求国民党中央迁南昌。武汉方面进行反击，3月中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强调党领导北伐军，大大削弱了蒋介石权力。蒋介石心中怀恨，自3月6日杀害赣州的工会领袖陈赞贤开始，从九江、安庆，一路杀到上海。这时中共中央正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打算配合北伐军攻克上海。周恩来是领导人之一，他已

预感到气氛不对。3月22日武装起义胜利，沪郊北伐军却按兵不动。30日周恩来在起义领导机构特委会上说：“将来他们（指蒋）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佣流氓。”但是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听不进，4月5日还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说国共要“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挥动屠刀，策划了“四一二政变”。6天后，南京反革命政府成立，下令通缉鲍罗廷、陈独秀、周恩来、张太雷等197人。陈独秀、周恩来等转入地下。4月15日左右陈独秀秘密赴武汉，周恩来为了处理善后，5月下旬才到武汉。张太雷在武汉，当时正在准备召开中共五大，他已从鲍罗廷身边调任湖北区委书记。中央委员大部分在武汉，天天与湖北区委、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已派鲁易于4月8日到武汉代替右倾投降的维经斯基，但后者暂时还未走）开会。上海发生政变，北京又传来李大钊被捕。鲍罗廷在一次集会上严厉批判蒋介石罪行，张太雷翻译时声泪俱下。武汉政府当时公布了蒋介石12大罪状并宣布他为反革命。当然由于对形势估计的差异，周恩来当时主张立即东征讨蒋，张太雷同意鲍罗廷、陈独秀的意见，主张进行第二次北伐。后一意见得到斯大林支持，4月19日武汉政府还是北伐河南讨奉了。

中共五大于危急形势下召开，从4月27日开到5月9日，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但并未为革命指出方向，对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仍抱有许多幻想。会后周恩来、张太雷均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大约于5月21日才到武汉。这时期湖北已发生夏斗寅叛变，长沙发生许克祥的马日事变，武汉的何键蠢蠢欲动，他们都是唐生智部下。6月10日、11日汪、唐、冯郑州会议，6月20日、21日蒋、冯徐州会议，武汉方面反共声浪越传越高。周恩来到武汉后已参加政治局常委工作。为了挽救危局，他与蔡和森一起提出一个在湖北、湖南发动工农群众，反对武汉国民党当局的建议，张太雷的湖北省委积极贯彻执行，但是不久即被鲁易否定，周恩来和他吵了一架。共产国际5月下旬后连发指示要求中共进行土地革命，组建革命军队，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这个指示罗易竟在6月1日给汪精卫看了。陈独秀右倾投降进一步发展，遭到包括周恩来、张太雷在内的中央政治局许多成员反对。从7月5日开始陈独秀就不再参加常委会，一时局势混乱。在这危急关头，鲍罗廷宣布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五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由张国焘、李维汉（原来常委三人，除陈独秀就是张、李）、周恩来（已参加常委工作）、李立三（原五大政治局委员，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张太雷（原五大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组成新的临

时政治局常委会代行政治局职权。从此周恩来、张太雷又在这个中国革命的最高指挥部共同战斗。张太雷到中央工作，湖北省委书记由罗亦农接替。

3天后即7月15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宣布“分共”，不久，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开始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新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没有被吓倒。决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但是依靠谁来反抗，在什么地点反抗，何时动手，一切都靠摸索。周恩来从六月开始就是中央军事部长，他知道当时在九江一带的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所辖的十一军二十四师是叶挺指挥，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是叶挺独立团的骨干编成的，当时在鄂东正向九江开动的二方面军二十军是贺龙的部队。贺龙虽然还未参加共产党，但六月份就向周恩来表示他听共产党指挥。开始大家对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还不摸底，但革命部队的力量都集结在九江及其附近，因此临时中央常委就派李立三以及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到九江找到叶挺、谭平山一起分析形势。7月20日他们会谈，知道张发奎也将“分共”，应把叶、贺部队快集中到南昌举行暴动。当时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都在庐山。据聂荣臻回忆是他上山把20日会谈意见向鲍罗廷报告，张太雷作的翻译。据李立三回忆是他与邓中夏上庐山向瞿秋白、鲍罗廷报告，张太雷也在。瞿秋白等都同意他们九江会谈的意见并且即回武汉向周恩来、李维汉、张国焘等汇报。不久鲍罗廷、张太雷也下山回武汉。因为接替鲍罗廷、罗易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助手诺伊曼等7月23日到武汉，在7月24日（或25日）常委开会，“罗明纳兹在会上传达了国际指示，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并且决定同意李立三等在九江会谈的意见，发动南昌暴动。26日周恩来就到九江进行部署。同时留在武汉的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罗明纳兹再举行常委会，罗明纳兹又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可把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撤往农村；俄国顾问不参加暴动。”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成员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暴动，责成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去传达。这次常委会还决定由瞿秋白负责，李维汉、张太雷、罗明纳兹等参加共同筹划立即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张国焘去传达这个决议后，遭到周恩来等强烈反对。8月1日南昌暴动终于爆发。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也在武汉举行。南昌暴动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决定了土地革命、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革命。周恩来和张太雷是参与这两次历史事件的重要领导成员。

八一起义时中央确定暴动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

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因此8月3日开始部队就南下了。八七会议上正式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周恩来、张太雷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南方工作时决定成立新的广东省委，张太雷自愿提出去广东工作的请求，中央任命他为广东省委书记。以后又决定成立以张国焘为书记，周恩来、张太雷等为委员的南方局，在周恩来等来到广东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成临时南方局，负责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党组织的整顿及这一区域内的暴动及一切军政事宜，也负责传达八七会议决议，并决定临时南方局和前委相遇时，前委即可取消。从此周恩来、张太雷又分处两地，共同为实现中央这一决策而奋斗。

周恩来率领南下部队于8月下旬在瑞金、会昌第一次打了一次恶仗后于9月5日到达长汀，稍事休整研究下一段部署后经上杭沿汀江进入广东。9月19日占领三河坝，即由朱德率领十一军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他及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直下潮汕。9月23日克潮洲，24日汕头光复。张太雷于8月19日秘密到达香港，广东省委时在香港，他立即向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广东暴动计划上报中央，9月9日中央批准后立即下达实施，同时准备迎接叶、贺南下部队。当时没有电台，周恩来、张太雷与中央均靠密写后派人送信联络，张太雷在9月20日向中央报告：“前方一直无消息，直到15日方见到前方派来同志，带有恩来一信，又因路上受湿，一字洗不出，只得其口头报告。”张太雷总算与周恩来联络上了。他于9月22日赶赴前方，通过汕头地委把潮汕铁路工人组织起来，连夜抢修铁路，加上沿线农军配合，使起义部队24日从潮州坐上火车攻下汕头，张太雷与周恩来终于相会了。张太雷立即向前委传达八七会议决议，又共同参加了在牛屠地召开的群众庆祝胜利大会。9月29日张太雷向中央报告：“我原来是决定到汕头后一二日即返港，但因此间同志硬留，南方局决定我担任书记，昨日小洋人（指苏联顾问——引者注）亦主张我暂留。他们要我留的理由是因为此间党已失重心，各干各的。平（山）、国（焘）二同志均为同志所不满，恩来忙×××难顾及党的工作。南方局昨天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加入立三及代英，以（罗）绮园做秘书，请批准。”不料正在这时大批敌人已悄悄袭击，于9月30日向潮汕猛攻，当夜黄昏潮州失守，10月1日我军仓促撤出汕头，退到普宁县流沙。3日所有领导人在此开了一个决策性会议，决定所余武装人员退到海陆丰去，非武装人员愿留者留，不愿留的就地分

散，到海口转香港、上海。会议未散，村外山头上枪响了，周恩来发高烧，由担架抬着，常处于昏迷状态。部队被打散时，身边只留下叶挺、聂荣臻等几个人，地方党负责人杨石魂帮助找了一条船在海上飘了两天一夜到了香港，找到广东省委，方知发了恶性疟疾，抢救诊治半个多月方好转，可以参加一些省委会议，研究广州起义。一直至11月上旬奉中央指示回上海参加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另一方面，张太雷10月3日在混乱中与周恩来失散，13日自己回到香港，才重见周恩来。他召开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6人组成南方局。南方局下设军委，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杨殷6人负责。10月19日张太雷又秘密赴汕头处理善后工作。10月22日由汕头前往上海，到上海后即向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计划。中央决定撤销南方局，广西划归广东指挥，福建南北合并成中央直属临委。

11月8日至9日，周恩来、张太雷一起参加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给南昌起义前委以“警告”处分。但会后又决定周恩来留中央工作，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任主管中央日常工作的组织局代主任，以后又任主任。他首先与张太雷、苏兆征一起起草《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在11月17日常委会上通过，于20日由张太雷带回香港执行，这就是广州起义的计划。张太雷11月22日到港后立即向周恩来及中央写报告，26日他亲赴广州部署暴动。不久成立了以张太雷为总指挥、黄平、周文雍为成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暴动总指挥部。12月11日凌晨两时半起义打响。上午六时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张太雷任代主席（主席苏兆征未到职）。刚从香港来到的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叶剑英任副总司令、恽代英任秘书长。但是敌人立即回师反扑，力量远远超过革命方面。12日下午张太雷到丰宁路西瓜园广场参加工农兵群众拥护广州苏维埃大会，从西瓜园回到总指挥部后，敌人向总指挥部扑来，他急忙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行至大北街附近，遭到敌人伏击，当场壮烈牺牲。

广州起义失败了，但这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当年都只有29岁，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为后人传诵，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建立的战斗友谊也将永载史册。

（责任编辑 一 尘）

# 中共三大

## 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

● 刘 青等

1982年7月24日,当年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给这所学校校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写了一封信,信一发表,就象海峡间的涛声拍击人心,两岸中国人发出盼望统一的强烈呼声。

廖公感怀旧事,在信中回顾了一段历史,“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做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廖承志亦知一二的那次合作,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直接结果。

1923年6月12日到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了。为了搞清楚会址和会议情况,我们特别采访了一位老人——广东省原政协副主席谭天度,他已是104岁高龄了。

这位老人是今天唯一健在的1922年的老党员。早在“一大”之前他就参与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活动,开

“三大”时他是会议的工作人员。通过他的介绍和查阅史料,我们知道了“三大”是在当年的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也就是今天的恤孤院3号召开的。此时,中共中央已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搬到广州,在这个反对军阀、开展民主革命的根据地,“三大”再也不用象“二大”那样躲躲藏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

也许是记忆的误差,罗章龙说“三大”是在永汉路太平沙望云楼召开的,有时也在新河浦春园开会。不管这两个地方是不是“三大”的会址,我们还是应该去看一看。因为前者是陈独秀的住处,后者是马林的住处,这两个人那时在共产党里是唱主角的。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弘君说:

“离‘三大’会址一百多米,是新河浦22号春园。据说‘三大’代表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住在这里,现在这里是一个幼儿园。”

向导告诉我们,参加“三大”的毛泽东,提前来到广州,与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

警予一起在马林的住所春园,协助陈独秀进行筹备工作,起草文件。

“三大”主要解决了民主革命的策略问题,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和方式。1922年8月,马林回到中国。关于这件事我们找到一份珍贵的资料。当年共产国际给马林的指示,为了安全和保密,该指示打印在他的衬衣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顺生说:

“为了落实共产国际关于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指示,8月底在杭州召开了西湖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特别会议。马林在会上强调:‘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会议在组织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但思想上并没有想通,因此在同意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时,还有所保留,主要表现在当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而实际上会后只有少数负责人比如李大钊、陈独秀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

党。”

当时的孙中山，碍于国内、国际形势，对与共产党合作一事尚存疑虑，现实给两党都上了一课。

先说国民党，由于陈炯明叛变，1922年8月，孙中山回到上海。此事对他打击甚大，使之陷于苦闷彷徨之中，他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孙中山不得不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寻求新的同盟者。

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雪中送炭，当即发表声明，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尽管此前，共产党人与陈炯明的关系并不算坏，陈独秀留在广州没有参加“一大”，就是被陈炯明请去当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但陈炯明叛变后，中共中央即令广东党组织转变对他的态度，不转变的给予处分。谭植棠为此被开除党籍，陈公博受警告处分后脱党去美国念书，谭平山被调离广州。

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一席推心置腹的交谈，孙中山深感共产党人是值得信赖的。他感叹道，“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因而主动邀请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党员，是不能脱去第三国际党籍的，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因此成为最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同时，孙中山为了取得更广泛的支持，又和苏俄政府的

代表越飞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并于1923年1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此后，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便开始逐渐形成。

在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一番教训。1932年的“二七”大罢工，受到军阀残酷的镇压。骇人听闻的血案，使工人阶级遭到一次严重的打击。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靠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势单力薄。因此，从被动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转为主动自觉地建立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共同进行民主革命。

至此，解决民主革命的策略问题，已成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势。“三大”最终承担起这个“二大”没能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两次大会的间隔，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上最短的。

虽说是水到渠成，但在“三大”会场里，当年还是有过激烈的争论。党史专家从荷兰保留的马林档案中，了解了许多细节。在有关“三大”的笔记中，马林概括地记录了每一个人的发言，阅读这些笔记，久远的历史，仿佛就在眼前。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刘益涛说：

“在会议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因此共产党员应全部加入国民党，应在工农中发展国民党，否则无法对它进行改造，等于放弃了民主革命的主要阵地。这种意见以陈独秀、马林为代表。而另一种意见针锋相对，认为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但不等于是唯一的所有的任务，共产党主要

还是要发展独立的阶级力量，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工农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让工人参加国民党，就是把工人运动纳入国民党，是右倾。这个意见以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

瞿秋白语气温和，仿佛在劝导：“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

张国焘则是刚愎自用的口气：“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他还有一段令今天的人们读来也不陌生而且心有余悸的话：“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希望这次会议通过一个略‘左’一点的决议。”这使我们很难不想到邓小平70年后的告诫：“‘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被他搞掉。”

所幸，‘三大’通过的并不是略‘左’一点的决议，而是一个正确的决议。会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三大”一结束，共产党就投入到建立统一战线和帮助国民党改组、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的工作。翻开当时中央发出的13号通告，今天仍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出那紧迫感、那声势，“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立时全体加入。没有的地方赶紧帮助建

立起来。在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中，共产党务必每个省都至少有一个代表，头脑明晰，且有口才。动身前应详加讨论，集中后再集中议决一致的主张。”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得到发展和扩大。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终于召开了。大会的宣言，对三民主义重新进行了解释，在共产党看来，这就是发展而来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样，就与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了，成为两党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史称第一次大革命的起点。在历史上，留下一段至今令人难忘的佳话。

请看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地方领导机构中，共产党员的强大阵容：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

候补委员：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

中央组织部部长：谭平山  
秘书：杨匏安

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  
秘书：彭湃

中央工人部秘书：冯菊坡  
北京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于树德

汉口执行部负责人：林祖涵、李立三、项英

湖北省党部负责人：董必武、陈潭秋

湖南省党部负责人：何叔衡、夏曦

浙江省党部负责人：宣中华

直隶省党部负责人：于方

舟、李永声

江苏省党部负责人：侯绍裘

上海执行部：毛泽东主持  
组织部、恽代英主持宣传部

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周恩来

宣传科主任：李富春

巴黎通讯处处长：聂荣臻

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人是真诚的。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发言最能说明这一点。针对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坦诚相告：“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运动而来”，“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诡祟的举动。”这一番话语鞭辟入理，感动了许多国民党人，也受到大会的欢迎。

李大钊是坦诚的，但也是清醒的。在马林的笔记本中，我们看到，李大钊在中共“三大”上，首先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1、过去和将来革命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2、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3、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没有工作，现在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

然而，问题的提出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三大”没能更多地关注这个领导权的问题，而留下了遗憾。对此，中国革命只能假以时日，等待共产党的进一步成熟。

毛泽东在“三大”上也发

表了引人注目的意见。他主张党的工作在以城市工人运动为重点的同时，也应特别注意农民运动。就连后来反对毛泽东、分裂党和红军、投靠了蒋介石的张国焘，在晚年的回忆中也承认：“毛泽东的发言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央不应只看见局处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意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广州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的极大贡献。那时他此项见解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

在“三大”时，毛泽东和谭平山等负责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据参加讨论的罗章龙回忆，毛泽东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但经过争论，没有写入决议案。今天，党史专家在评价“三大”时，认为对农民土地问题没有加以应有的注意，是不足之处。

也许可以说，毛泽东在“三大”的发言，更加直接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原则，历史后来选择了他，使他从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人物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把中国革命带向胜利的人，这不是偶然的。

在我们回顾“三大”时，有必要介绍一下马林，因为他在“三大”后不久，于1924年初，结束了中国的使命。他1921年6月初来到中国，对中共建党和建党初期的工作起了促进作用，并为建立国共联合战线，四处奔走。这位职业革命

家在中共创建史上留下一笔业绩。

马林、还有马丁、菲力普斯、孙铎，都是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的化名。这位被毛泽东称为“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人，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在铁路工会中表现出富有战斗精神。1913年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帮助建立社会民主同盟，也就是后来的印尼共产党。1920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在中国工作了两年半后，他于1924年4月回到荷兰，在荷兰共产党内积极活动。由于感到自己日益同情托派，于1927年脱离荷兰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托派组织，但1938年，又拒绝参加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积极参加抵抗运动，被德国纳粹匪徒俘获，1942年在集中营中被杀害，终年59岁。

在共产国际和荷兰，保存了马林的许多资料，成为我国党史工作者的珍贵财富。1928年，他在莫斯科与参加“六大”的罗章龙见了面。此时他已离开中国4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已和他再没有直接关系，但临别时，他仍感慨万端地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历史车轮自会循正当轨道迈进。”这段话，这种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开创了首次国共合作，以广州为中心汇集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就打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新局面。这次合作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此后几十年，政权更迭、

经纬万端，但国共合作、祖国统一，如今已成为挥之不去的历史情结。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带着遗憾走了。

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即将退休时说：“我也想去台湾看看，不过看来1997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他也带着遗憾走了。

历史的重任落在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肩上。距“三大”70多年后的1995年，江泽民在新春茶话会上，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点重要主张。

海峡咫尺，殷殷相望，两岸全体中国人和所有中华儿女，期待着国共两党再度携手的历史回声，期待着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美好未来。

## 中共“三大”档案

大会召开时间：1923年6月12日—20日

大会召开地点：广州

出席代表人数：30余人

代表党员人数：420人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大会通过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等7个决议案

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

候补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

中央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  
委员长：陈独秀

秘书：毛泽东

会计：罗章龙

（本文选自大型电视文献片《十五页档案》，剧本主编刘青，主笔邱建、葛幼力、郝一星、薛京）

（责任编辑 吴 思）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成立时委员合影。

前排左起：一为黎澍廷▲，三为何香凝，四为彭湃▲；后排：一为刘尔崧▲，二为陈公博，四为杨翰安▲。（带▲号者为共产党员）

# 乐氏家族 与三百年老店同仁堂

● 李 仁

在东南亚和日本的市场上,想购买中药的顾客,常常指名要“同仁堂”的药。在国内提起中药,立刻想到“同仁堂”三个字的人就更多了。同仁堂的中药信誉度如此之高,是与同仁堂这个国药老字号三百多年的历史分不开的。同仁堂——作为中国传统药业的一个典型,它的生产和经营都有着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迷人的传奇色彩。

## 乐悟冈

### 乡试落第办药店

早在清朝康熙八年,也就是距今近三百三十年前,一个名叫乐悟冈的书生因为乡试落第,便继承曾在太医院任太医院目吏的父亲的心愿,开办了同仁堂药店。乐悟冈是从浙江迁来北京的乐氏家族的第五世。在药店开办之初,乐悟冈就对自己的事业怀有大志,他在1706年撰写的同仁堂药目序言里写道:“同仁堂名,先君之素志也。……每庭训余,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惟医药为最。又曰,同仁二字可命堂

名,吾爱其公而雅,须志之。”序言继而谈到药物的制作与配伍说:“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从上述文字里,可以看出同仁堂的开创者在思想上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济世救人为己任,并非唯利是图。这就使同仁堂的经营有了一个保证质量的基础。另外,乐家祖上一直是世代为医的,在医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乐悟冈这一代,已具备开创药店的诸多条件。同仁堂作为一个封建时代产生的商业手工业企业,能够绵延数百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其存在发展的历史中,很有一些令人回味的地方。

同仁堂史料中,有一份《同仁堂乐氏祖传丸膏散丹下料配方》,其中共收集宫廷密方、古方、家传秘方362件,且有对方来源、配伍数量、炮制要求、制做手艺、功能主治、用法用量、有无禁忌、保管储存方法等详细说明。同仁堂制药质量的最为关键处,是具体操作上的讲究。因为在当时中药制作还没有现代科学手段的情况下,其药效和质量的把握,要全靠实践经验的世世代代

地积累。许多道理不一定讲得明白,但照传统做法就能出现奇效。因此,同仁堂的中药制作历来工序繁杂,要求特殊,有些甚至近乎苛刻。例如,在药材的炮制上,就有水制、火制、水火共制之分,每种方法都蕴含着十分深奥的学问。如“半夏”是一味镇咳、平喘、止痰的主要药材,但它有一定的毒性,所以加工的要求极严。同仁堂的传统方法是先将半夏先用清水浸泡七天,然后再用石灰水浸泡七天,取出后,再用清水继续浸泡七天,然后还要放入皮硝和明矾水中再泡七天,这就需要28天时间。这以后,取出晾干,再与五味子、甘草等药熬成的汁液和宫桂、砂仁、木香、檀香等研成的药粉共入一缸浸泡,这时要每天倒一次缸,共要浸倒26天。然后,变为隔天一倒,共浸35天,再晾干后才算完成。再如,同仁堂传统药品中的乌鸡白凤丸,其制作方法的讲究,是令人惊叹的。相传过去使用的是可装数百斤药料的大铜锅,先把龟甲、牡蛎等放在锅底,因为这些药质地较硬,锅底的温度比较高,容易融化。然后,将甘草、当归等草质



的药材同鹿角胶拌在一起放在中层,因为鹿角胶遇热后就成为胶状的粘液,不事先拌好,到时候就难以发挥效力,而甘草、当归又正好是疏松干燥的,两相配合,恰到好处。乌鸡要用江西泰和产的乌骨鸡,这种鸡全身白色,皮肉和骨头都是黑色的,耳朵内要有一撮绿毛,每次要用数十只乌鸡,然后还要加上数十味其它药材,加盖密封,在锅里蒸两天两夜,直到把鸡的骨肉全部蒸烂。这时,还要在蒸好的药糊里加入生地、山药等研成的粉,等阴干后才能制成药丸。这里的具体环节,外人是无从知晓,无法检查的,但他们认为任何一步不按要求去做,就会影响药效,所以从来不肯敷衍。这就是同仁堂的规矩。

## 乐平泉 善于经营振名声

同仁堂自康熙年间传至道光年间,也曾有过几度衰落,这其中主要的并不是由于质量而是由于经营的原因。直到道光十一年,乐氏家族里一个叫乐平泉的年轻人成为同仁堂的铺东,经他艰苦的努力,收回了一度卖与外姓的股份,着手重振同仁堂的名声。乐平泉是一个精通经营之道的人,这年他见各省举子云集京城参加会试,想起同仁堂过去曾有给应试举人送四季平安散、藿香正气丸这类药品的先例,便吩咐作坊赶制药品,并且特别叮嘱,虽为

赠品,下料却不得马虎。乐平泉心里明白,这些人考中了是朝中的官宦,权势在身,考不中回到各地也是一方人物,只要这些药在他们身上灵验,同仁堂的名声便会不胫而走。果然几年过去同仁堂的大名便朝野皆知了。乐平泉看到每年挖城沟时,起出的污泥晚上经常弄脏行人,便出钱做了一批灯笼,高挂在主要的路口上,过往行人见写着“乐家老铺同仁堂”几个字的灯笼照得四处通明,无不称道乐家办了善事。乐平泉还让人以同仁堂的名义,开设普善粥厂,救济流乞饥民;拨款兴办义学,救助失学稚童。到了咸丰年间,同仁堂生意兴隆,财力空前强大,乐平泉又花钱捐了一个三品候补道的官职,到光绪四年,又捐二品典丰,为内阁供事、中宪大夫,后又晋升资政大夫,成了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据说,当时他与权倾一朝的僧格林沁就过往甚密,成为结拜兄弟,两人经常同出共入宫门府第。

咸丰十一年,西太后参与政事,她对同仁堂的药格外垂青。过去,宫内用药主要由同仁堂派人到宫里制作;到了这时,已改为由同仁堂做好成药或配好汤药,直送宫中。当然,同仁堂的供药所得,也与日俱增。乐平泉是个十分有心计的人,他知道商家最怕火患,同仁堂历史上就曾数遭火患,为此,他决定由同仁堂出资购买设施,在大栅栏成立普善水会,以同仁堂的伙友为主,组织救火队,每人发给印有“普”字的会服,还设了一面大锣,作为火警的

信号。不想,普善水会竟派上了大用场。一天深夜,月黑风高,紫禁城内贞度门起火。宫里的太监守卫扑救不及,风助火势,直向太和殿烧来。火警传到了普善水会,训练有素的救火队一千人马,驾着进口的德国水车,急速进宫扑救,很快压住火势,保住了宫殿。据说,西太后为此下谕,封普善水会为“小白龙”,同仁堂因此而名声大振。

同仁堂能够崛起发展,同乐平泉的经营策略是息息相关的。乐平泉制定了一条“自东自掌”的原则,凡是制作和经营的关键地方,都由自己和亲信监督,从进药到称量、配制,全部都是由自家人掌握。这样,既保住了技术秘密,又使操作的人员具有责任感,从而保证了同仁堂药品的质量。为了防止资本的分散,他还立下了家规,不许子女经营其他行业,甚至开设同仁堂分号。这些措施,确保了同仁堂的实力,使这个旧式的家族型的手工业企业能够发展到如日中天的极盛程度。

## 乐许氏 继承夫志精守业

乐平泉于光绪六年去世。他死后,同仁堂的经营者中,又出现了一个杰出的人物,这就是乐平泉的夫人许氏。许氏夫人出身大家名门,但样样家务干练超人,几十年来,她对乐平泉的一套经营方法已了如指掌。她执掌门面后,不但继承了乐



北京乐氏大家族的一张合影

平泉的大政方针,而且又多了几分女人的精细,因此,手下的人们干起事来,更不敢丝毫马虎。许氏夫人治家治业虽然严厉,但在生活细节上对下人又比乐平泉多几分关心。因此,同仁堂上下一提起老太太来,都十分敬重,心悦诚服。许氏看到店内的药品日多,人手也有增加,她想制药售药不同于一般的买卖,人多手杂,最易出乱子,便决定在堂内设立“查柜”,专事检查之职。查柜的先生对出售的药,要逐味号包检查。因为同仁堂对出售的每味药都是分别包成小包的,查柜先生在检查后,要用毛笔将每味药的药名写在小包上。这样做虽然繁杂,但许氏却立为规矩,不容违反。为了同仁堂的家业之本,许氏又着手修订《乐氏世代祖传丸膏散丹下料配方》和《同仁堂药目》。因为,自乐悟冈在康熙年间写出这部下料配方后,又有不少新药创出,样样都是传家之宝,于是,许氏便把这些新药,一一记入修订的药目,并且仔细写明一切配制的细节要求,使同仁堂的制药技术和药品开发得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保护和发展。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许氏老太太处变不惊,她与四个儿子打点了全家细软,把重要的财产文书车载人挑,带领全家老小一路向山西太原避难而去。临走之前,许氏还安排了留守人员,待到八国联军撤走,乐家回到京城后,她又问明了留守人员的情形,重金犒赏有功者,并立即安排人手赶修被毁的门脸,开业经营,光绪三十三年,许氏夫人去世。据说,在她执掌同仁堂大业的年代里,因向宫里进药有功,她也曾有被西太后邀到颐和园里避暑数日的风光。

同仁堂在许氏夫人之后,在管理的体制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许氏生有四个儿子,因大儿子死得早,在许氏去世前的一两年便由二儿子乐仲繁协助她管事。许氏

死后,乐仲繁独揽经济大权,遭到其他儿子的反对。后来共同议定由四大房的人共同管理,即各房每天出一个人到公事房共同检查账目。同仁堂每年从总资中提出四万两银子,每房一万两,不再分红。这在后来被称为“四大房共管”。四房共管后,他们还议定,各房可以用乐家老铺的招牌在各地开分店,但不准用共有的同仁堂的字号。于是,四房在各地纷纷开设分号,最多时达到三十多个,当时,也有乐家的人主张把乐家老铺分号统一为同仁堂分号,但因为四房的利益难以统一,而未能实现。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企图占有同仁堂,他们曾以出资入股的名义,提出与同仁堂合作,当时同仁堂的经管人乐达义十分惊恐,为了不使这个百年的祖业落于敌手,绞尽脑汁,周旋运动,花了大量钱财,总算未使日本人的阴谋得逞。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并未好转,特别是到了40年代末,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同仁堂的生产原料,不少是贵重药材,用款量大,一亏就不是小数目。后来,国民党政府为转嫁危机,又对工商业实行所谓“限价”,向来货真价实的同仁堂,限价后药价低

得如同白给,很快被人们抢光。到1948年底,同仁堂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 乐松生 历尽沧桑史留名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军管会坚决执行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曾邀请北京乐氏家族的第13世,当时同仁堂的负责人乐松生先生,到中共市委出席恢复和发展北平生产的座谈会。乐松生通过接触,了解了党的政策,便主动地配合市委,为发展生产出力。在他的提议下,成立了北京市兴业投资公司,为北京的恢复生产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此期间,乐松生先生在市委的关怀和安排下,参加了西南土改工作团,赴四川参加了惊心动魄的土地改革运动,亲眼看到了翻身农民的喜悦。抗美援朝开始后,乐松生又带头为志愿军购买飞机捐款六亿九千万元(旧币)。1952年9月,乐松生参加第二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枪炮火光清晰可见的夜晚,慰问从前浴血下来的战士,他深为这些最可爱的



同仁堂老药铺的老门面

人的勇于献身精神所感动。

1954年,为了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北京市委在中央有关部门指示下,决定在稳定的前提下,先合营一批较重要的企业,取得经验。这一年的7月,市委统战部派工作组到同仁堂,领导实施公私合营计划。8月同仁堂公私合营筹备工作委员会成立,27日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合营后,乐松生任经理,合营工作中的一切涉及公私关系的问题,均由公股代表和乐松生先生直接协商。1955年春,彭真同志到同仁堂看望员工,了解情况。当年10月,乐松生和其他工商联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1956年,乐松生被选为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并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

在“文革”前的那段时期,在彭真同志的关怀下,在乐松生先生的具体领导下,中药改革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同仁堂中药提炼厂开发出了如牛黄解毒片,女金丹,黄连上清片,银翘解毒片等诸多新中药成药产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们经过艰苦努力研制成功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医药科学成果:人工合成牛黄、人工合成冰片和人工合成麝香的杰出的成绩。人所共知,天然麝香价格昂贵,因为历来是用杀獐取麝的方法,使得香獐的自然资源几近枯竭。而人工合成麝香又绝非易事,麝香中的有效成分麝香酮,是个含有15个碳原素的环状体,其结构在自然界中十分特殊。主持这一研究课题的郑启栋教授,在乐松生支持下,带领科研人员对人工麝香的合成线路进行不断的探索和试验。试验中要使用一种危险的化学品金属钠,他们便在条件简陋的实验室里,冒着生命危险,小心翼翼地操作。终于经过极其艰苦的长达三四年的

漫长过程,将人工麝香研制成功。成为同仁堂历史上对国家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也是我国中药制造业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同时,同仁堂的生产、销售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厂房面积扩大,机器设备增加,增设了中药提炼厂、药酒车间、第一门市部、第二门市部。各种药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价格也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有所降低,受到群众的欢迎。

1966年“文革”开始,同仁堂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在“破四旧”中药店里挂的同仁堂老匾被烧毁,同仁堂药店也被改名为北京中药店,店中凡是带有“同仁堂”字样的器物,几乎都被毁坏。特别令人悲痛的是,作为同仁堂历史传人的乐松生先生于1967年4月27日夜被迫害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9月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隆重的乐松生先生骨灰安放仪式。然而,当时只有少数家属和有关领导同志才知道,骨灰盒里装的并非乐松生先生的骨灰,而是他生前戴过的一副眼镜。因为乐松生先生被迫害至死后,骨灰早已被遗弃不知下落。而且,临时连一张清晰的照片也找不到,在骨灰安放仪式上用的遗照也是从报纸上翻版放大的,所以十分模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仁堂的老字号得到了恢复。1979年,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了“同仁堂”牌匾。随后,许多年不生产的老品种,陆续投入生产。目前,同仁堂经营的饮片已达到一千二百多种、中成药数百种,其中包括享誉海内外的十大王牌药: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再造丸、局方至宝丹、紫雪散、大活络丹、虎骨酒、参茸卫生丸、女金丹;还有白凤丸、国公酒、愈风宁心片、牛黄解毒片等十大名药。同仁堂作为我国民族医药业的优秀代表,受到了党和国家



北京乐氏第13世传人乐松生

的高度重视。1985年2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隆重纪念北京同仁堂开业315周年庆祝大会,李先念、彭真、乌兰夫、王震、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同仁堂题字。1989年11月23日,李鹏总理为同仁堂题词:“中医药造福人民,同仁堂渊源流长”。1992年8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为同仁堂题辞:“发扬同仁堂质量第一的优良传统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8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成立大会。从此,同仁堂成为一个大型的中药制造企业集团。今天,同仁堂的制药厂房里,已经到处是现代化先进机器设备,在科研和检验部门装备了精密的仪器,但当年乐悟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仍然是同仁堂职工奉为宗旨的名言。今天,同仁堂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企业,正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祖国的建设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责任编辑 洛松)

# “文革”中“帮文风”留给我 带血的记忆

● 李 庄

“文化大革命”对全国各项工作以及党风、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等等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其中对文风的破坏也是至深且巨的。我个人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对此感触极深。“文革”已时过二三十年，有时候还能感到它的影响。当时一伙文痞肆意鼓噪，最高领导姑息纵容，遂致祸害全国达十年之久。

抗日战争中期，共产党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整顿“三风”，包括整顿文风即反对“党八股”。“党八股”作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曾经对我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1942年作《反对党八股》报告时，“三风”虽然已经只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逆风”，在全党已不占统治地位，毛泽东还是条分缕析，号召全党“加以揭穿，把它打倒”，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文化大革命”情况不同，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伙人炮制的“帮文风”，从上而下吹向全国，作为推行“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武器、一根棍子，可恶又可怖。新闻界首当其冲，既受害又害人。

“帮文风”实质是“假大空”，它最终必现原形，从这个意义说，迷惑作用有限。但在一定时间内很能骗人，特别在它取得合法地位的时候。始作俑者“林副统帅”，先意承志，无耻迎合，推出“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几百年出一个”等极端谈

语，欺骗了不少好心人，击倒了一些反对者。

“文革”开始，林彪作为“接班人”，1966年8月18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讲话，树立了一个恶劣文风的“样板”。讲话只有一千多字，“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创举”、“伟大胜利”、“最伟大”、“最强大”、“最锐利”等等词语占了很大篇幅，目的是造成一种印象：他们一伙最精通毛泽东思想，最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最热爱毛主席，因此独享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的文章、讲话一时成为人们思考问题、写作的范文，谁不按照这一套办法做，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江青一伙炮制、推行“帮文风”比林彪一伙时间更长、范围更广。他们利用抓到的“笔杆子”，在各个领域，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所欲为。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前，他们同林彪一伙搭帮干；“九·一三”以后，他们一伙继续干，先后达十年之久。江青利用她在不正常情况下取得的合法地位（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及她的特殊身份，干一般人干不了、不敢干的坏事，控制许多文化、传播机关，从上而下推行“帮文风”，在全国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形成“文风一律”。“文革”后期，毛泽东大概也感到文风太不像话，曾经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扭转，但大权在握、

羽毛已丰的江青反革命集团，敢于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他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许多貌似颂扬实为出丑的报道都是假托宣传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被江青一伙控制的《人民日报》头版登过一条大字标题的通栏新闻。

引题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正题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精神非常非常充沛**

副题是：**国庆前夕 广大军民无比幸福地欢庆这个喜上加喜的特大喜讯**

标题来自报道，在当时的气氛下，编者可做的事情已经不多，回旋余地极小极小。

这则新闻刊出后，我同谭立有过一次在当说时说来不能见人的议论。谭比我大两岁，“文革”前是《人民日报》机关党委书记，他也是个老报人，我两人1939年都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工作。谭作风严谨，不苟言笑，这时也以“走资派”身份在报社劳动量最大的搬运组劳动。这天没有卷筒纸可运，工人同志休息，我二人在院子里清理垃圾。他看看没有旁人，突然说：“你看咱们国家还有希望么？”我打哈哈说：“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他说：“就你我两个人，不打太极拳。你看看昨天的新闻，怎么就没有人说话呢？”我说：“该说话的不说，众干部、小百姓不敢说。你说谁说？”他说：“新闻是上面看过的，报社不敢动，标题可是编辑作的！”当时还能工作的一版编辑同我共事多年，我都熟悉，我确信他们不欣赏这样的标题，不愿作这样的标题。我比较留意中国报纸，在抗战前的报纸，即使政治上反动的，也未见过搞这样的新闻标题。“文革”中欣赏、策划这种新闻和标题的人当然是借毛泽东之名以自重，但我确信他们不懂得什么叫作“逆反心理”。事实证明，厌恶这类新闻和标题的人不是少数，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会认为这是文化的耻辱。

谭立半开玩笑说：“你如果主持编辑工作怎么办？”我说：“这就得感谢‘文化大革命’了。我不是正扫院子么？”

文痞姚文元“文革”开始当陈伯达的副手，以“四人帮”大将身份控制《人民日报》，同时

派了一个代理人到报社坐阵；陈伯达的工作组中又有几个办报的人，把《人民日报》控制得死死的。“文革”期间有个说法：“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大报主要指《人民日报》。“梁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两所大学豢养的写作班子，专门按照江青一伙的意旨炮制“帮文风”范文，交《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登载。“梁效”是“两校”的谐音。其实不只“小报抄大报”，大报也抄《人民日报》这个带头的大报，这大概是我们国家在“文革”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当时每到夜间，许多报纸的夜班编辑纷纷给《人民日报》总编室打电话，询问翌日报纸主要版面的安排和主要标题的制作，叫作“对版面”，以便减少不应有的麻烦。当时禁忌太多。有一次，《人民日报》一版登了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二版有条新闻报道我国一些城市群众示威游行，标题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字样。有人故意把报纸摊开，对着阳光察看，二版的“反动派”三字正好和一版的毛泽东头像重叠，为此牵强附会酿成一大“事故”。上边反复追查是否坏人制造反革命事件，把二版标题上的反动派三字正重在一版的毛泽东头像上。所幸这种“警惕性”违反读报常识，报纸版面的安排者又身份过硬，此事才不了了之。90年代的新闻工作者可能认为这是海外奇谈。在那动辄得咎的时代，事情涉及伟大领袖，确实出现过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当时新闻工作难做，也可以说又很好做。“文革”快结束时，“四人帮”在报社的代理人可能认为我李某终日逍遥，过于惬意，就给我派了点事：在记者部的编辑组当编辑。负责人同我共事二十多年，当时其实也是被监督劳动性质。他尽量让我少做事，多读书，不必拘泥于上班下班，我非常感谢他，但绝不逾轨半步。一个很长时间，定调子的评论、文章都出自“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三家准备文章又有分工，政治评论多数出于“两报”，理论文章多数来自“一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闻、文章一度满天飞，我有幸目睹这类作品的炮制过程。一个

编辑奉命生产一篇批邓文章，他准备几页稿纸，摊开一本《红旗》杂志，在略述某某单位认真学习“最高指示”，狠批邓小平情况之后，进入正题：“经过学习、批判，他们认识到”，以下照抄《红旗》一段文章；“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又抄一段文章；“他们还认识到”，再抄一段文章作为结束。我可真服了。我绝对没有想到“四人帮”的“帮文风”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后人如果研究“帮文风”，千万不要忘记这份忠实纪录。

报纸难编，还只是想坚持优良的报人的苦恼；文章难写，影响面就大多了。当时存在一个坏文风竞赛的形势。《人民日报》登上山西省造反派为成立造反派总指挥部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开头是“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四个“最”字出手不凡。文中说，总指挥部得以成立，“是您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鞭策”，“我们纵然高呼一千遍一万遍‘毛主席万岁’，也呼不尽我们对您无限热爱的心情；我们纵然高唱一千遍一万遍《东方红》，也唱不完跟您闹革命的决心。”通篇文字除了重复这类千篇一律人人厌恶的词句外，称得起实质内容的，就是把前中共省委臭骂一通。

我曾在太行根据地（包括山西省东南部地区）工作，山西省文化、新闻界老战友相当多。我同三位好友谈过这篇妙文，他们也记得清楚。当时“帮文风”泛滥全国，互争雄长，由于没有真理，只能虚词吓人。这几位老战友说，他们这些“当权派”都被批斗，造反派把被监督工作的十多个“笔杆子”集中起来，由革命小将带领，好吃好喝，日夜苦斗，炮制这类表态性重头文章。这类文章已经出现很多，想后来居上实属不易。此文开头连用四个“最”字，听说就推敲很久。《人民日报》登了这篇妙文，那个造反派总指挥部就认为得到了毛主席的承认，马上广发喜报，击鼓游行。人的精神状态如此，我看算是到头了。

“文革”期间，偌大北京城报纸、刊物没有剩下几家。少数能够出版的都塞满大批判文章，但是难以看到作者的名字。过去写文章的，多

数被打倒了，少数搁笔了。新涌现的或被监督工作的人写了批判文章，都署“××大批判组”或“梁效”（两校）、“江天”等化名，时间长了，从文章的调子、架式、口气，也能判断是哪里炮制的。新闻记者也不署名，而署本报（社、台）记者。据说这种作法有利于淡化记者的“成名成家”思想，有利于记者思想革命化。我看真正有利的是可以消除一些记者怕出丑的顾虑。看看《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这篇新闻的开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当世界人民昂首阔步进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崭新的历史时代的时候，在震撼世界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滚滚向前的时候，中国出版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外文版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我不相信哪位作者愿意在这种新闻中署上自己的名字。

这股风来势所以猛，盘旋时间所以长，主要由于从上而下的官方提倡。林彪、江青两伙人违反党心、民心、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能摆出一付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架式，借以吓人。林彪公然说，写文章“主要是引证毛主席的话，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要多收集多引用”。他以接班人身份在中共九大作政治报告，引各种语录八十多处，其中少数引自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中共中央在“文革”初期发布的文件，多数引自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特别是准备和发动“文革”的见解和言论。“语录”都排黑体字，以便引起人们的注意。上行下效，成为文风。1970年我在《人民日报》干校“学习”，看到一篇社论引用毛泽东语录达全文三分之一，黑鸦鸦一大片。我犯了职业病，脱口而出：“这样的文章，以前没有见过。”同室一位同志看看没有第三个人，像是自言自语：“所以需要进行再教育。”这当然是一种宝贵的提醒。可爱的同志！

毛泽东是注意看报的。“文革”以前，他曾严肃批评一些“不读书、不看报”的领导人。他似乎并不完全欣赏这种“帮文风”。1968年8

月，他对当时的报纸工作有个批示：“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这当然是个极难解决的问题。当时的大方向是“文革”，在坚持“文革”的前提下纠正“帮文风”，办得到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曾表示对报刊宣传他的时候加四个“伟大”非常“讨嫌”，还批评以其他形式对他表示个人崇拜的宣传。他在审阅我国爆炸第一颗氢弹的公报稿时删去四个“伟大”，还删去“毛泽东思想”前边“光焰无际”四个字。他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时写了一段原则性的意见：“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引者按：指一些颂扬的语句）。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部门研究一下。”

我在“文革”时长期靠边站，偶尔听到毛泽东一些言论、指示，多是个别老战友辗转告知，既少且迟。那些标榜最最忠于毛泽东的人，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听指示一定又多又早，为什么对这种指示拒不执行？毛泽东的权力、威望哪里去了？很长时间我想不通。以后慢慢懂得：一种文风是为一定路线服务的，正像“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一样，“帮文风”是“文革”的表现形式。“文革”反动至极，荒谬透顶，必需靠“假、大、空”的“帮文风”来鼓吹、来遮掩，这是它能折腾十年的重要原因。“帮文风”最初确实骗了不少人，有段时间对“文革”顶礼膜拜的也大有人在。

《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同其他宣传单位当时能够工作的人员一样，除了极少数卖身投靠的投机分子，绝大多数人违心苦撑，形同服役。一个不完善的体制，一个毛泽东金字招牌，把人限制死了。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这些靠边站的人，其实相当幸运。在那黑白颠倒的时代，个人的境遇也是这样颠倒。

《人民日报》编辑部多数业务骨干都参加过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整风，对“帮文风”深恶痛绝。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都回到原工作岗位，立即对“帮文风”进行实践的批判。经

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积累，在1977年2月21日推出一个整版，对“帮文风”进行集中的剖析和鞭挞。在署名评论《打倒帮文风》中，揭露这种恶行的嘴脸是：“又臭又长、套话连篇；武断专横，帽子乱飞；隐晦曲折，含沙射影；弄虚作假，欺骗群众；千篇一律，面目可憎”。评论认为：“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对帮八股加以打扫，加以肃清，把我们的文风切实整顿一番很有必要。”短评《说老实话》中说：“说假话是帮八股最大罪状”。“在‘四人帮’控制舆论那一段时间，‘四人帮’通过本报说了不少假话。我们一定要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改造思想，改进文风，努力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我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这个版还登了十多封读者来信，集中批判“帮文风”。

在此之前一个月，《人民日报》即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刊登要求改革文风的读者来信，同时发表编者按语，促进这个问题早日解决。有一个“编者按”说：“‘四人帮’到处放毒，‘帮八股’就是一毒。他们的八股内容反动，文字又臭又长，千篇一律，群众早就恨在心上。‘四人帮’打倒了，‘帮八股’必须肃清。近来，本报在内容上有一个大革命，文字上也稍有改进……我们决心同广大读者一起，为改进文风而努力。”

粉碎“四人帮”消灭了由上面炮制、推行“帮文风”的风源，是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当然不是说文风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尽管性质不同，在某些报刊和某些出版物上，假话还没有绝迹，空话时而出现，“你说庙在树前，我说树在庙后”的重复话继续流行。什么什么工作应该做好，什么什么倾向必须注意之类的话，固然有时是必要的，它可以表示领导的态度和期望，但若讲得具体一些，提些可操作的意见，不是更好么？如果意见还不成熟，只看不说也是可以的。否则，一般的话又是重复的话，读者或听众觉得毫无新意，反而会更加厌恶。

（责任编辑 方实）

# 项南之父项与年 的传奇生涯



项与年

● 许人俊

在白区隐蔽战线的斗争中，我们党内有许多优秀同志长期隐蔽在城市里，或潜入敌人心脏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常常更名换姓，不断改变身份和形象。他们形迹神秘，业绩也鲜为人知，甚至亲属也不了解，以致给亲属造成麻烦和误会。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父亲项与年就是其中之一。

## 从华工领袖到中共特科主力

项与年又名梁明德，1896年生于福建连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中共海外党组织委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1927年，年方31岁的项与年被驱逐回国。返回上海后，项与年调入中央特科“红队”工作。

中央特科，是党中央指挥白区隐蔽战线斗争的首脑机关。它是由周恩来建议并亲自组建的，其任务特殊，组织严密，行动神秘。内设四个科，其中三科又名行动科，因专门执行惩办叛徒和敌特等任务，成员均挑选出身好、对党忠诚、机智勇敢、勇于赴汤蹈火的党员担任。内部又称他们为“红队”和“打狗队”，项与年是“红队”的主力队员。

1929年8月24日，我党广东负责人彭湃、杨殷等，在上海新闻路中央军委机关被法租界巡警逮捕。项与年等“红队”队员曾乔装成拍电

影的和小商小贩等拦劫囚车。由于武器未能准时送到，错过时机。彭湃、杨殷等被害后，“红队”决定严惩告密的叛徒白鑫，为彭湃等烈士报仇。白鑫叛变后一直躲在上海霞飞路——国民党市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家里。项与年在范宅附近日夜监视。当白鑫等人刚从范宅走出准备登车时，埋伏在周围的项与年等迅速射出复仇的子弹。叛徒白鑫和范家兄弟4人当场毙命。

## 历尽艰险，传送情报， 确保红军突围长征

1930年—1934年，蒋介石调动数十万大军集中江西，连续发动多次大围剿，妄图消灭中央红军。

在此时刻，一些党外进步人士为苏区安危十分担忧，其中就有蒋介石的老友莫雄。莫雄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原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北伐时同蒋介石一度共事。1930年，莫雄在上海赋闲。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与我党人士素有交往，曾要求过入党，是中央特科联络的重要对象。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李克农曾向其表示：“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莫雄深表理解，曾暗中多次为地下党提供帮助。



1933年10月,蒋介石委任莫雄为江西德安专区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并放权让其自组班子。莫将计就计,暗中同中央特科商讨后,由我党派人去司令部。当时,该司令部从副司令、参谋长到情报官,均由上海地下党派人担任。谍报组由我特科人员组成,项与年充当情报参谋。他利用莫雄的关系,在德安地区建立地下党组织,甚至派人打入特务训练班,到大特务头目康泽手下任职,从而使我情报人员在该地区畅行无阻。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集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军长开会,布署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妄图通过第五次围剿最终消灭苏区。

情况表明我中央苏区和红军已面临巨大危险。然而,我党当时的“左”倾领导却脱离实际,荒唐鼓吹“全面出击”、“两个拳头打敌人”、“和敌人打阵地战”等等。

庐山牯岭军事会议刚结束,莫雄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他冒着泄密杀头之罪,火急向项与年、刘哑佛等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他们研究。

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立即启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计划”要点。随后,又连夜用特种药水将绝密文件主要的内容,密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

鉴于项与年熟悉当地人情地貌,他被派扮成教书先生带着字典,连夜奔赴中央苏区。

为减少与敌人关卡接触,项与年决定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林。经过三四天风餐露宿,忍饥挨饿,38岁的项与年身体憔悴消瘦,走路已十分吃力。加之前面封锁更严,山上布满铁丝网和暗堡,简直是插翅难飞。如何闯关过卡,成了大难题。经反复思索,他毅然钻进山林,以惊人的毅力,用石块砸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顿时血流不止,疼痛难忍,他脸色苍白,嘴腮肿胀,面部变形,加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俨然成了一个讨乞的叫化子。从而混过层层封锁。

项与年终于用6天时间到达了苏区,亲自把庐山牯岭会议的绝密军事情报,送到了中央军委“三人团”的周恩来手中。党中央几天前已收到了莫雄司令部发来的简要密电,如今又见到了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决策依据更为充分。10月16日,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离蒋介石庐山牯

岭军事会议结束仅仅一周,“铁桶计划”尚未布置完毕。我中央工农红军即突然实行战略大转移,果断突围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项与年这位可敬的英雄战士,为红军提前突围、胜利转移,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 联名写信上书中央 直言反对毛江联姻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项与年被派加入长征先遣侦察队,又名副其实地成为对敌斗争的尖兵。不久他又奉命去上海领受另一项特殊使命。

因为蒋介石对苏区红军悄然突围、突然转移极为恼火,紧急指挥部队迅速围追、堵截。为粉碎其新图谋,中央特科决定调项与年回上海,率领爆破组赴江西南浔铁路炸毁铁路桥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破坏其后勤补给线,以牵制其作战行动。

他火速赶回上海,接受中央特科的指令,看望了留在上海半工半读的儿子项南后,第二天就带领两名爆破队员登船去南京。年仅16岁的项南,望着来去匆匆的父亲,甚感奇怪。他不知道父亲到底从事什么职业,父亲在项南眼里始终是个“谜”。

项与年刚到南京就被国民党密探拘捕,但他始终沉着应付,始终否认是共产党人,只承认自己是受骗的同路人,逐步骗得敌人的信任,看管有所放松。一天夜里,他巧妙地逃离看守所,找到了地下党。然后乔装成商人奔向赣江,继而转往河南信阳,又经汉口返回上海。事后,党组织授予他“反特斗争胜利奖”。

项与年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上海久留。1935年初,党组织派他到香港继续做情报工作。后来为便于隐蔽活动,他改名梁明德,北上天津华北联络局,西往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王世英、汪锋、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共事,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中从事统战工作。此后,项与年的名字连同他的传奇故事悄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陌生的梁明德。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为迎接新的历史任务,党组织派梁明德等白区工作干部到延安抗大、党校学习深造。学习期间,他们耳闻毛泽东要同江青结婚,不禁忧心忡忡,深感不安。因为,他们这些中央特科人员在上海工作时,与文艺界交往甚多,对江青的

一些不光彩历史早有了解，深知其名声不佳。为对党的事业负责，避免给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梁明德和王世英、南汉宸、陈雷、阎揆要、丘吉夫、刘子华等十多名地下工作者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如实反映在上海的所见所闻，陈述反对毛泽东与江青联姻的种种理由。联名信直接交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当时，延安一些负责同志也希望张出面做工作。于是张闻天即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信，派警卫员送去，信中表示：“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婚，望你考虑，因为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然而，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身为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居然向毛泽东打保票，出具书面证明说：“经调查，江青同志政治上无问题，其历史清白。”1938年11月底，毛泽东同江青终于结婚。那天，在延安供销社摆酒两桌作为婚礼，张闻天因故未被邀出席（以上见《刘英回忆录》）。

毛江联姻之后，在延安干部中一度引起议论。梁明德等人见木已成舟，只有望天兴叹，深表遗憾。

## 代友寻子，曾希圣 布置“项南找项南”

1940年春，梁明德从延安党校毕业，调到陕西关中地区，在习仲勋领导下任区党委统战部长，抗战胜利后又随部队进军东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多年南征北战，驰骋东西，使他与家人完全失去联系。妻子女儿身在何方，他一无所闻，思念之情常在脑海中浮现。他不知道妻子王村玉被捕入狱后流落他乡，也不知女儿随妻入狱身染重病早已离世。

儿子项德崇是梁明德家人中的幸存者。他16岁和父亲在上海离别后，一直勤奋求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改名项南投身革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新四军驻地，成为一名干部。他同样思念父亲，尽管他不知道父亲是什么人，说不清其身份，但毕竟有着深厚的父子情。而这个“说不清楚”，又曾经给项南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那是1943年在苏北整风运动中，按统一部署，所有革命干部都要说清楚自己的家庭出身、父亲身世、经济来源。唯有项南一问三不知，既说不清父亲是什么人、从事何种职业，也说不清

家庭以何为生，一度引起人们的怀疑。审干人员根据他提供的模糊印象，曾试探询问：“你父亲是不是地下党？”他无奈之中含糊答道：“可能是。”但又无把握，唯恐对组织不忠诚老实，犯说假话的错误，随后赶紧更正，使审干人员十分恼火。幸好区党委负责人思想开明，有感于革命斗争环境错综复杂，不无感叹道：“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儿子说不清老子，老子说不清儿子的情况太多了。审查了这么长时间，他还是说不清楚，那就算了吧，在实践中考验。”这样才使项南摆脱了困境。

此时此刻，远在陕西关中区党委任统战部长的梁明德，当然不了解这些情况。他同样说不清儿子身在何方、从事什么职业，曾托人多次打听妻子和儿女们的下落，但杳无音讯。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初期，他才隐隐约约听说儿子长大成人后已参加革命，在安徽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机关当干部。他喜出望外地给时任安徽省第一书记的老战友曾希圣写信，拜托代寻失散十多年的儿子。曾希圣极为重视，一次省里开会，他特意把省团委书记项南留下谈话，嘱其代老战友在团干部中查找一位姓梁的青年。事后，项南翻遍团干部花名册，发现姓梁的干部有数十人，而曾书记提供的寻人资料又太简单、太抽象，要求进一步提供细节。

为便于查找，曾希圣说明老战友叫梁明德，福建人，30年代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住八仙桥一带。项南当然不知道改名换姓的梁明德，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他随意搭腔道：“我也是福建人，在上海读过书。”曾希圣也随意询问：“你住什么地方，家里还有什么人？”项南答：“家住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父亲是生意人，跑买卖。”曾又好奇地追问：“那是地下党活动的地方，你们怎么会住那儿？”项南答：“那是永安公司大老板家住的地方，怎么是地下党呢？”两人越谈越投机，有些往事，只要曾希圣一提及，项南也模模糊糊略知一二。通过一问一答，曾渐渐感到面前的项南与自己要找的人有某种关系，而且脸形与老战友也有几分相似，但是尚无绝对把握。于是，又进一步探问：“那时你们家常有人来往吧？”项答：“来往的人很多。”曾故意提示：“是否有一个胡子叔叔？”一提胡子叔叔，项南随即兴奋地说：“胡子叔叔常到我们家，他还带我逛大世界、看哈哈镜哩！”事至如此，真相大白，曾希圣发现自己要找的人，就在眼前。为准确起见，他又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项

南：“你仔细瞧瞧，我像谁？”项南定眼一看大声叫道：“胡子叔叔。”原来曾希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常留有胡子，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立刻剃掉胡须隐身他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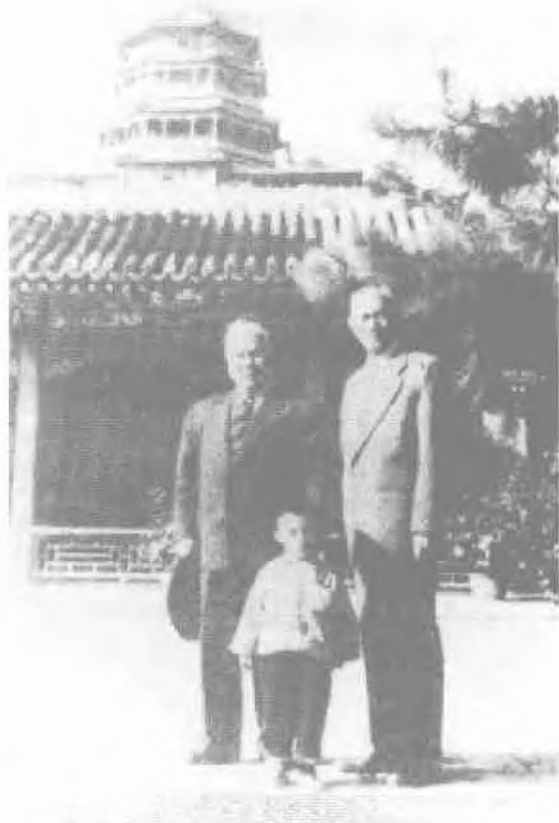
这次戏剧性的谈话，使省委书记托项南找项南的故事流传开来。事后，项南立即与在东北人民政府监督委员会担任高级专员的父亲梁明德沟通联系。因当时全国刚解放，双方工作紧张，未能会面。直到1953年，项南到北京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梁明德才特地从沈阳赶到北京。离别整整20年之久的父子，终于相约同游颐和园。两人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但革命任务繁忙，他们又很快告别，各自返回原单位投身工作。

1956年国庆节，此时离中央苏区红军突围长征，已有整整22个年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忘记那些为红军紧急突围提供过绝密情报的有功之臣。为表彰他们的英雄业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受军委之托，特派项与年专程到广州接莫雄赴首都出席国庆典礼。李克农代表军委设宴招待莫雄和项与年，叶剑英元帅也在家中摆酒宴请二位英雄，热情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

## 十年浩劫中，父子同遭磨难

“文革”时期是历史颠倒的时期。项与年，这位我党隐蔽战线的英雄战士、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竟被林彪、四人帮打成“大叛徒”、“特务”，无休止的游街、批斗，整得他死去活来，皮肉之苦和精神羞辱，使他悲愤交加。在一次批斗中，他一头栽倒地上。年已70多岁的革命老人，从此患了严重中风失语症，还并发有高血压、肺结核等疾病。但残酷的造反派并未轻饶老人，仍时常轮番审讯他，他始终以手势表明自己是忠诚的革命者。尽管造反派暴跳如雷，依然未能捞到任何稻草，最后只好把老人押送盘锦农场劳动改造。

饱经人世风霜的老人，已到了风烛残年，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农场试图甩掉这个包袱，几经周折，查到了他儿子项南的所属单位——机械工业部。谁知此刻项南也早已落难，被打成胡耀邦的黑帮干将，同样押送农村批斗审查和劳动改造。一天，军管会找项南谈话，将盘锦农场革委会的公函交他，上面写道：“项南的父亲梁明德是叛徒，正在接受审查，因年高多病，



项与年与莫雄在颐和园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望动员项南接去赡养。”项南读后欲哭无泪，他没有想到革命一生的老父，竟然落此地步。而他本人此时也是孤身一人，正在接受劳动和审查。妻子则远在西北宁夏五七干校劳动，子女们也已上山下乡，天各一方。军代表问项南如何打算，他只好强忍悲痛，如实相告：“我自身难保，一切相信和依靠组织。”

不久，辽宁决定将梁明德遣送原籍福建连城农村。连城是革命老区，老区虽贫穷，但干部和群众极为正直、朴实。他们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热烈迎接这位远方归来的革命战士。县革委会用有限的招待费接待他，安排他住进敬老院，为他治病。

梁明德老人返乡后，“文革”中的“揪叛徒”进入了高潮。广州和武汉专案组，争先恐后派人到连城，找梁明德挖所谓“中南第一大特务莫雄”的罪证；天津、北京专案组，也来找梁明德挖王光美和南汉宸的历史问题……面对众多的专案组，老人始终用手势比划，什么也不说。专案人员一无所获，扫兴而去。辽宁专案组当然也

不甘寂寞，他们多次派人到连城审讯老人，还转道赴广州找莫雄等搜集黑材料。然而查来查去，人们却异口同声证明老人是为红军突围、长征送情报的英雄，是革命有功之臣。

1972年辽宁省革委会确认梁明德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老英雄，决定平反昭雪，补发工资。赤诚的老人接到一大笔工资后，首先邮汇1500元给原单位交纳党费，然后又捐资5000元为家乡修筑公路，改善交通。

在此之前，他曾拿出过去的积蓄，为本村购置一台发电机，使穷山沟里增添了光明。一天夜晚，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许亚到连城检查工作，所到山区均一片漆黑，唯独途经朋口小镇，突然发现山村灯光闪烁，引人注目。经询问，随干部告知：这是一位革命老人的无私奉献。许亚深受感动，执意下车拜访。交谈中，他意外得知老人尚有儿子项南远在北京，而项南又恰恰是许亚40年代在新四军的老战友。这真是天下少有的巧合。他敬佩这位饱经风霜的革命老人，更热爱这位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战友之父。他当机立断，连夜派车把老人送往省城疗养院检查治疗，让其早日康复。

## 病逝龙岩，家人 团聚终成遗梦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十年动乱宣告结束，项氏父子的历史冤案双双获得解决。已入耄耋之年的梁明德，虽仍重病缠身，但精神振奋，情绪饱满。此时，他的儿子项南也已恢复名誉，回到农业机械部担任领导职务，妻子儿女们也相继从各地农村返回北京。

每当家人团聚，项南总是十分思念远在老家的父亲。他想把老人接来北京赡养，但进京户口难解决。于是给中央组织部写报告，请求照顾。没有料到当时的部长郭玉峰却严肃地对项南说：“你父亲是一个老革命，你也是一个老干部，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嘛，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如果大家都要求进北京解决户口问题，那不是让组织上为难吗？”这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使项南哭笑不得，只好从此不提此事。

1979年，党中央决定调整中组部的领导班子，由胡耀邦出任部长。他了解项南父亲的历史，更熟悉项南。一次开会，他突然主动问项南：为什么不把老人接来北京团聚。项有口难言，最后只好将郭玉峰的谈话如实相告。胡耀

邦听后气愤地说了声“乱弹琴！”随即提笔写信，同意将革命老人接来北京落户，同儿孙们团聚。

福建龙岩地委立即把革命老人接到医院进行体格检查，发现老人患有严重肺炎，随即安排医院精心治疗，同时写信告诉项南：一俟病情好转，就派人护送北京。项南十分感激，当时他正受命率中国农机代表团出国考察，工作极为繁忙。然而，当项南率团登机准备起航时，突然接到父亲治疗无效病逝龙岩的电报，只好委托妻子汪志馨赶赴家乡料理丧事。

父亲晚年孤居家乡病逝，使项南一家极为悲伤，也使父亲原属工作单位深感不安。梁明德毕竟是有过重大历史贡献的革命老前辈，为了悼念这位历史功臣，表达人们对其尊敬和思念之情，1978年11月7日，辽宁省在沈阳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闻讯后赶赴沈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会上的横幅庄严写着“梁明德同志追悼会”，省委任仲夷、黄欧东和老战友黄火星、罗青长、周子健等都纷纷到会。会上，许多人都不知梁明德与项南是父子关系，甚至连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也不知内情，曾好奇地问项南夫妇：“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是怎么认识梁明德的？”当项南说明原委，他们才恍然大悟。

习仲勋同项与年于30年代结成患难之交，40年代在陕西工作两人又是亲密战友。50年代后期，习仲勋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重要成员，文革中更惨遭迫害，被下放在辽宁海城工厂劳动改造。当他得悉老战友病逝家乡后，悲痛万分，亲自执笔写下1000多字的唁电，送到邮局发往辽宁省委。18年后，他又再次操笔撰文，热情赞叹项与年：“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他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的地下斗争，把项与年塑造成一个机智勇敢、沉着坚定、不事张扬、不怕任何困难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个见多识广、襟怀坦白、善与人同的同志”。“他生前对自己的历史从不宣扬，连向自己的子女都很少谈及”。这是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很少知道项与年（梁明德）这个名字及其传奇历史。他儿子项南也一直守口如瓶。所幸的是，在项南突然逝世前一周，他同我作了一次长时间交谈，向我透露了上述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并赠给一本资料，我感慨万分，曾作了详细追记。现特赶写成文，以表达对项氏父子的敬重和悼念之情。

（责任编辑 一尘）

# 项英遇难 调查实录

● 王春江

提到皖南事变，项英被叛徒杀害一事，人们十分关心。他究竟是被谁杀害的？他的贴身警卫人员，为什么要向他开枪？他的遗体在哪里？那个叛徒的结局如何？谁能有根有据地讲清这些问题？这好象是一个谜。

项英遇害的地点，是在安徽泾县濂坑的一个靠近山顶的山洞里，这个洞就叫蜜蜂洞。

1981年前后，我在皖南已经花了6年时间，沿着当年皖南事变的作战路线跑了几趟，许多地方都到过了，就是没到过蜜蜂洞。那时候，越爬山访问，越感到激动心弦。

现在已经进入70高龄的我，回忆起那段生活，仍历历在目。

在分散突围的时候，一群年轻的新四军女战士（实际上是上海、江、浙、皖、赣数省的女学生，为了抗日救国投奔新四军穿上了军装），在反动军队追赶之下，逃到了猗猗崖。这是一个上百丈高的悬崖，崖石直立，如刀劈斧剁。崖下有

一个很深的、面积只有五十多个平方的水潭，名叫黑龙潭。流水从山峰高处落下来，发出巨大的轰鸣。这是几乎没有人来过的绝境。

几十位年轻的新四军女战士就是从数百丈的悬崖高处，跳到黑龙潭周围被摔死的。有一位女战士，大腿骨摔断了，可是她没有死。她竟然拖着一条断腿，爬了好一段路，来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门口。早晨，这个农民一开门，发现了她。身上的灰军衣破烂不堪，跌折了的大腿骨白沙沙的露在外面。头发散乱，惨白的脸，很瘦，两只眼睛还睁着，是灰色的，没有光。这位农民急忙把妻子喊来把她抬进了屋，连一杯水也喂不下去，两个小时以后就死了。我请这位农民领我到了那个无人区猗猗崖、黑龙潭，请他亲口讲述这段无人知晓的故事。就是这位农民，领着乡亲们，掩埋了几十位战士的遗体。

访问过猗猗崖，我下决心去访蜜蜂洞。

泾县县政府负责接待工

作的领导人对我说：“这些年，我们不知接待多少批参观访问者，没有任何人提出要参观蜜蜂洞。我们这里的领导人、向导，也都没有去过。那是一个无人去的野人谷。”我坚持说：“你们如果有困难，我就一个人去，无人区也好，野人谷也好，项英既能在那里住两个多月，我们现在也应该上得去。”

我这段话引起了其他参观者的兴趣，连我共有7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由地方政府帮我们请了一位上山砍柴的山农，领我们攀登野人谷，直奔蜜蜂洞。

野人谷，就是一个大山沟，有几十丈深。有点像泰山里边的老龙沟，不过更险、更陡、更深。山沟从山顶劈下来，沟边就是一个大山坡，从下向上约有五华里。山坡上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蜜蜂蝴蝶成群成队，飞来飞去。

没有路，只有沿着山沟边一步一步向上攀。如果一不小心，掉进山沟就没命；稍不注意荆棘就刺进了肉里。

到了山顶，我们每个人的胳膊都出了血。

山洞只有两间房子大，石缝里有点潮湿，还生有几棵虎耳草，又瘦又小。

这是一个无人区。蜜蜂在山坡上采花，在洞里酿蜜，因此就叫蜜蜂洞。项英被杀，就在这个洞里。

安徽有一位游击英雄，人称“打不死的刘奎”。他是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高个，大眼，一身虎威。项英遇难那天晚上，刘奎在山腰的草棚里负责二线保卫，枪声响了，他立即带领几个警卫人员来到蜜蜂洞，发现项英已死，他背着

项英的遗体，走出蜜蜂洞，掩埋在山腰中间一个陡坎下面。建国以后，刘奎曾经带领项英的子女重进深山，寻找遗骨，空手而归。刘奎很惋惜地告诉我：“项英同志在山洞已隐藏两个多月，有地下党送吃送喝，有地下县委不断汇报情况，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已经联系了四十多位被打散的新四军官兵，作战科长李志高派人侦察好了过江的路线，就准备通过地下联络点过江了，突然之间出了事，真像一场恶梦！国民党悬赏几十万个银元要项英的头，派几十万大军也没能捉到项英，结果却被一个叛徒杀害了，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在中央高级干部当中，从来也没有出过这样的恶性事件！”

当天夜晚，睡在蜜蜂洞里的共有4人：项英、周子昆、项英的警卫员黄诚，另一个就是叛徒副官处副官刘侯总。项英、周子昆中弹最多，当场死亡。黄诚身中两弹均在脖颈

上，因为没有击断喉管，伤势很重，出血很多，被刘奎等人背下山，被当地老百姓救活。80年代，他在老家江西工作。我通过刘奎把他请到合肥，很难得地见了面。黄诚是个中等偏下的小个子，人很忠厚老实。他详细地讲述了那天晚上的情景：

“政委和参谋长在下象棋，要我先睡，刘侯总在一边看棋。我睡醒了一觉，抬眼一看，还在下棋。我就说：‘首长，该睡觉了，别再下了。’政委说：‘你别管，睡你的觉。’听说三两天要过江了，首长们很高兴。我翻个身又睡着了。睡在梦中，猛然听到几声枪响。我一伸手就抓头下面的短枪，只听砰砰又是两枪，我的脖颈上像火烧，就昏迷过去了。”

黄诚还介绍，刘侯总原来使用的短枪，只能打单发，他几天前提出要和陈得胜换枪。陈得胜和黄诚都是项英的随身警卫，不高兴同他换。项英

出面做工作，陈得胜才勉强同他换了枪。刘侯总就是使用陈得胜那只好枪，可以打连发，才单人单枪杀死两位首长，击伤黄诚，然后到反动派县政府里去领赏的。

陈得胜是个大块头，比黄诚要高出一头。我访问他的时候，正担任芜湖军分区司令员。他说：“项英叫我与刘侯总换枪，我心中生气。他凭什么要把我挤下山，留在首长身边，我实在想不通。我服从了命令，首长却被杀了。这个教训，真使我终生难忘。”

刘侯总是个什么人？他与项英可有什么仇恨？这个问题，黄序周说得比较清楚。

黄序周是当年新四军军部的副官处长，经常跟随在叶挺身边。1980年春天，我到武昌水果湖访问他。这时他已经从湖北省政府副秘长的岗位上离休，患严重肺气肿。平时，他是不接待来访者的。这次，由于采访有关叶挺、项英、刘侯总情况，他不但热情接

1938年在延安，项英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合影。

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

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待,而且特别有精神。他那魁梧的身材,手抚着胸前的拐杖,坐在门前的树荫下,两眼炯炯有神。南昌起义时,他就是叶挺将军部下的一名团长,是员虎将,现在虽已80高龄,仍然闪现出当年驰骋疆场的虎威。当谈到叛徒刘侯总时,他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

刘侯总文化很低,是农民运动涌现出来的武装干部,相当于一个县的武装部长,是位神枪手。红军长征的时候,他留在地方坚持武装斗争,钻山窝打游击。敌人不但没有消灭他,他领导的队伍反而壮大到几百人。新四军成立,他的队伍被整编,但工作没有及时安排。他自认为是有功之臣,安排职务低了,他大发脾气,高不成,低不就,就晒着了。他常喝酒,发牢骚,骂人。

副官处长黄序周找叶挺说,这个人长期不安排,有情绪,影响不好,应该妥善安排一下才好。叶挺叫黄序周去找项英。项英听黄序周一说,也为难地说:“这个同志不好安排,水平不高,脾气不小。组织部门协商几次,别人都不敢要。”项英问黄序周:“你那里能不能要他?如果能收下来,也帮我解决一个难题。论功劳,论资历,他在你面前也许会老实一点。”黄序周说:“如果别处分不下去,你给我,我就收下试试。”

刘侯总就这样到了副官处,在黄序周面前的确也还算听话,牢骚少了,也没出什么乱子。这与黄序周平等待人,经常谈心有关。

在事变当中,刘侯总这个人又怎样挤到项英身边,取得信任的呢?黄诚、刘奎、陈得胜三个人做了解答。分散突

围以后,项英等人第三天才在半路上遇到刘侯总。由于没有东西吃,还要连续爬山,钻树林,项英身体很弱,胃病又犯了,简直寸步难行;其他人行走也有困难,更没办法背人。刘侯总从小在山里长大,擅长爬山。他身上的口粮没断,还有力气。他自告奋勇,背着项英爬山。项英被感动了,视他为救命恩人,从此,各方面项英都照顾他。换枪,把陈得胜派出山洞,都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干出来的。

项英遇难以后,大家按计划顺利过了江。对于项英、周子昆遇难,江北二分区政委曾希圣怎么也没办法相信。他怀疑这里边有鬼,便把项英身边职务最高的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关了禁闭,大会批判,勒令交代问题。身经百战的李志高,曾经和项英顶撞过,现在即使是一身是嘴也没法把问题讲清楚。李志高一气之下,抓过一支长枪,推上子弹,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颅,脚蹬枪机,自杀身亡。其实这个使曾希圣没法相信的谜,解放以后在敌人的档案里,查清楚了。

刘侯总杀了项英和周子昆以后,翻过山到敌人太平县政府去领赏。敌人也不大相信这是事实,事变已过两个月,项英还在山洞?这可能吗?便派了一排人到蜜蜂洞来看尸体。因为山路难爬,只上到半山腰,这排士兵就不愿上了,就叫刘侯总一个人上山进洞,割下项英的人头再给赏钱。刘侯总一人进了山洞,发现山洞里空空如也。他没有想到出事的当天,刘奎同志等人,已经来到山洞,掩埋了项英、周子昆同志的尸体,救走

了身受重伤的黄诚。刘侯总空手回去无法交代,他一个人翻过山头又逃走了。

刘侯总后来生活贫困,又亲自给蒋介石写信,还想领点赏钱。因时过境迁,蒋介石对他也失去了兴趣,没有理他。这个无耻的叛徒,尝尽人间的白眼,在贫困中死去。

在皖南事变这场历史悲剧中,展示了叶挺和项英两个人崇高的精神世界。

在面临全军即将覆没的危机关头,叶挺挺身而出,誓与战士共存亡,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精神。项英的错误,是认识上的错误。

叶挺和项英,都是革命烈士,他们的目标、信仰,都是共同的。如果认为:目标一致,一切都万事大吉了,这是不现实的。目标一致,仍然存在矛盾,有时还很尖锐。

叶挺和项英,存在着许多不同点:在北上方面,一个同意中央北上的决策,一个是对中央的决策有一定的保留;一个是衣食住行不太讲究,一个是西装革履、在可能范围内比较讲究;一个习惯游击战,打不了就走;一个主张游击战,又注意运动战;一个出身于正式的军官学校,一个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两个人的差距,如能取长补短,何尝不是好事。但由于项英习惯于一个人说了算,习惯于家长制的领导方法,不尊重叶挺,这就酿成了人生一大悲剧。

团结、民主,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两项,什么事也难办成。如果没有互相尊重,没有民主,没有不同意见的协商,习惯于家长制的活动方式,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团结一致。(责任编辑 舒元璋)

# 成仿吾千里状告张国焘

● 汤胜利

1938年4月,张国焘叛变了革命,这决非偶然。早在此之前,他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恣意推行“左”、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因而受到无数同志的抵制和揭露,已故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坚定共产主义战士成仿吾同志,就是这些同志中的一个。

## 张国焘推行错误路线 成仿吾历尽艰险上告

1931年7月,为了参加国内斗争,成仿吾毅然离开德国柏林,秘密回到白色恐怖的海。他曾是20年代创造社的重要成员,在上海颇有名气。成仿吾到上海后为了他的安全,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尽快离开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问他,你愿去鄂豫皖根据地,还是去江苏省委?成仿吾表示愿意到鄂豫皖苏区。9月左右成仿吾秘密来到崇山峻岭的鄂豫皖根据地,出任省委宣传部长、省苏维埃文委主席、省教委主任及红安中心县委书记。

位处大江之北的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全国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拥有红军4万、人口数百万,纵横数百里。与位处大江之南的中央苏区,构成了对蒋介石的老巢南京的钳形之势,成了蒋介石的两大心腹之患。成仿吾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这是因为张国焘利用王明授给他的特殊权力,以肃反为名,恣意杀害了周维炯、许继慎等数以千计的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创始人和骨干。还由于他推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和实行军阀主义宗派主义的统治,导致鄂豫皖苏区被严重削弱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他还擅自将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拉走,放弃了苏区军民生命和鲜血创建的江北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使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

成仿吾虽幸免于难,但他对张国焘推行的

“左”倾肃反政策和右倾逃跑主义,极端憎恨。为了挽救鄂豫皖根据地,1933年9月,成仿吾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等决定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状告张国焘。派谁去合适呢?省委研究决定派成仿吾以特使身份赴沪。当时鄂豫皖苏区已大部丧失,四周敌军密布,寸步难行,成仿吾正患疟疾,走不动路。为了革命事业,成仿吾不顾个人安危,临危受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关系鄂豫皖根据地前途命运的特殊使命。

为了此行成功,沈泽民沾着米汤用俄文在成仿吾的衣服上写了一行字:“派成仿吾到中央报告工作。”留守的红军师长徐海东见他走不动路,送给他一头骡子。为了确保突破敌人封锁线,省委又派了一个由四百多人组成的红军独立团和由陈先瑞、韩先楚等人组成的40人的便衣队为他护行。9月底(或10月初)成仿吾抱着病躯,伏在骡背上,踏上了艰难征途。由于到处是敌人,不得不夜行晓宿,边走边打游击。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进,快到目的地了。可是,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险事发生了。经过一夜的行军,成仿吾一行凌晨来到湖北省黄安县深山里一座古庙前。由于长期艰难奔波加上严重的疟疾,成仿吾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他伏在骡背上,已经无力下来。两个战士将他扶进一座荒庙。熬过一个白天,到了晚上,不到半夜就可安抵花园车站,可偏偏在这一天出事了。下午三点,当疲惫的人们还在沉睡时,庙前的哨兵突然发现,大批敌人平端着枪、猫着腰、不声不响在茂密的草丛中,离破庙不过300米了。幸而哨兵报警及时,庙中的人抓起枪枝,向庙门冲去。人们急忙将病重的成仿吾搀扶上骡子,在指战员们的保护下,冲向较高的山地。顿时枪声大作。由于成仿吾骑在骡背上,成了敌人射击的活靶,密集的子彈呼啸掠过他的头顶。成仿吾临阵不乱,大声命令:“卧倒,射击!”慌乱的人群,立刻镇定下来,进行还击,子弹像暴雨一样



射向敌人，终于打跑了敌人。

一场惊险过后，天黑下来。成仿吾在大家的护送下，又踏上了征途，当晚安抵目的地——红安县花园车站，在附近一家农户隐蔽下来。此时护送的红军任务已经完成，就踏上了归途。成仿吾隐蔽的这家农民，乃是护送他的一个姓王的战士的胞兄。

成仿吾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姓王的战士，在返回部队的途中起了坏心，把成仿吾的下落密告了敌人。幸而他的哥哥凌晨就把成仿吾送到了花园车站，当敌人追到车站时，成仿吾乘的火车已向武汉方向开动了。

## 上海受困失联系 鲁迅救助找中央

几经风险，成仿吾又来到了白色恐怖的海。此时已届严冬，天气阴沉，又冷又湿，成仿吾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他因连日奔波，可恶的疟疾害了8个月，还未好，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令他万分焦急的是，中共中央已撤至中央苏区，原来接头的秘密联络机关，不能再使用了，在马路上偶尔遇到熟人，也不敢轻易交谈。怎么办？成仿吾只好在看报中打发日子，并想从中找到一些有用的消息。突然，他看到一张报纸骂鲁迅是“准共产党”。他闪现了一个念头，何不去求鲁迅，也许能找到党中央。但是，又有点担心，鲁迅会不会计较他，因为在20年代与郭沫若、郁达夫等创办的“创造社”与鲁迅之间有过不愉快。经过深思，成仿吾最后决定，还是去见鲁迅。于是，成仿吾来到内山书店，见到了内山先生。内山突然见到成仿吾，惊讶地说：“哎呀，你还活着？”因成仿吾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后，国民党报纸几次造谣，说成仿吾死了。内山急忙问成有何事情？成仿吾说：“因为生病，特来上海养病。”接着急切地问内山：“鲁迅先生怎样？”内山回答：“他还上海。”成仿吾说：“我想见见他。”内山听罢，爽快地答道：“可以，你明天来听回话。”内山告知鲁迅成仿吾求见的讯息，鲁迅知成此次求见，必有要事，慨然应允。第二天下午，成仿吾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一家咖啡馆，只见鲁迅已等候在那里。看见成仿吾进来，急忙向前迎了两步，伸出双手与成仿吾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不放。“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成仿吾穿一件旧棉袍子，象个乡下小学教师。鲁迅看成仿吾



1945年成仿吾(右一)与友人合影

这身打扮和他又黑又瘦饱经风霜的脸，话中有话地问道：“从家里来的吧？！”成仿吾会心地答道：“是啊，从湖南老家来的。”两人交谈了一会儿，成仿吾低声向鲁迅道明了来意：“我是来请你帮助的。我想找党的关系，你有办法吗？”鲁迅听后，答道：“可以。你来的正巧，再过几天，我就没有办法了。”原来瞿秋白在上海的处境特别困难，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建议张闻天将瞿调到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瞿已接到电令，过几天就要起程了。瞿秋白是上海地下党唯一与鲁迅有联系的，一旦瞿走了，再找地下党鲁迅就爱莫能助了。

鲁迅立即将情况告诉了瞿秋白。

过了两天，成仿吾向党的上海分局作了汇报，上海分局向瑞金党中央作了报告。很快，瑞金回电，命成仿吾于1934年元月10日前赶到瑞金。上海分局即派人送成仿吾秘密离开上海。

## 中央发出《指示信》 鄂豫皖转危为安

1933年12月30日，成仿吾离开上海后，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奔波，于1934年元月11日安抵瑞金。当日下午，成仿吾被领进六届五中全会会场，周恩来同他握手，并向在座的人介绍：“鄂豫皖的代表成仿吾同志来了。”意志坚强，轻易不动感情的成仿吾，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周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元月15日，成仿吾向大会汇报张国焘擅自带领主力部队和电台向西逃跑，丢弃鄂豫皖根据地情况，要求中

央速派重要军事干部前往处于困境中的鄂豫皖根据地。

成仿吾满以为他的汇报一定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万没想到,他刚讲了五分钟,就有人站起来,气冲冲地伸手指着成,劈头盖脑地嚷道:“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你是右倾机会主义!”会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主席台上坐着4个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博古不予制止。刘少奇显得很难过。张闻天为成仿吾解了围,他摆摆手说,鄂豫皖的问题回头单独谈。

五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专门开了一次会,听取成仿吾的汇报。会上,他列举大量事实,揭露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一系列罪恶行径,在座的同志表示了极大愤慨。张闻天气愤地说:“张国焘这个人,我知道。……”为了使更多的中央负责人了解张国焘的罪行,除了上面汇报之外,他还设法向正在瑞金的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了揭露。成对李说:“张国焘带着红军实行所谓‘游行示威’,从鄂北到河南,入关中,进陕南,他不知向谁示威?结果,把队伍拖得精疲力竭,使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李德听了,也对张国焘的行为深表不

满。成仿吾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193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信的一开头就写道:“中央听了成仿吾同志的报告后,对于鄂豫皖苏区这一时期的斗争的总结与你们今后的任务,作如下之指示。”《指示信》对张国焘做了批评,赞扬了坚守在鄂豫皖苏区的同志英勇顽强斗争,指出正是这些同志的英勇斗争,才未使鄂豫皖苏区完全丧失,才使国民党反动派一举荡平鄂豫皖苏区的企图破产。《指示信》发出后,为了加强鄂豫皖地区的斗争,中央接受了成仿吾的建议,派骁勇善战的师长程子华前往鄂豫皖。程领命后,即前来看望成仿吾。一进门,这位红军战将双脚一并,立正向成端端正正敬了一个红军战士礼,向成报告:“我奉命到鄂豫皖去。”成仿吾热情接待了他。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

成仿吾历经两个多月,行程数千里,历尽艰难险阻,向党中央状告张国焘的意义重大:使正处困境的鄂豫皖苏区军民在精神上得到巨大鼓舞,在军事上得到巨大支持,促进了鄂豫皖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广告



## 哮喘病的最新中医疗法

被医学界称为三大顽症之一的哮喘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据最新调查:全国患这种病的人多达280多万,患者多么希望找到一位能够真正根治这种顽症的医生,获得新生啊!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黄寺安德里北街21号总政医疗保健中心二楼227诊室哮喘科的李欣主任,在数十年科研临床治疗过程中,采用最新中医理论,研制成功纯中药制剂“R—喘必宁A型”、“R—喘必宁B型”,其药效已得到中医学专家的认定,经临床观察,已使数万名患者得到了康复。

祖国传统医学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从神农尝百草到华佗的刮骨疗毒,以及后来的药王孙思邈、医圣张仲景等无数贤人志士,为祖国传统

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注入了勃勃生机,成为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祖国传统医学这个国之“瑰宝”传播海外,开辟世界医学新领域,已成为当代医务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李大夫肩负起这个历史使命,并且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一位来自台湾的张又安教授,今年65岁,他患哮喘病已20多年,去年回大陆探亲,在报纸上看到了李大夫治疗哮喘病的报道消息后,便立即在亲人的陪同下来找李大夫救治,用了2个疗程的药,奇迹就出现了,服药后两个星期就不那么喘了,两个月恢复了正常。

李大夫深知要想在哮喘研究和治疗上有所突破,不仅要有坚强的毅力和信念,还必须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

作为一名医生,李大夫深知把患者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是医务工作者的最崇高的职责。她总是以一名医生的高度责任感去照顾患者。对前来就诊的患者,她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地去治疗,使数千名患者在这里得到康复。她的热线电话:010—6427.1431响个不停。实践证明,李大夫在对纯中药“R—喘必宁A型”、“R—喘必宁B型”的研制应用上,充分显示了她勇于总结摸索、执着追求和超常的才华。

# 公审南京大屠杀罪魁 谷寿夫目击记

● 金光群

1946年2月15日，中国政府建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始调查侵华日军在南京的罪行。

这年夏季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到南京新民报采访部工作。采访主任浦熙修对我说，现在军事新闻很重要，让我去。一间大办公室外面挂着“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牌子，我便走了进去。

从此，我常去军事法庭采访，随时报道他们的工作进展，有时随他们去现场，发掘死难者尸骨，他们开调查庭，有时也通知我。

1947年2月6日，中午刚过，南京中山东路307号原励志社大门前，聚集了大量围观者，他们都想到里面，去亲眼看看这个杀人魔鬼谷寿夫的嘴脸，但是，临时布置成法庭的礼堂，充其量只能容纳千人左右，为了保证审判秩序，事前军事法庭已经给有关证人、观审旁听者、有公务的人员，发了入场证，法庭内外，警卫森严。尽管当时天气还很冷，元宵节刚度过，但人们仍不肯离去。法庭为了照顾这些场外旁听者，在走廊等处，安装了4个大扩音喇叭。当我走到这座红墙绿瓦的建筑门前，只见宪兵、警察峙立两旁，门头上高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大横幅，气象庄严，连门口的两个石狮子，似也昂首挺胸，扬眉吐气。

当我走进礼堂，见到楼上楼下已坐无虚席。礼堂正中靠北，为审判台，台上布置审案，覆以白布，这是审判官席；案后为红丝绒幕布，台下长桌，为翻译席；左侧是中外记者席，右侧为证人席、律师席，被告栏在场中偏

右。台两旁有数名法警肃立，显得郑重而严肃。

下午2时整，石美瑜庭长率众法官入场，石庭长在中央审判长席就坐，其他法官宋书同、叶再增、李元庆、葛召棠，以及检察官陈光虞、书记官张体坤分别就坐。审判长在扫视全场后，认为可以开始庭审，向法警说：“带被告谷寿夫！”

这时全场沉寂安静，大家都等着看这家伙是什么怪物，谷寿夫已经等在门外，法警2人，押送进场。只见他矮胖身材，留有小胡子，长方脸，面目凶恶，身穿黑大衣，头戴灰呢帽，里面穿黄色军便服。他胳膊上还挟一个黑皮包，满不在乎，似乎是来“参加集体会议”，尽量装作无事人一样，但他在被告栏站定，斜眼窥视场内动静，他被这种庄严肃静气氛慑服了，有点手足无措，掩饰不了他罪恶的内心惶恐。

石审判长大声问：“被告姓名、年龄、籍贯。”

谷答：“谷寿夫，66岁，日本东京都人。”双方问答，均由日文译员翻译。审判长请公诉人宣读本案起诉书。

起诉书中指出被告谷寿夫从1937年8月率部入侵华北、华东各地，沿途纵容部属任意杀人、抢劫民财、强奸妇女，犯罪累累；被告在攻入南京，进行有预谋、有计划的大规模杀戮，举世震惊，旷古未有……，起诉书中列举大量被告部队犯罪事实后指出：被告毕生为日本侵略国策积极效力，处心积虑从事侵略，破坏国际和平，侵犯我国领土；在战争期间又违

反战争法规和入道，纵容、指使部属以极其残忍手段杀害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致使数十万人惨遭杀戮，穷凶极恶，举世共愤，应判处极刑，以维护正义与和平。

公诉人读毕，又由日文翻译再读一遍，前后共用40多分钟。谷寿夫仔细倾听，不时还用铅笔记点什么。

审判长接着说明：被告罪行数不胜数，违反国际战争法规，战时俘虏公约等，犯有战争罪，违反和平罪、违反人道罪。其罪行经市参议会调查，就有2784件。被告对起诉书中的指控有何话说？

谷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奉命到中国作战。战争期间，双方都要死人，对此我深表遗憾；至于说我的部属屠杀南京平民，则是没有的事。”看来他是决心拒不认罪。

审判长改问其他问题：“日军何时进城？兵力多少？”

答：“12月12日黄昏我部已有小部进驻中华门，13日黎明正式进入，共3个联队，人数不详。”

问：“被告部队首先入城，中岛等部队在14日才先后进入，据调查：13、14两日已开始大屠杀，你有什么责任？”

谷寿夫力图抵赖，早就准备好的回话：“我可断言，决无此事。”

审判长忍着怒火，又问：“本庭在中华门一带调查时，有600多件检举，皆为12、13日案件，你还没有责任吗？”

答：“12日、13日战事在激烈进行，外面不会出现平民，如有不肯离家者伤亡，那也难免。”

审判长又将市参议会调查表和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统计表，交交警拿给谷寿夫看，谷双手接表，又拿出地图、戴上眼镜，认真翻看，不时还查看地图。看过后，自以为找到了抵赖的根据。他申辩说：“两份表上所列地点，有些并不在我的防区；再说表上掩埋日期为22日，我的部队21日已离开南京，所以不是我部所为。”他还说：“没有确实证据，我是不能承认的。”

审判长让法警把从中华门外丛葬坑中，挖出的部分受害者头颅拿出来！当庭陈列一大摊头骨和法医潘英才对遗骨写了鉴定书，死者可分为6个部分：被刀砍死者、枪弹射击而死者、身首异处者、被钝器击死者、被火烧死者

和妇女遭强奸又被杀者。法医鉴定表上说明了这些颅骨取出的地点。场内观审者见到这些无辜者尸骨，无不伤感。谷寿夫还嘟囔：“不是我部所为。”

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长许传音要求作证。许会长说：“日军进城后，秩序混乱，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抢劫民财，以致到处是尸体。日军提出要我红十字会负责掩埋，发给通行证，保证人员安全。我们出于人道，答应了下来。从12月15日开始工作，沿途路旁，横尸遍地，有俯、有仰、有跪、有被烧焦，还有妇女肚子被划开，惨不忍睹。我们在中华门外几个地方，就埋了78趟，计4313具，22日完成第一批掩埋工作，制了统计表，但是尸体都是22日以前受害的，这一点谷寿夫是赖不掉的。这里的几张表，是中华门外的。”许传音还讲了许多他亲眼目睹被残害者惨状。

谷寿夫还要说有些地点，不是他的防区。审判长没有让他再说下去，而是请原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密斯作证。

史密斯说：“本人当年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秘书。日本军队进城，根本无视国际准则，不尊重安全区工作，任意闯入，残酷虐待难民，我们不得不向日本使馆抗议。日方要求我们提供事实，我们把所看到的一件件日军违法事实，都写成书面备忘录，多次连同抗议书，送给日方，但日方既不答复，也不采取制止日军的非法行动，我们所写的杀人、抢劫、强暴妇女等日军暴行，均系事实。他又举起手上的一本书说：这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写的，书名为《日军暴行纪实》，书上所写的日军种种暴行，也都是事实。现在我把这本书送给法庭。”

接着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起来作证。他说：“自日军进入南京以后，在全城广大范围内杀人放火，杀戮平民，并把他们当中的人，认为当过中国军人的，拉去枪杀，情形极为严重，时间达7个星期之久，尤其前7—10天内，杀害生命之多，无法计数，我亲眼见过日军枪杀中国平民，满城到处是尸体。田伯烈写的书，我也看过，我可以证明书里所写的日军一切暴行，都是事实。”

证人姚加隆发言，指控日军杀他家一家3口，并烧了他的家。受害人陈二姑娘，哭诉两个日本兵以刺刀相威迫，把她轮奸了。她说：“他们是一群畜牲，我所以不能去死，为的就

是要控告他们。”

谷寿夫这时还假惺惺地问：“在什么地点？”

法官大声说：就在你的防区！

审判长又叫日方证人小笠原清出庭作证。这个日本人尽力为谷寿夫开脱，他说：“雨花台、中华门都是激战的地方，附近没有平民，没有被屠杀的人，所以，我敢断言，谷寿夫部队没有暴行……”

日方证人一派胡言，全场哗然，有人说他“胡说八道”，有人喊叫：“滚开！”

法庭宣布，请被告辩护律师发言，两位指定律师张仁德和梅祖芳，明知被告罪在不赦，但既是辩护律师，搜尽枯肠，违心的说些似是而非辩护辞，并要求法庭本着中国传统美德和基督精神，宽大为怀，从宽从轻判处。

这时已到下午5点45分，法庭宣布休息10分钟后放纪录电影。

两部16毫米纪录片，很短，一部是美国牧师马吉，冒生命危险，偷偷拍摄保存下来的；另一部是日军自己拍的，为的是显示战功，炫耀武力，也不长。

全场一片漆黑，白色银幕上现出一队日本兵，有人还扛着小旗，他们在南京街头搜捕拦劫行人；街上横七竖八布满尸体，有黑色被烧焦的死尸；一个日军正举刀砍向一个中国青年；一大排跪着的人，正被砍杀；一处土沟旁排列一大排被砍下来的人头；一个操场上十几根木柱上，都绑着剥去衣服的青壮年，日本兵许多人，端着刺刀，吼叫着向前飞跑，刺刀扎进他们的胸腔，鲜血喷涌；墙根一大群被捆在一起的人，在密集弹雨中一个个倒下；一个日本兵正扯下一个姑娘的裤子……；有的妇女被奸后，又被肢解；几个中国人正在被活埋……20分钟的电影，把人们又带到那暗无天日的年代。全场灯亮了，许多人流出眼泪，有人高喊：“枪毙谷寿夫！”

法庭让把谷寿夫带下去，刚才他可能又看到自己的部队，所以低头不语。

2月7日、8日继续公审，有几十位证人到庭作证。市参议会报告调查侵华日军罪行经过，共有2784案，分十大类，有枪杀、刺杀、集体屠杀、烧死、打死、先刑后杀、先奸后杀、炸死、水淹等等，其中三分之一案件在中华门，12月12日到20日案件最多，要求法庭对有关屠杀责任人，均以战犯罪引渡到中国接

受公审。

其他证人还有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或其亲邻。证人赵荣生、陈福宝、朱光荣等，当庭陈述亲身受害经历，他们有不少都是死里逃生，有的受伤压在尸体下，有的受伤跳至水中，深夜逃出来。这两天，还庭讯了日军在汉中门、草鞋峡、下关江边、中华门外等地集体屠杀的罪行。谷寿夫极力推脱，一再声称与他无关。法官问他是否看到过《朝日新闻》刊登两个日本军官进行杀人比赛事件？谷寿夫故意装作一无所知。法庭把罗谨提供的日军自己拍摄的15张照片，让被告去看，照片上拍出日军虐杀平民的现场等。谷寿夫明知再也无法抵赖了，这是铁证，但是这个狡猾的恶魔，竟颠倒黑白地说：“这些照片是‘捏造’的。”

检察官陈光虞忍无可忍，大声指斥被告顽固狡赖，他说：“南京大屠杀是日军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造成数十万人死难的浩劫，旷古未有，凡参加屠杀罪行的部队，都应负责，被告难逃罪责，尤其13、14日，城内只有被告的部队，这两日的罪行，显然无法推卸。中国向以宽大为怀，不求报复，但面对在南京的日军滔天罪行，杀10个、百个、万个谷寿夫，也难除此深仇大恨，请法庭判处被告死刑！”

全场顿时响起掌声，表示拥护。

两天后，谷寿夫又想出新花招，写了一份“申请书”，请法庭传讯会攻南京高级将领柳川部军参谋长田边盛武、6师团参谋长下野一霍等。大概他想拖延时间，也想再找几个垫背的。

2月25日，再审谷寿夫，审判长石美瑜通知被告：“对南京大屠杀有关共犯嫌疑人，本庭正在准备引渡，但并非作证；被告申请传讯作证，不合诉讼法规，予以驳回。”

1947年3月10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公开宣判。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判词中指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2日起，侵入南京中华门的日军，立即开始屠杀放下武器的俘虏和平民，次日被告率部进城以后，会同随后入城的中岛、来松、牛岛师团等部的日军，在全城开展大规模屠杀。判决书中列举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汉中门外及下关东边草鞋峡等地，遭日军集体屠杀者达总数19万余人，均在谷寿夫部驻南京期间……除已列举案件外，尚有378案（附件）。据国际委

员会外侨统计，在12月16日、17日两日，妇女被奸者超过千人，外侨团体迭向日方抗议，谷寿夫等置若罔闻，陷城之初，到处放火，全城房屋三分之一被焚。民财、商店被洗劫一空，入驻南京各师团将领及松井司令官均有罪责。被告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有大量强奸、抢劫、纵火、破坏财产等罪行，手段毒辣，穷凶极恶，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已构成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应予以极刑，以昭炯戒。听审现场观众极为满意，宣判后通知被告，如不服判决，十日内可以上诉。

谷寿夫得知判处死刑，自在意料之中，但还想作垂死挣扎，事后很快申请复审。

军事法庭于3月18日，将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要点，连同谷犯的《申请复审书》，送呈国民政府主席和参谋总长审批。

4月25日，参谋总长陈诚转来国府主席蒋中正的批文：原判尚无不当，应予照准。被告要求复审，应予驳回。

当天晚上，军事法庭贴出布告，宣布26日上午，对战犯谷寿夫执行判决，并通知了新闻单位。

26日上午9点多钟，南京市民齐集街头，万人空巷。我在上午10点前，到小营战犯拘留所前楼。这是一座白色旧楼，楼上大空屋内，临时布置成法庭。审判长石美瑜、检察官、法官、书记官依次坐定。10点整，审判长令提犯人谷寿夫。谷寿夫押来，身穿军便服，立于法庭正中，审判长问明谷犯姓名、年龄、

验明正身后，宣布：本庭判决，已奉最高当局核准，你申请复审，也同时驳回，今天执行死刑判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谷犯还故作镇静，想了一下，说“如果以我的死，换来中国大众对日军的仇恨情绪的减除，那也值得。”法庭不让他再胡说下去，问：你还有什么要求？

谷犯答：“我要求写遗书。”

法庭允准，立即叫法警在左前角窗下，放一张小桌，又找来笔墨纸砚和一张木椅，谷犯坐下，边想边写，约20分钟，写好两张十行纸，交法警呈法庭转交，我瞥见上款为：“谷梅子”3个汉字，大概是写给家人的。

谷犯还想拖延时间，要求回监房同监友告别，法官表示：不准；他又生一计，说要回监房取东西，法官说：“可交法警去代取，你在此等候。”两名法警前往后院拘留所谷犯监房，把谷犯所有衣物用品，统统包来。谷犯哆哆嗦嗦在这些东西中乱翻一阵，看来无法再拖，只好取出一顶灰呢帽戴到头上，另取一副白手套，分别套在他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两只魔爪上。法庭问：还有什么事吗？谷犯说“其余东西都送给监友吧。”说完即被法警押走，这时已上午11点零5分，刑车已等在门口，车的两侧站立两行武装宪兵。谷犯押上刑车后，立即开动，车经中山东路、新街口，直赴南城中门外，沿途街道两旁，万民伫立，鼓掌欢呼，有的高呼打倒日本军阀口号。车到中华门，几乎在人墙夹道中缓缓前进，只见车前、车后的人群向前猛跑，他们要去刑场观看魔鬼

的下场。我们记者驱车紧随刑车之后。当到达雨花台刑场空地时，周围山上、坡上、平地上，满是黑压压的人群，谷犯在千夫所指，万目怒视中，已吓得魂不附体，瘫软如泥，法警2人把他架下刑车，他已无法站立，法警各牵其一臂，使他勉强跪下，执行法警举枪“砰砰”两枪，谷犯倒地毙命。这个不可一世的恶魔，终于受到正义的惩处，顿时全场热烈欢呼鼓掌，声震山谷。

（责任编辑 舒元璋）

◀1946年4月战犯谷寿夫被处死刑



# 南开大学元老

## 黄钰生教授

● 申泮文

1998年4月15日，是天津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著名的老教育家黄钰生诞辰100周年。黄钰生的名字是和南开大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长期担任南开大学秘书长，辅佐校长张伯苓，全面主持南开校务；“七七”事变后，他组织员工长途跋涉抵达昆明，代表南开与北大、清华两校通力合作，创建了战时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并多年担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师范人才；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在一片废墟上主持了南开大学的重建工作，使南开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天津解放前夕，带领员工英勇护校，将南开大学完整无缺地献给人民政权。1952年后，因“三反”运动遭受不白之冤被调离教育战线，担任天津市图书馆馆长，但他仍以满腔热情，历时三十八载，不懈地开拓图书馆事业，为天津以至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黄钰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历任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中央参议委员，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和名誉主委等职。1986年1月，88岁高龄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92年4月，因病在天津逝世，终年92岁。

作为黄钰生教授的学生和同事，我在黄老的领导下共事多年。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把他光辉的一生介绍给广大读者。

### 主持校务，强调从严治校

南开大学是中国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于1919年创办的，是南开学校教育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办好南开大学，张伯苓改变一般大学设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校长办公室主任等多种职务的办法，只设秘



书长一人，在校长领导下，统管全校公务。他聘请自己的得意门生、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与心理学硕士黄钰生来担任这个重要职务。黄钰生不负恩师重托，在二十多年的秘书长岗位上坚决贯彻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把南开办成全国一流高校。黄钰生向学生讲办大学的宗旨时说：“办大学是干什么的？简单地说，一曰润身，二曰淑世。润身是充实自己，提高个人道德素养；淑世是用润身所得去改造社会。”他又说，南大相信的只有两件事，人格与学问——下功夫修养求得人格，老老实实学习以获得学问。到南开来要读书，要做实验，要守规矩，要受考试。怕难的不要来，好奉承的不必来。

根据这种指导思想，他强调，从严治校，强调基础知识，注重能力培养，提高学生质量，厉行淘汰制，绝对杜绝舞弊。后来形成了南开的“三严”原则，即严谨的治学态度，严格的教学管理，严肃的工作作风。在黄钰生严格管理下，南开大学的办学秩序井然，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黄钰生特别注意教师队伍的建设。既重视延聘高水平人才，又重视培养新进。到30年代，受南开大学之聘来校任教的美国留学生比重越来越大。1934年全校教师41人，留学美国归来的有31

人,占76%,其中博士14人,硕士14人。这里面包括梁启超、蒋廷黻、范文澜、姜立夫、江泽涵、饶毓泰、邱守岳、杨石先、何廉、方显庭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他们济济一堂,在南开执教,提高了南开大学在当时高等教育界的知名度和地位。

黄钰生在教师队伍建设上还注意选聘本校或国内著名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来校做助教,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接受名教授的指导,使他们能较早地承担教学和研究任务,在短时间内崭露头角。如数学家申又辰、吴大任,物理学家吴大猷,生物学家殷宏章,经济学家吴大业等,都是大学毕业就留校任教,在南开校园的优越环境里奋斗上进,开拓他们自己成材之路的。

正因为贯彻了从严治校的方针,南开大学在抗战前办学的短短十几年成绩斐然,能与国内驰名高校为伍,毕业生的成绩单,被美英等国的大学承认,准予入学攻读高级学位。

## 日军入侵,组织师生南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28日,国民党军队稍作抵抗即撤退,日本侵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天津市,29日对天津市实施了野蛮的炮击、飞机轰炸、抢劫和纵火等暴行。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局部或大部分被毁。当时不少师生已撤往南京、长沙或重庆,黄钰生带领几位职工和少数学生在日军已占领天津之际仍留守南开大学,本想找船搬走学校一些贵重图书等物品,但日军对学校不停地进行炮击,留守已无意义,他们只好冒着密集的炮火突围撤退,进入英租界。事后据当地群众反映,日军从南开抢走大批物资,继之以炮轰,最后纵火将校园内全部建筑物付之一炬,使南开这座美丽的校园变成了一片焦土。黄钰生在8月中经海路转往南京,见到校长张伯苓,从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对张伯苓说,校长,我未能保护好南开大学,但我把南开各楼室的钥匙全部给您带回来了。张伯苓热泪盈眶,紧紧握住黄钰生的手说:“子坚,你辛苦了!”

1937年7月底,北平、天津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在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并于当年11月1日开学。但侵华日军继续南下,南京沦陷,武汉危急,长沙不断受到日机轰炸,临时大学学业难以继续,国民政府教育部乃命令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1938年2月,“临大”开始西迁入滇,除大部分师生由海路经越南去云南之外,另组织一支由244名学生,11名教师组成的队伍,以步行行军形式横跨湘、黔、滇三省去昆明,取名“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11位教师中包括闻一多、曾昭伦、黄钰生、袁复礼等著名教授,并由他们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指导委员

会,黄钰生任主席,负责具体领导工作。

要把这支二百多人的队伍安全地带到昆明,任务十分艰巨。旅行团的经费管理、行军路线、宿营、伙食安排,事无巨细,黄钰生都要亲自筹划和指挥。例如,旅行团的经费,不能带汇单或支票,必须带现金,这笔现金既有钞票又有银元,如有任何闪失,全团人马就寸步难行。黄钰生考虑到关系重大,就不顾自己已是四十多岁的人,自己亲自负责,携带这笔钱徒步行军。他用一条有夹层的长布带子,把钱款装在里面,然后把布带缠到腰际,外面再穿上学生的服装,跟学生一样,一步一步地走到昆明。后来他谈到此事时自嘲地说:“那时我是腰缠万贯下西南啊!”

在旅途中,黄钰生十分强调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生之间的团结。他经常说三校是一家,同学之间要好好团结,大家相处久了就互相了解了。他对南开的学生要求更严,南开同学与外校学生发生争吵,他首先严厉批评南开学生。

黄钰生以身作则的精神,更为旅行团的员工普遍称赞。二百多人的集体中,按年龄他是最长者,按地位他是一团之长,然而却没有半点特殊化,与学生吃一锅饭,同住地铺,同样跋山涉水。天还没亮,他最先从地铺上爬起来;晚上,别人已经打鼾,他还在煤油灯下听汇报、处理当天的事务,计划明天的行程。在湘西、贵州疟疾区,他亲自劝同学每天服两粒防治疟疾的药丸。少数不懂事的同学说,黄先生太婆婆妈妈了。但大多数师生体会到,这正是黄先生认真负责、关心师生的美德。

在以黄钰生为首的指导委员会精心组织指挥下,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行程1671公里,终于在1938年4月28日到达昆明,受到先期到达的三校师生和昆明各界人民的盛大欢迎。至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全部到达昆明,由长沙临时大学更名的西南联合大学诞生了。

## 协力同心,建设西南联大

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还没有出发之前,黄钰生就已经接受了筹备之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具体任务,被校委会指定为西南联大建设长,到昆明后就要承担起建设西南联大校舍的重任。

西南联大在昆明匆匆成立,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校舍一无所有。虽经云南地方鼎力相助,在昆明仍难全部立足,不得已,把文、法、商学院设在蒙自,工学院和理学院分设在昆明的东边和西边,租借会馆、盐仓和省立工业学校、农业学校暂时立足。后来由黄钰生出面,在昆明大西门外低价购得荒地120亩,并在他主持下规划、设计和建造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宿舍和铁皮顶土坯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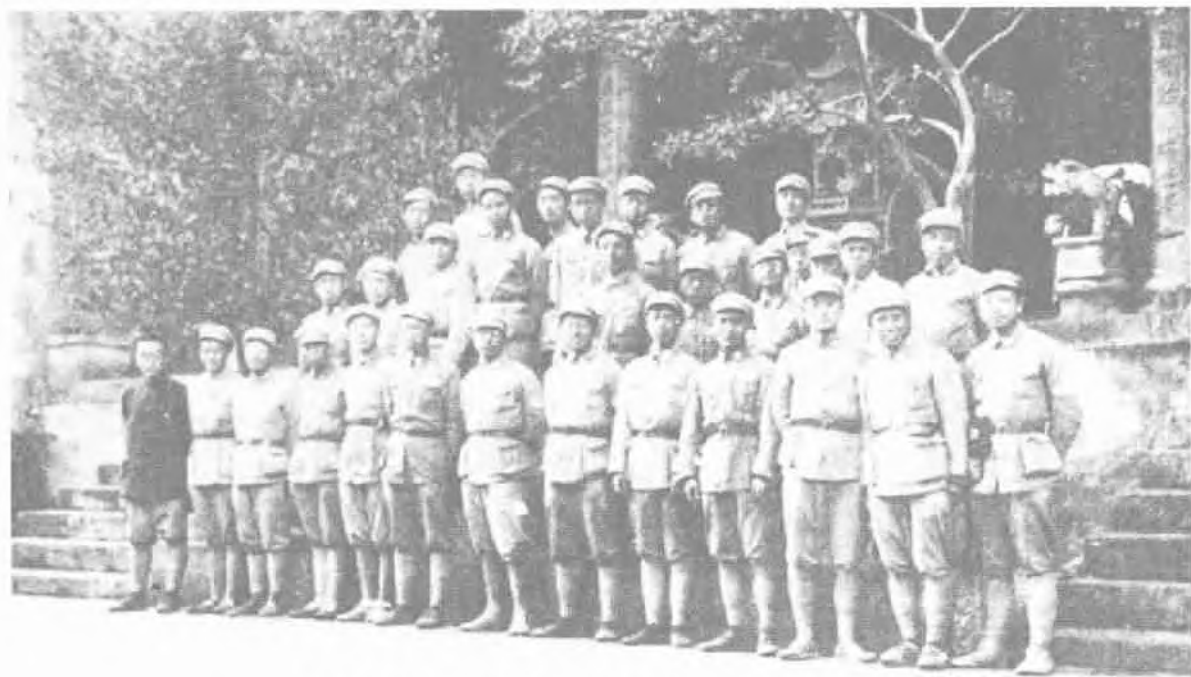
的简易教室,形成了联大的“新校舍”(北区),后不久又建造了马路对面的简易理科实验室(南区),这样,西南联大算是有了自己的教学基地。

就在西南联合大学成立的当年秋季,西南联大决定增设师范学院。增设之前,由黄钰生担任筹备组主任,增设之日,又由他担任师范学院院长,而且此一任就连续八年,黄钰生1938年4月16日接受师范学院院长委任电令时,师范学院是一张白纸,他需要解决诸如校舍、系科建设、教师队伍、经费、学生来源等一系列问题。首先求得云南省教育厅的特别支持,黄钰生租借到大西门外文林街昆华中学旧址为校舍;经费请求教育部增拨;与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文学院达成协议,将云大的教育系及师生和西南联大的哲学教育心理学及师生划归联大师范学院,再面向社会招生,解决了学生来源问题。师范学院设置了国文、外国语文、史地、公民训育、算学、理化、教育等7个系,完成了师院建制,同时也最后完成了西南联大的建制。至此,西南联大共有5个学院26个系,成为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系科专业最齐全的高等学府。利用西南联大名师如云的有利条件,由黄钰生出面做工作,师院聘得闻一多、罗常培、杨振声、杨武之、冯友兰等四十余人担任兼职教授和少数专职教授,并且聘请了邱椿、朱自清、江泽涵、刘崇宏等知名学者为系主任。这样,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就规模初具了。

在教务建设和管理方面,黄钰生认为联大师范学院要办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要出类拔萃。在学习方面,他主

张课堂讲授不求过多,应该给学生保留充分时间参加师生的课外讨论和博览群书。既重视教学,又注重实践,使学生的学习生活生动活泼。他还为师院制定了《学生毕业标准及考试办法》,对学生的知识、思想、态度、理念、人格等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学生必须从上述五个方面加强个人修养,使自己达到“足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的标准,否则不能毕业。在对学生的管理上学习南开学校的严格管理经验;学生一律在校住宿,有事外出过夜必须请假,男女生不得擅自进入对方宿舍,互访时只能在宿舍外的会客室会见;学生必须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早上要参加早操和举行升旗仪式;学生的衣着要整洁无华,仪态端庄而勿暴、勿躁、勿傲;口不出秽言,行不近恶人。通过这些严格要求,强化学生的师范意识,鼓励他们为人师表、为国育才。

从1943年开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就年年有毕业生了。这些毕业生和西南联合大学其他院系毕业生,在昆明和外县举办了不止民办中学,仅昆明市就增设了22所中学,这些学校又反过来给联大师生开通了勤工俭学兼课的机会,互为促进,其中并出现了一些质量超凡有名师任教的名校,例如联大附中、云大附中、天祥中学、长城中学、南菁中学等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学校。这盛况说明西南联大和联大师范学院不但在当时推进了云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为西南地区教育事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人们赞扬黄钰生教泽遗爱永留西南边陲,对他表示深深的怀念。



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旅行团中的南开大学师生(左第一人为黄钰生)

## 再建南开，校产移交人民

经过八年艰苦奋战，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这时，黄钰生曾短时间内被推荐担任了四个月的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因工作不顺利，很快仍回到南开工作，主持南开大学北迁和南开大学昆明办事处的结束事宜。这期间，笔者作为1940年南开大学毕业生，从西北漂泊归来，被黄钰生招聘回校工作。他派我代表南开大学参加三校联合迁运委员会，担任第二批公物运输北上的主任押运员。黄钰生和南开大学教职员一道，于1946年5月回到天津，开始了南开大学在废墟上的重建工作。

重建工作是艰巨的。经过黄钰生和南开大学的一批老教职员的艰苦奋斗，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南开大学复校开学的校舍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了。1946年10月17日（南开校庆日），举行了激动人心的正式开学典礼。南开大学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在黄钰生主持下全面恢复的南开大学，设立了文学、理学、工学和政治经济等四个学院16个系。由冯文潜、邱宗岳、孟广哲和陈序经分别任院长，黄钰生继续担任秘书长。翌年，杨石先教授从国外归来，出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由国内外新聘的多位知名教授相继到校，加强了师资力量。到1947年，教学和师生人数都较前有所发展。至此黄钰生肩负的复员重建南开大学的重任，算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逼进天津市，天津解放在即。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对南开大学的破坏，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南开大学学生会、教授会、讲助会和职工会联合组成“南开大学安全委员会”，他们与校行政负责人杨石先、黄钰生共同负责，保护南开大学完整无缺。

12月21日，国民党教育部电令南开大学安排部分教授“离津南飞”，并给黄钰生送来飞上海的机票六张，示意黄带领几位教授飞上海转台湾。黄钰生一笑置之，不予理睬，其他教授也都大义凛然，郑重宣布不离开天津，迎接解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元月15日，解放军胜利解放天津市，南开大学全体师生员工高举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巨幅画像，载歌载舞，参加了天津市人民欢庆解放的大游行。南开大学从此开始了新的生命。

## “三反”蒙冤，图书馆立新功

建国以来，政治运动频繁。1952年开春，党中央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社会上，首先在天津市经毛主席亲自批示处决了腐败变质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一下子震动了全社会，推动了“三

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南开大学的三反运动开始时比较平静，那时大家认为高等学校是个清水衙门，没有什么油水；另外，南开大学素有艰苦朴素勤俭办事的优良传统，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后来，化工系的一位副教授，在小组会上交代，他掌握着化学系的药品库房钥匙，曾经在下班无人时，自己打开库房门，私拿一些可自家使用的药品回家，他检讨了这一错误，并表示愿对此作出赔偿。这个信息一经小组汇报到校运动领导组，立刻就炸开了锅，不胫而走，传遍了全校，众口纷纭，有些人马上说，谁说知识分子当中没有贪污盗窃问题？立刻形而上学地断定，有一必有二，有二必有三，需要像“挤牙膏”那样，让他把贪污盗窃事实全部交代清楚，不能草率收兵。于是开始给这位副教授办学习班，叫做打虎队，把办班对象叫做“老虎”。

随后领导运动的一些人又进一步“举一反三”，认为不会仅仅化学系有这类问题，别的部门凡是主管钱财的人员，也一定会有这类问题。于是又提出来一句形而上学的口号，叫做“山高林密必定有虎”，意思说凡是经手财物的人，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一定有贪污问题，要求群众大胆怀疑，找线索，敲山震虎，把大虎震出来。于是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主管校务的校秘书长黄钰生和在他领导下的事务、财会、基建和校产班子。

不久，领导组向全校宣布，黄钰生是“大老虎”，有隐匿校产嫌疑，他所领导的各工作部门都是贪污集团，令黄钰生停职审查，并给他办了打虎队专案组。专案组除勒令他交代问题外，还举办了有中老年教师参加的大型批判会，黄钰生在批判会上作自我检查，只承认自己在工作上有失误，不承认有贪污侵占问题。南开老人素知黄钰生的为人，知道他绝对不会有贪污问题，所以大都一言不发。纵使有个别人发言，也是应付场面，弄得局面很尴尬。在对黄钰生的审查过程中，也出现过一次高潮，那就是工务科的一职员在逼供信情况下，制造假口供，说南开大学有一笔美金秘密存款被黄钰生隐匿，顿时呈现了惊涛骇浪，以为终于出现了突破口。谁知查来查去，仍然是查无实据，后来这人又推翻了原供。南开大学的三反运动大约进行了三个月，一无所获却伤了很多人的情感。最后传出来内部消息，全校清查结果，整个南开大学的经济仅有200万元旧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200元）没对上帐。偌大的一所学校，才200块钱的帐面差额，应该可以说是经济完全清楚，南开人是清白无瑕的了。

到了1952年5月份，南开大学的三反运动已经虎头蛇尾，搞不下去了。为了收拾残局，教育部正式任命杨石先为校长，市军管会任命王金鼎为校党委书记，借全国实行教育体制改革和院系调整之机，南开也要进行重大改革，一下子就把运动的失误掩盖过去了。对黄钰

生错误审查的结案,由当时的天津市副市长李耕涛出面,给“黄案”做结论,说:“黄先生没有贪污问题,但是用人不当”,认为黄钰生已不适宜再在南开大学继续工作下去了,市里拟请黄先生出任天津市图书馆馆长之职。黄钰生心里也明白,事已至此,不同意也得同意,只好答应就职图书馆长新任,在1952年夏举家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工作了27年之久的南开校园。

黄钰生被调到天津图书馆出任馆长之职,直到1986年才退居二线,改任名誉馆长直到1990年。这前后的38年,是他由对图书馆业务不熟悉到成为图书馆学专家的38年,他为中国的新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的开创性贡献。

黄钰生到图书馆后,十分重视馆藏建设、目录组编和对读者服务工作。在公共图书馆科技文献检索和联合目录编撰等方面,他都有开创性的建树。1956年,他积极响应周恩来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了以为科研和生产服务为宗旨的办馆方针,为科研人员开辟了专门阅览室,建立了科技服务部,创立了文献检索室,主持编写了《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书刊介绍汇编》,为天津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发展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研究和促进图书馆界的国内外交流做出了贡献。

1959年周恩来总理到天津视察工作。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周恩来曾与黄钰生是同窗,所以在此次视察之余,便邀请黄钰生、冯文潜(黄钰生的妹夫,南开大学哲学教授兼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也是周总理的同窗挚友)、冯文潜夫人黄扶先和另外几位同窗共进晚餐。周总理举杯祝贺冯文潜夫妇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同时对其他同窗老友寄予厚望。当周总理得知黄、冯二人都在图书馆工作时,就说:“图书馆工作需要渊博的知识,老知识分子做这个工作是合适的,但要按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办事。”周总理的这番话着实鼓励和启发了黄、冯二人。他们益发地努力和精益求精地埋头苦干做好图书馆工作。

十年动乱后,黄钰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重视培养接班人的工作。1979年在馆内组织了科技英语培训班,并因材施教,分成高、中、初三个班次,亲自分别授课。为了不影响日常工作,一律利用清晨上班以前的时间上课,风雨无阻。通过黄钰生的精心培育,高级班学员的科技英语得到明显提高,中级班学员也大多具备了一定的阅读和翻译的能力,成为图书馆工作的新生力量。

在此基础上,黄钰生又精心培育了一批选用国外书刊的接班人。例如他从2000家英美出版商中选出了120家,又从这120家中精选出20家,向馆内年轻的接班人介绍每一家的特点,使他们对国外出版界的情况心中有数,选择图书时可以避免或减少盲目性,提高采购

质量,节约国家资金。

1981年初,83岁的黄钰生以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的身份,应美国图书馆协会的邀请,率团赴美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第100次年会,访问了华盛顿州、旧金山等地。返国后他做了访美报告,介绍华盛顿州等先进图书馆网络和大学图书馆、州立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之间互通有无的情况,作为我国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借鉴。

天津市为表彰黄钰生在图书馆事业中的贡献,1978-1981年连续4年评选他为天津市劳动模范。这是对于黄钰生对天津市文化教育和科技界重大贡献最明确无误的推崇。

## 校友奔走,错案终于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了全国范围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这是万民欢庆的大事。黄钰生的亲朋好友和他的学生们,无不对有关当局给黄钰生平反1952年的冤案、及时落实政策抱有殷切的希望。但是几年过去,南开大学方面毫无动静。有校友劝黄钰生主动提出平反要求,说这不仅涉及您一人,而是涉及一大片人的事情,您可不应保持沉默。黄钰生对此默默不作回答,而是咏出了一首明志诗:“中钧无宿怨,事隐已宽容。国土投明主,昔今此道同。”这首诗表示他感到欣逢盛世,对过去的事情宽容对待,不再计较了。但校友们对黄老对往事之保持沉默并不完全同意,因为拨乱反正的目的并不仅在于一人一事,而是在于借鉴往事之偏颇,往前看,纠缠于未来,其意义还是很重要的。

笔者作为黄钰生的学生和同事,很想为老师的正式平反出一点力,但需有适当的条件和机遇。1985年终于出现了一个机会:这一年由在津的西南联大、清华、北大、浙大和燕京五大学校友会联合创办的民办成人业余高等学校——天津联合业余大学第一任校长娄凝先(北大校友)病故,校委会聘请我以西南联大校友的资格出来兼任天津联大校长。联大校长办公会由我和副校长刘瑞歧(代表北大校友会)、朱宝章(代表清华校友会)、伍建中(代表浙大校友会)和黄伦(代表北大校友会)等五人组成。而黄钰生在业余联大刚建立时已被推选出任联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我们这些校长是在校务委员会领导下工作的,这就为我们争取黄老落实政策创造了条件。

1985年是黄钰生从事科学教育工作的60周年,为了在天津市营造推崇黄钰生先生丰功伟绩的氛围,天津联大以五大学校友会的名义,为黄老在起士林餐厅举办了一次盛大的聚餐庆祝会,聚餐会在11月1日中午举行,参加的除五大学校友、南开校友、黄老亲朋好友和天

津联大校友及校工作人员外,还有国外归来工作或访问的陈省身教授、牛满江教授夫妇、黄中孚教授,以及南开大学的吴大任教授夫妇、鲍觉民教授夫妇等。贵宾和校友们纷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颂扬黄老对文教事业的巨大贡献,称道了他的高尚道德修养,并对他数十年如一日无私奉献所取得的丰硕成就表示祝贺。当时已87岁高龄的黄钰生也发表了热情风趣的自述讲话。这次聚餐会制造了一种社会舆论;社会人士在给黄老做“民间落实政策”的工作了,对“官方落实政策”寄予厚望。

1986年4月,根据中央的决定,国家教委和全国政协又在南开大学联合举行了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的盛大纪念会,肯定张伯苓是“兴建学校,改革封建落后教育的民主主义爱国教育家”。在这种形势下,在天津联合业余大学内的联大校友便开始议计关于黄钰生冤案平反的问题。副校长黄伦给校长班子带回来了一个消息:前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长王金鼎同志在谈天津联大校务委员会主任黄钰生的重大作用时说,黄老在天津受委屈了,他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他应该是一位国家级知名人士,而且应该是国家教育界领导人。在天津他只担任市图书馆馆长,埋没了他的才智。就黄老过去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担任重要职务的崇高地位,他也应该是一位国家级人物。就是因为黄老于1952年在南开大学遭遇的冤案,影响了黄老的一生,使他受屈了。听到黄伦带回的这个信息,给我们争取为黄老平反增添了勇气。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1986年5月10日给南开大学校党委和校长打了一份报告,正式申请给黄钰生平反冤案。报告提出,南开大学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构成了一桩重大的冤假错案,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一的黄钰生教授无辜被诬为贪污首犯,受全校师生大会的批斗,最终被排挤出南开大学,还有不少人受到株连。报告提出,为落实政策,加强团结,建议趁中央决定纪念张伯苓校长110周年诞辰的东风,彻底解决南开大学积存老案,以舒畅人心,并建议由书记和校长出面主持,在全校大会上敦聘黄钰生先生为南开大学终身教授,颁发荣誉证书,拨出东村平房宿舍一幢,诚恳敦请黄钰生教授迁回南开园居住,安度晚年。报告还要求为其他受株连人员恢复名誉。

这份报告送上去不久,南开大学主管人事的副校长找我谈话说:“党内曾有中央文件,规定1956年以前的案件没有平反任务”。我听了一愣,立即回了一句:“不对,我问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同志,他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究,没有时间限制。”主管人事副校长沉吟了一下,回复说:“那你让李定给我们来一封说明信,我可以照办”。这一句话立刻把我噎住了,但心里仍不服,便说,好,我办这封信。其实我这时是心虚口硬,这样的

信怎么能办得到呢?

1986年8月初,突然接到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方堃的一封来信,说在美国的西南联大校友将在9月份组团回国访问,准备分别造访三所母校,赠送礼品并与各母校领导和校友会谈。总的接待任务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负责。要我以天津西南联大校友会负责人身份,与南开大学校方联系,接洽南开大学接待来访事宜。我当即与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联系,校办主任表示为难,说现在刚刚改革开放不久,还没有接待过外宾和美籍华人,是不是应该由中央有关接待单位来个正式通知,作为我校接待的依据,否则不好办。我听到这个答复后,感到有必要去北京,直接找一下李定同志。李定是1943年西南联大的校友,也是黄钰生老师的学生。这样我就在8月中旬到了北京。为节省时间,我事先准备了两封信稿,一封是统战部请南开大学接待美国西南联大校友访问的信稿;一封是李定以个人名义商请南开大学为黄钰生落实政策的信函。见到李定副部长,我送上信稿请他过目,他表示完全同意,请秘书重抄后亲自签了名。李定在给南开大学的信上说:建议对黄钰生先生对南开大学的贡献做出正确评价,并对1952年政策上失误给黄老造成的伤害,适当作口头上纠正,以有利于工作。

我回到天津后,先把李定给黄老落实政策信复印20份,带到天津联大校长办公会上,介绍了情况,然后请黄伦先送一份给王金鼎,其余分送给天津市市政当局和统战部门头面人物,目的在于争取上层舆论。

然后我把李定原信直接送交给南开大学主管人事副校长。这事拖了一个多月,到10月底,主管人事副校长突然把我找去,说已向国家教委请示,得到批复,你先看看,然后咱们研究怎么办。这份批复的内容是:

南开大学:

南高党请[1986]23号函悉,经研究,同意撤销一九五二年三月给予黄钰生(黄子坚)撤销南开大学秘书长及津沽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职务的处分,撤销原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52]人字003号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我读了这份文件才知道,黄先生档案中果然有“内控处分”,校友们给黄老所做的平反活动看来是应该的和正确的。我当即表态说,这应该先和黄老打招呼,再研究怎么办。我立即要求给一份教委批复的复印件,并把它再复印20份,拿到天津联大校长办公会上,介绍了这一新情况,研究决定,再把复印件发送给王金鼎和有关同志们手中,然后再决定由刘瑞歧、黄伦和我去看望黄老,对此事作汇报。

1986年11月初,我们三人到天津市图书馆与黄老

会面。对黄老说：“黄先生，我们背着您做了一件事情，现在来向您汇报”。随手将李定的信和国家教委批件的复印件两张纸放在黄老面前，并汇报了大致经过。黄老看完了复印件，沉默思付了一会儿，说，你们的胆子可不小，这件事我早就忘记了！我们三人听了一愣，但立即理解到，我们今天的汇报，对黄老是一种思想上的突然袭击，他还理解不上来。另外，黄老作为老知识分子的矜持心态还很重，自己的学生给自己暗地里办了这么一件事，怎么说呢？我们三人都懂得怎么尊敬黄老，分别谈了个人的简单认识之后，就告辞出来了。过后几天，我到民进天津市委开会，见到民进副主委王伟，王伟对我说，你们给黄老办的事办得太好了，黄老都跟我们讲了，黄老非常高兴。听了他的话，我的心才踏实下来。再过几天，南开大学副校长找我，问给黄老落实政策怎么办？我说，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在什么范围弄错，在什么范围纠正嘛！

学校接受我们的建议，于1986年12月27日，在南开大学行政楼大会议室举行了黄钰生的平反座谈会，受邀参加会的有黄老亲朋好友、南开老校友、在校老教授和原来参与三反运动的一些人等共约一百余人。校党委书记李原宣读国家教委文件，宣布撤销1952年“给予黄钰生撤销南开大学秘书长及天津市津沽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职务的处分”的决定。母国光校长发言盛赞黄钰生对南开大学的巨大贡献。然后，黄钰生发言，对党的实事求是政策、在他垂暮之年给他落实平反，表示感

谢。以后与会人自由发言，大家都着重推崇黄钰生蒙冤三十余载，无怨无悔，胸怀坦荡，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政府，努力工作，尽职尽责，为国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精神。

这次平反虽然基本上为黄钰生落实了政策，但他还有一项遗憾未偿，这就是他的教授职称没有得到正式恢复。据南开大学档案记载，当时教育部给黄钰生的处分共有三项：1. 撤销南开大学秘书长职务；2. 撤销津沽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职务；3. 撤销教授职称。这次平反，只撤销了前两项处分，而对第三项处分未予撤销，也就是说他的教授职称没有得到恢复，以至在为他平反的座谈会上，他突然问了一句：“我还是南开大学的教授吗？”当时，我们谁都不了解他曾被撤销过教授职称，对他的问话只理解成这是黄老对南开大学感情深厚，挚爱南大教授这个头衔，而没有想到其中还有什么深层的含意。

1990年4月11日，黄钰生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人世。今年，在黄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天津联合业余大学诸校校友在这里共同庆祝老人的百岁寿诞，并诚心诚意地献上“我们的无限尊崇的教授”荣称。黄老！您永远是我们挚爱的教授，这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抹不掉的，请您含笑安息吧！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林 耀）

## 第五届“炎黄杯”敬老围棋赛结束

### 刘实、何郝炬分别获冠亚军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倡议、主办，炎黄春秋杂志社、北京老同志围棋会、文津俱乐部承办的第五届“炎黄杯”敬老围棋赛，于今年元宵佳节在北京开幕，经过三天紧张而欢快的较量，已经胜利结束。冠军得主为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刘实。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郝炬获亚军。

开幕式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比赛组委会副主任冯征主持，研究会顾问、组委会主任唐克在闭幕式上讲话。唐克说，围棋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艺术瑰宝，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高尚品德，我们倡议发起并坚持举办

“炎黄杯”敬老围棋邀请赛，目的就是向社会表示我们对我国围棋事业的关心，愿围棋活动更为广泛，祝围棋国手再攀高峰；就是向社会呼吁，重视社会老龄化带来的新问题，创造爱老、敬老的氛围，形成古人所希冀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良好风气。

为此次赛事提供支持的单位有：中国老年报社、中共党史出版社、河南省鹿邑县明槐贡酒有限公司、河南省始祖山中华圣地建设促进会、中国浦发成浦集团、老龄委吉尔瑞珠宝公司。

# 我在台北“四·六”蒙难经过

● 张光直

编者按：今年是台北“四·六”事件的49周年。1949年4月6日，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有预谋地在台北大肆逮捕进步学生。这是继1947年残酷镇压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之后，制造的又一起政治迫害事件；也是50年代初，在全省制造大规模白色恐怖的前奏。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坚持反共政策，至今对这段血腥的白色恐怖史实和“四·六”事件讳莫如深。

“四·六”事件受害者之一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讲座教授、前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张光直先生，去年趁因公来京之机探望胞兄张光正时，对其卷入这一事件的经过有详细陈述。张光正同志将张光直先生提供的材料略加整理，推荐给本刊发表，以飨关心台湾骨肉同胞的广大读者，并为研究台湾政治事件的学者提供珍贵史料。材料整理时有一些删减，但保留了有关“四·六”事件的全过程。只是因预定发表的时间仓促，最后修改的文字未经张光直先生过目，这是张光正同志特别要求说明的。

我是台北板桥人，可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在北京上的是当时第一流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男子中学。1946年12月，我同父母和两个弟弟回到了台湾。那时，台北最好的中学是建国中学，父亲就带我去见陈文彬校长。陈校长问了我几个问题后说：“你休息几天再上课吧。”就这样，我进了建国中学。两年多以后，在这里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四·六”事件。

这段事情在我心里记忆了近五十年，没有在更早讲出来，是考虑到有关人的隐私权问题。现在时过境迁，故旧半为鬼，再不讲，恐怕这一小段历史就没有人记得了。这些既然都是实事，人名也不用假的。事情的大纲不会错，但细节上小错难免，望当事人不吝校正。

## 邮检黑名单

“二·二八”事件以后的建国中学的气氛，与以前很不一样，很多新老师从大陆到这里来，有一个国文老师在我以后的命运中扮演了当时无

论如何想不到的角色。这位先生，叫罗刚（笔名罗铁鹰），是我们新来的高中国文老师，云南人，未婚（至少太太不在身边），住在操场对面的一栋失修的房子的一端。

罗老师来了以后，生活大不一样。第一，我、翁延枢、林家鸿、曾××（名字忘了）四个人合编的一本油印的《五十年代》，被罗老师大为夸奖，说这个杂志的“方向”很是“正确”。那时台北的《新生报》有个副刊叫《桥》，我在上面居然也发表了几篇文章，有的是罗老师改过的。小品文中《伐檀》是罗老师讲课给我的灵感。

从《伐檀》可见罗老师讲国文课是与众不同的。他讲《伐檀》注重西周地主如何剥削手底下的长工。他用的课本是官方指定的，但是他所选的诗或文章中总有统治者与被剥削者。《伐檀》是如此，在唐诗《长恨歌》里被剥削者就是杨贵妃。除了课本以外，他还给我们看许多翻译的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静静的顿河》。还有《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严格说来

只能是报告文学。

我们常常下午下课后集中在罗老师的屋子谈文学。有时候还有他的朋友加入，现在记得名字的有一个雷石榆，他是个剧作家，雷太太叫蔡瑞月，是舞蹈家。罗老师个子不高、有点小胡子，抽个云南水烟袋，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我们也用新生报的《桥》来做发表的媒介，比如罗老师就用一个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将中国新文学在台湾应该采取的形式详细地写出来。不久他就受到攻击，说台湾文学在当时的台湾应该有若干特殊的形式，而不能只作为中国文学的分支。我也加入了这个辩论，用“何无感”的笔名写文章为罗老师辩护，攻击笔名“陈百感”写的一篇文章。《五十年代》也是完全由罗老师作顾问。去他屋子里的学生也逐渐集中到我、翁廷枢、裘恻臧、还有曾××。曾××是曾今可的儿子，他与我们这批显然是左倾的人来往，他的父亲很不舒服，曾经警告多次，但是他不予理会。《五十年代》引起了高二一个姓葛的学生的特别的注意。一次我们有人在壁报上叫他“葛驼背”的外号，虽也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他就把我们办《五十年代》和壁报的几个人名字，报告训导处，说是有“共匪”嫌疑。训导主任孙嘉时很喜欢我，曾经把我的名字交给女师，做为每年一次的奖学金的得奖人。他拿到名单也就例行公事地交给了保安单位。然而，保安单位还是把我的名字列入了邮政检查的黑名单。

1948年秋天的一天，罗老师慌慌张张地跟我和翁廷枢等人说，下课以后到他屋里去。去了一看，他把行李收拾好了，像要远行的样子。我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要马上回上海，晚上12点一班船要从基隆开驶。大家无言，心里都知道他大概有了危险，决定一起送他去。裘恻臧大发脾气，说你们这些人空口喊革命，等到机会来了，却让它走开。他说：“我跟老师一起走！”这话使大家都非常震惊，所以没人说话。晚饭以后，我、翁廷枢、林嘉鸿帮着罗老师和裘恻臧提着行李走向车站，并一起坐火车从台北送到基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罗老师和裘恻臧。

罗老师回大陆以后先在江苏解放区工作，



张光直在其兄张光正寓所留影

后来转到上海，1950年底调回昆明在云南文联工作。1958年春被划为右派，开除所有公职。1979年3月恢复名誉。1985年8月29日在昆明逝世。经二十多年磨难至死还是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裘恻臧下落不明。

## 祸从天降

1949年4月6日国民党情治机关周密计划扼杀台湾的学生运动。那时，我家住在台北市延平区甘谷街台湾省茶叶商业同业公会的后院。我家共五口人，父亲、母亲、我和两个弟弟。

那天早上，大概五点钟左右，我们正睡得甜，起来做早饭的父亲将我推醒说：“光直，外面有几个人要来看你。”我睡眠模糊地起来却看到五、六个穿着军装和警察制服的大汉。为首的一个穿着一件美军夹克，一边问我：“你是张光直吗？”一边用右手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身份证给我看了一眼，然后把身份证放到口袋里说：“我是赵××。”名字根本没听清楚。然后对他带来的人说，“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扭头又对我说：“你把姓温的写的信都拿来。”我将“温”字听成了“翁”字，就说：“他住在本市，我没有他的信。”他也没有注意我这句话，而且随时看表，好像很忙的样子，就说：“把你所有北平的来信都拿出来。”我这才知道他要的是温景昆的信。温景昆是我在北京师大附中最好的一个朋友，与

我经常保持联系,最近还寄给我一本小册子,叫做《方生未死之间》,是乔华(即乔冠华)作的。温景昆让我看完以后交给申德建,他在台大一年级念工学院。我就在卧室壁橱的上面,平常放枕头和棉被这一类东西的地方,随便伸手拿出来几封信交给他。他看了来信人地址处果然有“温景昆”三个字,表示满意,就问还有没有。我伸手在上面又掏了两下,拿出来一封,就说这是最后一封了,他便转身问他的手下人“找到什么书没有”。

那个时候,我受在北平的哥哥(编者注:即张光正)和温景昆的影响,在台北受罗老师影响,思想显然有些左倾。所买的书有艾思奇和葛名中的哲学书、华岗的社会史、翦伯赞的中国通史、毛泽东的论新民主主义等等,约有五六十本都放在我们卧室里。在赵跟我说话的时候他的部下五、六个人就在桌旁站着看。等到赵问他们“找到什么书没有”的时候,他们竟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动。过了一会,那个穿美军夹克的年轻人转身在我的书桌上拿起一本《三民主义》来说:“只有这本。”赵看了一下封面,便把书扔回桌上,只拿着温景昆的信带着他的手下领着我出了大门。父亲跟着跑出来问赵说:“赵先生,你要带他到哪儿去?”赵说:“我们就带他去问几句话。”这时母亲也起来了,在后面跟来问:“要不要带什么衣服?”赵没有回答。我跟着这群人上了一个中型吉普,就在已经光亮的天色中离开了家。

一年以后,父亲才告诉我,我们车一走,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所有我的左倾书籍拿出来藏在前面茶商公会的办公室的抽屉里面。三、四个月以后,一批特务又来家里查书,这次虽然查得十分仔细,可是毫无所获。假如第一次他们像这样子查,告我以罪的证据就充足的多了。所以我一直猜想那天早上来捉我的人,除了赵以外可能都是对学生抱同情的人。那天早上,他们是先到温州街20巷1号苏芎雨先生家去捉我(温景昆和我通信的期间我多半住在苏家),等到他们发现错误转到茶商公会来的时候,时间已晚。也只好匆匆忙忙把我带走,来不及收集许多证据了。

我被押进吉普车时,就看到申德建已在里面了。车向中山北路开去,不久便到第一分局的派出所。我和申德建同时被关进一个拘留人的笼子里,这笼子大概有五米宽、八米长,椭圆形,短头是墙,另外三面有铁栏杆,靠着墙的一角有一个茅坑。我们到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了五、六个人,后来知道都是台大学生。有一个姓沈的,派自己作牢长,指给我和申德建坐的地方。听他们说,这天(4月6日)清晨夜未央时台大和师大的学生被警备司令部逮捕。台大是按名单一个一个抓的;师大则是整个宿舍的人全部被捉,共三百余人。在师大有些抵抗,流了点血。所以凡是台大的学生都相信学校当局与警备司令部合作,供给他们名单和宿舍住址;而师大未与合作,所以警备司令部不知道要捉的人住在哪里,便先一网打尽,然后慢慢调查留人。我们在第一分局的初步审问很快地进行。当天下午,一个拿着长枪的兵,叫到我名字后蒙上我的眼,把我推出去慢慢走,拐了几个弯,就到一个屋子里,让我坐下来。这以后脸上的毛巾一直没拿下来,天黑了没黑、到底是什么地方,我都不清楚。

但最初的一次询问内容,我还记得很清楚。问:“你叫什么名字?”答:“张光直。”问:“还叫什么名字。”答:“没有别的名字。”问:“是吗?再想想。”答:“有时候在报纸副刊上和壁报上写文章,用笔名,但是没有几个。”问:“那有几个呢?是什么呢?”答:“张植、小生,别的想不起来了。”问:“在北平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答:“我没有加入共产党。”问:“什么时候在共产党受的训?”答:“没有在共产党受过训。”问:“姓温的是不是你的联络人?”答:“我不懂你什么意思!”问:“好,你不懂,我就替你说了,你在北平加入共产党,党里派温景昆做你和申德建的联络人,到台湾来以后,你就在建国中学里宣传共产主义,温景昆把共产党给你的指示传过来。”答:“这些事情都没有,共产党要是消息给我,难道他就写在信里面给我吗?他们还不知道信要经过检查的吗?”问:“你还说你没受过训?你今年才18岁,到现在一点不慌张,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共产党不用航空把他的指示传给你



用什么？难道他自己会飞过来？”

到此我已经无话可说了。他说我是共产党，我说我不是。我只好要求看有什么证据。这一说他更变得声色俱厉，连说：“证据！证据！这还不是证据？”说着手敲温景昆给我写的信：“我给你念几句：‘黑暗就要过去，光明就要到来，不久北平就会解放。’”还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通信恐怕会慢下来，但是我们都要有信心，有一天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解放了的台湾碰面’。好了，这还不够吗？”我说：“这只是他的希望，怎么是给我的指示呢？”问官说：“你还狡辩！”

就这样来来去去，三、四个小时，我知道这案子是牵涉了温景昆和申德建，还没有牵涉到罗老师、翁廷枢、还有我哥哥张光正（他1945年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参加革命），还不严重。我自己不能把他们带到那几条线索上去。

讯问完回到笼子里，那里只剩两三个人了。姓沈的和申德建都不在。当晚，我也被装进一辆大卡车离开第一分局，到一个只有用“人间地狱”可以描写的地方去了。

## 在“情报处”

我们“四·六”事件被捕的学生从中山区第一分局出来，装入卡车以后，眼睛就被蒙上，所以车开到什么地方我们并不知道。只意识到开出不远就停下来，一个一个被人扶着走进一间屋子里面。后来知道这就是“警备司令部”关政治犯的“情报处”（原日本统治时代的西本愿寺的地窖）。政治犯被抓后这里通常是第一站。在这里主要是讯问，讯问常常用刑求，我所熟悉的有几种：（1）“疲劳轰炸”（即连续讯问不停，直到人神志不清）；（2）灌辣椒水；（3）“坐老虎凳”（拿绳子把大腿膝盖紧绑在凳子上，把脚板提高底下垫上砖头，最多加到四块）；（4）反绑吊打；（5）“打电话”（用电话线拴上男人阴茎或妇女乳头，然后摇动军用电话手摇充电器）。但是我要声明，我在这里没有受过刑求。“四·六”事件的其他受害者，至少到我们分开以前，也没有哪个对我说他们被刑求过。这大概是与傅斯年与警方给学生说了好话有关。

但我也必须实说，待我第二次被关进“情报处”时，亲眼见了一个被“疲劳轰炸”的例子。有个十七、八岁的台湾青年，被送进我们这间屋里，当晚又戴上手铐，左呼右拥地给带走了。直到次日下午三点左右，四个大兵把这小伙子提（只能用这个字来形容）了回来，往铺上一扔。他努力坐起来，用台语说他被叫去审讯，从头晚7点直到此时没有吃喝过一点东西，也没有中断过问话。他说话已经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了。大家劝他睡觉，他倒头便打起呼噜来。睡了大约一小时，那四个大兵又把他拉了起来，戴上手铐，半拖半拉地走了出去。此后再也没见他回来。

回头再说在“情报处”的日子，每个人都被手铐铐着，手巾蒙着眼睛。时间过得很慢，也无法估计日夜。只有大小便时才解开毛巾，看到我们是在一间长方无窗的屋子里，有“榻榻米”十张。在开门的一端，有两个“榻榻米”长、约1.5米宽的地面，右边是上锁的门，左边有个大桶，是盛犯人尿尿用的。十个“榻榻米”上躺着二十多人，24小时蒙着眼睛躺在地上，由两三个持枪的士兵看着，一动也不许动。大小便要举手，有个兵看见来扶你起来才能去，憋不住便尿在裤子里。

就这样不知躺了多少天，每天只有躺着不准说话，大小便、吃饭（一天每个人只吃一个馒头，因为他们尽量让我们少打开蒙眼的毛巾），一个个被扶出去受审问，然后再扶回来。

终于有一天，我们全体的人都被叫起来，一个人被一个兵扶着，一起上了敞篷卡车。车开了好一会儿，到了一个又旧又矮又破的墙前面停下来，大家被扶进去打开毛巾（这是被捕以后第一次让把毛巾全部打开），所看见的地方原来是台北监狱。

## 在台北监狱

台北监狱很旧很老，一排排长方形牢房，隔成许多小间。每间牢房大约不到二米宽、三米长，三个人住。我们的一间住客是：王耀华靠着门，蓝世豪在中间，我年纪最小为第三席，在茅坑的旁边。每人的空间，正够躺下、向左或右各

翻半个身。房门外锁，中间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是看守和犯人交往的唯一通道。规则是不准吸烟，但是看守每天拿烟来卖，我从此染上吸烟的习惯。看守送饭，每天三顿，早上稀饭，中午和晚上白饭，不管饭量多大每人一盘，里面有一点青菜。饭里夹有不少砂子，吃的时候要非常小心。有钱的话，可以向看守买任何好吃的东西。事实上，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在拘留的后期，听说有人（不是“四·六”事件者）叫了妓女进来。

屋子实在太小，三个人每天早上6点就被看守的敲锅声音吵醒。惟一的光线来自门对面的墙上一个小窗户。显然是怕犯人跑掉，窗户做得很小。天花板上一个灯，24小时开着。每天允许到旁边一个很小的院子里散步10分钟，早上一次约九点，下午一次约三点。散步的时候不是同屋的朋友也可以交换些消息，有时还可以看见不属于我们这伙的人也出来散步。有一次我竟看见了杨逵先生（台湾著名爱国老作家，生于1905年，卒于1985年），其他的犯人都认识。

他们把我们关在这里，偶然提出去询问一下，但是也没什么好问的，像是应付差事。因为生活实在无聊，我没事就在屋子里看墙，有一次竟然看见一行字，刻在离地面约一尺高的地方，这几个字是：“杀许教授万车受苦。”我将这几个字指给两个室友看，他们也不懂。那年初，许寿裳教授给人在半夜用斧头劈死，后来抓了一个人说是凶手叫高万车。这行字可能是他写的，但是他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猜疑许教授的死是政治暗杀，而高万车是无辜的。这行字的解释是支持这个怀疑呢，还是支持他的有罪呢，只好请读者判断了。

生活中最有乐趣的事，莫过于学歌了。“麦浪”的人教我许多歌。说到“麦浪”，不能不多说几句：麦浪歌咏队是40年代后期台湾大学的许多社团之一，但是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常常到外面去表演，颇有名声。他们所唱的歌包括40年代50年代最流行的一些左倾的歌，如：《向太阳》、《跌倒算什么》、改成了《学生之歌》的《毛泽东之歌》、《黄河大合唱》、《康定情歌》等等。这

次台大被抓的人，多是麦浪歌咏队员。虽然有些有名的“歌星”加入“麦浪”是因为喜欢音乐，不见得有什么政治的想法，但是有的如陈钱潮（陈胖子）我想是和共党多少有关系的。有一次我问他“麦浪”这名字是怎么来的，他说你要是在北方看见过麦田快收成的时候，一波一波的浪被风吹起来，你就会欣赏这个名字。我说清朝的郑板桥有一首词，第一句是“麦浪翻风又早是”。胖子大喜说：“我们的名字原来有典故了。”

在台北监狱教我唱歌同我一起偷偷唱歌的就有台大“麦浪”的陈钱潮、王耀华、蓝世豪、黄金扬和孙达人。大家最喜欢唱的是《学生之歌》：

密云笼罩着海洋，  
海燕呼唤暴风雨，  
你是最勇敢的一个，  
不管黑暗无边、夜雾茫茫，  
在南方，在北方，从中原到边疆，  
你响亮的声音鼓励着斗争中的人民，  
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你是光明的象征，你是胜利的旗帜，  
你是光明的象征、胜利的旗帜！  
勇敢的中国学生们，  
我们光荣的生活在你的年代，  
朝着你的方向，跟着你的火炬，  
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还有《唱出一个春天来》：

青年的朋友赶快来，  
忘掉你的烦恼和不快，  
千万个青年一条心，  
唱出一个春天来。

西边的太阳下山了，  
东边月亮爬上来，  
从黑暗一直到天明，  
快乐歌声唱不完。

还有《向太阳》和云南“一二·一”惨案后唱的《追悼歌》等。

这些歌使我们能够度过无聊的日夜。但是

我们这批年轻人的精力实在是太充沛了,大概在住进台北监狱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办了一个杂志,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为什么扭秧歌》。扭秧歌也是和“麦浪”这些人学的,但是为什么要扭秧歌,我居然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获得周自强的欣赏。周是台大学生中最成熟的一个,假如台大学生里有共产党的话,周肯定是我投的第一票。他一手拿着杂志,一手指手划脚,他说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问我在哪里念书。当我告诉他我以前从来没有扭过秧歌时,他大吃一惊,就把话题岔开了。杂志出了一期,便停掉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太危险。

我们还做过一副麻将,用家里送来的点心盒子和其他的硬纸板,剪得麻将牌一般大小,许多层沾合在一起,然后在地上磨平,一张一张地写上字或画上图案。反正大家有的是时间,不到三天就做成了一副很好的麻将。我们打了不过两、三天,有人(我记得是王耀华)提出抗议,说我们的生活将流于腐化。这大帽子一戴,大家没有话说,把辛辛苦苦做好的麻将送给了看守。

## 回到“情报处”

在台北监狱过了几个月的“团体”生活以后,有一天忽然听到喊我的名字,而后和台大学生孙志煜、新生报副刊主编史习枚,还有我们中最年轻的丘宏仁,四人被叫了出去,说要到台北地方法院宣判,而且叫我们把随身的东西带着,不再回来了。大家都说,没有问题你们可以回家了,我们四个也很乐观。回家当然是每个人自被捕起的希望,但是真要离开其他难友、离开这共苦难的同志时,心里也很难过。一个个隔着门握手告别后,我们就在他们那激动的歌声中含着高兴的泪坐上卡车,出了监狱。他们不约而同唱出的歌词是:“……在南方,在北方,从中原到边疆。你响亮的声音,鼓励着斗争中的人民,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然而我们四个人被带到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却板着脸严肃地说:“你们四个人,我们调查的结果,都不是共产党,但是你们的思想都有问题,所以还不能放你们出去,你们还要经过一段

培训时间。这段时间的长短,要由你们的行为来决定。”孙达人听了几乎晕倒,连忙就势坐下;丘宏仁开始大骂;史习枚和我则目瞪口呆,因为希望太高,失望也就异常的大。

此后,我们四个人便分开了,我被戴上手铐坐上汽车,就往北门方向开。这次没有蒙眼,却让人担心:是不是不再怕你知道去向,反正也不让你再出去了?

这个地方原来是日本人的一个神社,叫西本愿寺。至少从1948年起便改建为“情报处”了。原来就是我们刚被抓,被蒙着眼送去的地方,专关政治犯。“军法处”也有政治犯,但是它的名誉要比“情报处”好得多,“军法处”比较守法,少用刑求,而且都办的是军人的案子。“情报处”则不然。

我到了“情报处”,被放入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大约有三米宽、五米长,门内有一米左右宽的地面,靠墙放了一个大小使用的大木桶。前面地面上是一个台,上面铺着一层旧的“榻榻米”。这便是20个人睡觉的地方。两面是墙,与门对面是装了铁栏杆的一面大窗,我被放在屋子的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

屋里有20个人,我都没有看见过。进去不久,一个三角形脑袋、上门齿有个洞的人便来打招呼,并且拿出一个小小红色的台大学生证给我看,小声说:“他们没拿去。”他叫斗冰操,台大文学院学生。睡在我斜对面的两个中年人,显然是台湾人,一个块头很大,上唇留些胡须,似乎是习于发号施令的人,姓杨;他右边躺着的一个姓林,比杨年纪似乎大些,但个子小不少。他们听说我也是台湾人,对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问我家里的事情。我姑且说,他也姑且听。还有一个显然是高级知识分子,后来知道是台大的鲍世绪。鲍世绪肉皮白白的,说一口上海话。

这里的生活规律同监狱里很不一样。吃饭一要快,二要多,不然吃不饱活该。家里有人送来好吃的东西,每人一份。这倒不是强迫的,因为没有在20个饿人40只眼睛之下独自吃东西的道理。每天散步两次,是买烟卷和与关在别室的熟人谈话的机会。在监狱里我们住了几个月也没有新人来、旧人出。但这里则“新人来,

故人去”是常规。

这里“看守所”所长姓石,是个少校。常常到牢房里来“察看”,然后逗留不走,跟犯人聊天。他的下面有个张医官,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他那肥大的臀部,一走一摇的步姿,现在还在眼前。有一天我决定也开开他的玩笑了,于是他上班时我便嚷:“张医官,张医官!我有点儿便秘!”“好,就给你开药”。等了一会,听见前面有人给医生小声谈话提到“拉稀”这个词,我就又大声嚷叫:“治拉稀的来了,我今天大便有水。”张医官听出我是存心开他的玩笑,便恼了说:“你们天天跟我捣乱,今天看我的。”这时我也感到玩笑开得太大,真的要应验“祸从口出”的话了。果然当晚,我就被石所长叫到办公室。他问我姓什名谁,为何今天如此。我便照实招来,包括张医官的肥臀。说到此我看石所长也忍不住一笑。问了我至少一个半小时,所长也没再说什么,就叫副官把我送回牢室。

全屋的人都以为我今天闯的祸至少屁股上要挨鞭子,想不到会无事人般地回来,都惊诧不已。两、三天以后,医务室的男看护给一位难友来换药时看见我,说:“小孩儿,你真是有福气。要是前任所长,你的小屁股不烂才怪。以后说话还是小心些。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死个人不算什么!”

我们门前的走廊向右边走,左右两边都是牢房,里面住的以山东流亡学生为主。他们给我的印象,是瘦骨嶙峋的重病号一般,一个个要挣扎起来的样子。

这里常有新人来,但多为“单身客”,只有一次来了一群:大概有十来个,都穿着军服。因为房间早满了,就把他们放在走廊的墙根。有五、六个人正对着我们坐。这些人跟别的人都不一样,一点害怕的样子也没有,倒好像在作团体旅行。一个高大的汉子,光头,气概扬扬地问我:“你们犯了什么罪关到这里来的?”我们有人说是“政治犯”,有人嚷是“匪嫌”。这个大汉不懂什么是匪嫌,便又有人给他解释“匪嫌”就是“共产党的嫌疑”。这个解释引得这伙人大笑起来。我们这边有人就问:“你们是为什么关进来的?”大个子大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啊!”原

来这十来个人都是金门打仗时被俘的中共军官。

一天,石所长特别准允一位被大家称为“刘团长”的同他们会面。大家很高兴,讲得最多的是被俘一仗怎么打的,天气预报又怎么不准,认真真,好像在开战后检讨会,石所长也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

## “包围打台湾”

不知是1949年12月还是1950年1月的一天,看护一早就来道喜:“恭喜恭喜!你们都要出去了!”我们问他到哪里去,他便守口如瓶,一个屁也不放。听看护的口气要离开这里是无疑的,但是到哪里去呢?想到可能让回到台北监狱去;但也想到了一个不大可能的可能:以前皇上要砍头,刽子手对犯人不就是说“今天是老爷大喜的日子,恭喜恭喜”么?想到这个可能,不免毛骨悚然。

午饭后果然接到出远门的命令,让把私人的东西收拾好。但是被点名出门的只有一半的样子。这次“出门”时与我们离开台北监狱时却大不相同。不但没有唱歌,没有握手,连看一眼都没有,我们“义无反顾”地出门就登车走了。车子开了又开,好像是到圆山那个方向去。半个小时以后,车子转到一片林子里面,再走一会看到一个池塘便停下来了。这就是被称为“内湖”的地方。

池子的一边有一间像军营式的木头房子,进去有两排二层的床,与墙壁垂直摆了两排,算来可以住80个人。被关在这里,不消说人地皆生的外省人,即使本地人要逃走也是很费事的。

隔着池子,有两间平房,建在一个用两个木头做的阙的一边。两个阙上面用一条木板连起来,上面应该是这个机关的名字,但是字是朝外的,无法看见。我多么想知道关我的“机关”叫什么名字!

这里的生活完全与台北监狱和“情报处”不同,是军事性的。早上得早起,有早会,要听大官、小官讲演。而且要唱歌,“国歌”、“国旗歌”、“打倒‘共匪’”,还有一个新歌,叫“保卫大台湾”,歌词是这样的:

“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  
保卫民族复兴的圣地，  
保卫人民至上的乐园。  
万众一心，全体动员；  
节约增产，支援前线。  
……

我们已经无处后退，  
只有勇敢向前！  
我们已经无处后退，  
只有勇敢向前！

每当这首歌唱到“我们已经无处后退”的时候，大家便寄寓了自己的情感，唱得声音特别大。可是不久这支歌就被禁唱了。这并非因高声唱“无处后退”，而是因了我们唱“保卫大台湾”时，常常故意唱成“包围打台湾”。台湾就怕被人包围，然后挨打。所以好不容易教的这支反共歌，也不让唱了。

我们被送到这里来，目的就像那位法官说的，是来被“培训”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要如何培养、训练，我因为在这里的时间太短，没缘领教。就在我们到达内湖一、两个星期的样子，一天早晨，我们正忙着打扫屋内屋外，听见营长叫我的名字，我答应后他对我说：“恭喜！你要回家了。”这时候，果然门口进来一辆汽车，上面坐着的是父亲。我收拾自己的东西，将身上仅有的大家都想要的一副扑克牌送给了新来的姓孟的东北人。我要同大家道别时，营长说：“等一下，还有一件公事。”说着就从他的大皮包里，拿出一张油印的小纸条来。上面的字大意是：

“我，某某人，发誓不将我被捕之后，在里面的所见所闻，人与事不论大小有所透露。如有违背，愿受枪决之处分。”

他将小纸条给我和父亲都看了一遍后，拿出一支原子笔来，叫我写上大名，就放我跟着父亲上路回家了。

在路上，父亲诉说保我出来的经过。是父亲的至交杨肇嘉先生到“副总司令”彭孟緝那里磨了好几次。由父亲多次写信，说我祖母年老多病，来日无多，希望能在她走前见我这个爱孙一面。也许是杨伯伯的磨功好，终于得到彭孟緝同意，令我父亲把我带回家中“教管”。

然而不幸，祖母在我回家前已经去世，我回家这天是祖母出殡的日子。

因为我哥哥在大陆，我便以长孙身分加入出殡的行列。

## 为“四·六”受难者画像

我们4月6日被捕，第二天的报纸上都在一版位置刊载所谓“四·六”事件。在我的记忆中，台大被捕11人，师大3人，建国中学1人，成功中学1人，新闻界2人，职业不明者1人，共19人。我的名字被误为“张光真”。

也许还有，但这四十多年存在我记忆里面只有这19个人。本文称这19人为“四·六”事件的受害者。这19人都同时在警备司令部的情报处(原日本时代的西本愿寺的地窖)初步受讯，然后同时关进台北监狱，一起居住了好几个月。

我把除我之外的18个人一一作简要描述：

(1)王耀华，台大外文系学英语的学生，河南人，中等个子，做人很严肃。他有女朋友叫陈诗礼，在“麦浪”里曾在《锯大缸》中演王大娘，王演补缸匠。“四·六”前，陈闻讯跑掉。

(2)蓝世豪，福州人，台大工学院学生，学习成绩大概不是顶好，但做事很能干。

(3)周自强，浙江人，台大工学院电机系学生，他在台大学生里面是最成熟的一个。聪明绝顶，是个发号施令型的人物。

(4)孙志煜(达人)，台大外文系学生，大概是上海人，有上海人的气度。言行像文学家。

(5)宋承志，师大学生，长得很英俊。“四·六”早晨被捕时，用刀割腕企图自杀未成。

(6)陈钱潮，台大电机系的学生，大概是浙江人，常常说他名字来自钱塘江。体较胖，外号胖子。唱歌最多，笑得也最多，是个乐天派。

(7)卢秀如，台大法学院学生，大概是江浙人，是一个幕僚型的人物，常常与周自强、陈钱潮、王耀华等人细语。

(8)黄金扬，福建人，台大工学院电机系学生，经常一边歪着头一边用手去拨掉在额头的头发。

(9)许冀汤,只知是台大学生,不爱说话,我相信是功课很好的学生。

(10)许华江,江浙人,唯一的有点秃头的,只知他是台大的。

(11)申德建,北京人,台大工学院学生,不大说话,是最冤枉的。

(12)陈琴,台大地质系学生,福建人,戴着银丝边眼镜,是书呆子类型的人。

(13)庄辉彰,除了我以外是我们中唯一的台湾人,个子高大,大胡子,性情明朗。

(14)赵制阳,师大学生,大概是我们之中年纪最大的,外省人,不大说话。

(15)丘宏仁,年纪最轻,有点痴呆,真不知怎么能把他当共产党抓。他父亲丘汉平是“福建省立法委员”,大概是为什么事得罪了人,把儿子也牵扯下狱。

(16)史习枚,江浙人,新生报副刊《桥》的主编,笔名歌雷,留着大胡子,但说话声音很细。

(17)董佩璜,江浙人,《中华日报》记者。

(18)王辉,不知道是何许人也,但教我们一首歌叫《感谢解放歌》,一定是北方解放区来的。

这18个人里面有一个是给“情报处”工作的。有,是绝无问题的。是哪一个,我心里明

白,但是没有证据我不敢说。所以我也只好把这位先生列入“受难者”中。

## 结尾语

50年前的这些人物现在都到哪里去了?罗老师、翁廷枢、父亲、陈文彬校长、邱宏仁、史习枚和杨肇嘉,都作了古人。“四·六”事件的受难者,后来来往很少,他们的下落,我多不知道。只知王耀华出狱后在美国与一个美国女子结婚。陈钱潮最后的消息是在大连,据说是在治疗癌症。孙达人到1997年才看到;他说在我出来以后不久也出来,结婚以后,他的夫人一度做过台大法学院的院长,他自己则含光隐锐,过了多年的快活日子。申德建后来也出来,继续读完工学院,在台湾服务。

常常有人问我:这一年牢狱之灾对你有什么影响?我想它影响了我一生做人的态度。

我在当时,坐了一年的牢,接触到各样的人,使我的对人之为人发生了很大兴趣。出来以后我没有继续上学,在家里自己读点书,以同等学力资格考上了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考这个系,基本的原因就是想知道上面所说的“人之所以为人”。 (责任编辑 洛松)



1950年张光直出狱后参加祖母祭奠礼。左三为张光直;左五为其母罗心乡;右五为其父张我军

# 蒋百里和他的 “五朵金花”



● 蒋连根

蒋百里先生是我国早年军事理论家。几年前，他的家乡浙江海宁印制的《蒋百里先生纪念册》在海峡两岸引起震动。“军界前辈，兵学权威”，“门生故旧满中华，声誉影响及世界”，两岸同胞同声赞誉蒋百里先生。

纪念册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蒋百里夫妇与女儿蒋昭、蒋雍、蒋英、蒋华的合影，另一张是蒋百里夫妇和女儿蒋英、蒋和在德国参观柏林动物园时的合影。蒋百里有5个女儿，故乡盛传是“五朵金花”。

蒋百里早年以梁启超为师，立下了建设现代国防的终生志愿。青年时赴日本、德国学习军事，前后达10年，归国后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3年6月，他的建立新军计划受北洋旧军人的阻挠，为明心志，愤而开枪自杀未成。获救后治疗期间，与照料他的日本护士佐藤屋子两情相悦，结下异国情缘，次年成婚。蒋百里喜爱梅花，替夫人取名“左梅”，先后生下了昭、雍、英、华、和，共5个女儿。

1925年，蒋百里在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中任顾问。他建议孙传芳联合冯玉祥的国民军，共同北伐，孙传芳不听，反而勾结吴佩孚，对抗北伐。年底，蒋百里从广州回到上海的家里，想到自己“利用军阀，打倒军阀”的美梦破灭，心灰意冷，不久，称病辞职，离开了孙传芳，投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流，唐生智在武汉起兵讨蒋，蒋百里帮助他训练军队。失败后，百里受到牵连，被禁于杭州西湖孤岛，后因于南京狱中，左梅夫人

带着4岁的蒋和、7岁的蒋华到南京陪伴。

在狱中，蒋百里常向两个女儿讲解唐诗，讲《封神榜》、《水浒传》和《西游记》中的故事。他对女儿们说：“赤壁借东风是天文学，木牛流马是机械学，孔明不是神，更不是妖道，是有科学头脑的军师。这样的军师多了，军队就强大。你们姐妹要读好书，将来为国防出力。”

一天，蒋华、蒋和参观囚房，看见大屋子关着许多青年学生，看样子不像土匪，便去问父亲。蒋百里抚着她俩的头说：“别看不起他们，这些人都是有出息的。”蒋百里在狱中待了近两年，给女儿讲了许多人生的道理。

1934年8月，17岁的大女儿蒋昭患肺病去世。此后，百里要女儿们多锻炼身体。1935年夏天，一家人到青岛避暑。蒋百里每天带着女儿们练习骑马。蒋百里留学时是出名的骑手，他教女儿道：“初学骑马，第一要练胆量；第二不怕跌，跌得越多门槛越精；第三要善于临机应变。”一天，三女蒋英试着骑上父亲的那匹烈马，这马绕了两个圈子后，突然纵身冲入马房，千钧一发之际，蒋英急中生智用手攀住马房的屋檐，手未抓牢，身子重重跌在地上。百里奔到她跟前，见她没有跌伤，便拍着她的肩膀哈哈大笑：“好女儿，你今天才算毕业了。”

这年12月，蒋百里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考察欧美的国防建设，为让女儿在“行万里路”中去了解世界，锻炼身体，由左梅夫人携三女蒋英和五女蒋和随行。1936年10月，蒋英、蒋和入德国学校读书前，

全家在柏林动物园游赏。园中一头母狮刚生下4幼狮，一家四口各抱了一只，拍了一张照片。蒋百里在照片上题字：“垂老雄心犹未歇，将来付与四狮儿。”蒋英喜音乐，蒋百里别时嘱她，初级学校毕业后要考专门学校学音乐，并说：“你将来学音乐，到了相当成就的一天，可能会感到空虚和孤独，那时候你不可厌倦而放弃，这是你一生学业成败的关头。”

回国后，蒋百里赴西安汇报考察情况。碰巧当上了“西安事变”中的“陪客”。他站在非党爱国人士的超然地位，协助周恩来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变局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国共合作，抗战军兴，蒋百里让妻子和女儿参加救护伤兵的抗日工作，又写信给在香港读书的蒋雍，召其回内地投身抗日前线。他在信中说：“中国抗战后整个气氛都改变了……前线和后方都是广大的课堂，置身其间比读死书要好得多。”初夏，蒋百里受聘庐山训练团讲课，将讲稿编成军事名著《国防论》，洋洋10万字，他在卷首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年底，蒋百里奉命赴欧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经柏林与留学的两女会面。一日，他带她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小女蒋和说：“爸爸，日本侵略我们中国，也是一场悲剧吧？您何不写一篇文章，鼓励军心和民

气！”回到住地，蒋百里想到时局，感触颇深，便以哈姆雷特为起头，撰写抗战论文《日本人》，揭露日本南进、北进的狂妄野心，呼喊全面抗战：“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此文一出，轰动朝野，给汪精卫等投降议和派一个沉重的打击。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在代理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的任上，因过度劳累引发心脏病逝世于广西宜山，年仅57岁。

一代兵圣志未酬，他的女儿们遵从父训，勤奋努力，为国效劳。二女蒋雍毕业于上海中西女校，赴香港皇后大学攻读英文专科，他听从父亲的教导，辍学到内地，投身抗战前线。后来在长江北岸武汉会战的田家镇激战中，她冒着寒风前往劳军。抗战胜利后，她为避内战而旅居国外，几年前在美国逝世。三女蒋英在德国学习音乐有成，1946年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华人教授钱学森结婚，建国后双双回归祖国。蒋英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副院长，现已78岁了，居住在北京。四女蒋华在上海中西女校毕业后，攻读财经专业，现年76岁，随夫在比利时定居。五女蒋和从德国留学归国后，长期担任德语翻译和教学，建国后在首都政府部门工作，现已74岁，仍居北京。近年来，蒋英、蒋华、蒋和分别参加海峡两岸的纪念活动，表达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

(责任编辑 方实)



1936年，蒋百里与夫人左梅暨女儿蒋英、蒋和在德国参观动物园时合影



# 自发起草农业法的农民费桂龙

● 汤家厚

## “是农业法专家，还是‘花瓶式’的农民代表”

在中外农村市场经济法制研讨会上，坐满了西装革履的中外农业专家和来宾。

一个脸膛黑红，身穿灰布衬衫，足蹬解放鞋的农民走上讲坛，用略带嘶哑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本来，《农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我的愿望实现了，这次会就不想来了。后来通知说，这次会主要是研究《农业法》如何贯彻落实，我还是来了，立法是前提，执法是关键。立法不执法，就像进站的火车——叫得响，行得慢，渐渐就停止了。”他生动形象的语言，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引起了与会外国专家的关注。全美农业法协会主席、衣阿华州德克雷法学院终身教授汉密尔顿先生，悄声地问中国农业部政法司立法处长高宽众：“他是那儿来的农业法专家？”高宽众微笑着说：“他是我国江苏江都县农民，是中国《农业法》第一个起草者，这次会议的特邀代表。”汉密尔顿瞪大了惊奇的眼睛，看着高宽众半天没说话。他常来中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了大批知名的农民企业家，自学成才的科技发明家，还没听说过有农民法律专家。他请高宽众给他作介绍，一定要与费桂龙谈谈，看他是否真正自学成才的农业法专家，还是“花瓶式”的农民代表？半个多小时的交谈，汉密尔顿惊喜地发现，这位貌不惊人的地道农民，确实又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中国农民，他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中国农民，very good（真棒！）”

## 庄稼地里的困惑，“是研究

## 农业法的起点”

费桂龙到底是怎样一个农民？他是如何走上中外农业专家论坛上来的？他略加思索后回答说：“那些年穷折腾、瞎指挥，给农业带来的灾难，是我搞《农业法》研究的起点。”

时光流逝，岁月悠悠。费桂龙的男低音像大运河的水，不停地向人们诉说着两代人用心血和生命写成的动人故事。

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大运河与里下河之间的杨庄乡谈套村，增加了一个“有文化的农民”——费桂龙高中毕业，报考农业大学的梦破灭，回乡务农了。虽说他是地道的农家子弟，有参军、学工、学医等很多跳出“农门”的机会，都因“反革命”父亲的株连而失去了。他不敢积极“闹革命”，只能拼命“促生产”。他聪明好学，爱动脑筋，经常想出些增产措施，获得干部的赏识，当上了农业技术员。一天，公社干部参观大寨回来，带回一包高粱种子，交给费桂龙说：“小费，这是大寨的高产良种，你先试种，然后全公社推广。”费桂龙犹豫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大寨是黄土干旱山区，我们这里是黑土水洼田，自然条件不同……”没等他说完，那位公社干部就打断他的话说：“哎呀，叫你种你就种，学大寨要见行动！”试种结果，一亩只收了几十斤，还没有总结经验教训，上级又强制推行“两稻一麦三熟制”，结果，“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搞得鱼米之乡的里下河地区，既缺米又少鱼——凡是养鱼栽藕，养鸡鸭鹅，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费桂龙不仅自己要带头“割”，还被指派去“割”别人的“资本主义尾巴”。最使他难受的是，他们到一位老农家，要老农当场杀掉“多养”的两只鸡，年过花

甲的老人，“扑通”一声跪下求情说：“我这两只鸡是给儿子吃的，他住院开刀，过几天出院回家要补身子，现在大热天杀了鸡，过一天就臭了，求你们行行好……”费桂龙双手扶起老人强忍着眼泪跑回了家。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上级领导为什么要强制农民干自己不愿干的事？种田本是农民自己的事，农民为什么做不了主？上级制订政策的出发点都是想把农业生产搞好，为什么却总是得不到效果？……夜深了，大运河的水悄悄流向远方，村里人早已进入了梦乡，费桂龙家的窗口还亮着灯光。勤于思考的他，比别人想得多一点，想得早一点，想得远一点，他悄悄地用笔记下这些别人也许不会或不敢想的许多“为什么”，默默地在自己的心里寻求着解答。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祖国大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种田自己可以做主了，农业生产连年大丰收，在希望的田野上响起了欢乐的歌。费桂龙满怀喜悦的心情，放下手中的笔，把那些悄悄记下的手稿，装进了大麻袋，准备付之一炬……串门的乡亲一席话，又使他停住了点火的手：“老费，你信息灵，外面熟人多，为什么中央1号文件几年不发了？是不是有人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灵了，又要一律搞集体了？”“你向上级领导反映，刚过了几年好日子，别又折腾！”其实在乡亲们点破之前，进入80年代中后期，费桂龙也开始有了这种感觉，只不过他起初以为，这只是当地少数干部头脑发热，不管是否具备条件，又要一阵风地搞规模经营。现在他从报纸上和电视上，看到这种现象越来越多了，就连大城市郊区也有强迫命令的现象：某县为搞规模经营，不顾坐在地头放声大哭的老农反对，硬把他已出芽的小麦承包地用拖拉机强行翻耕了。费桂龙还看到一些

部门都说“深化改革，为农民办实事”，实际是把农民当作唐僧肉，四面八方向农村伸手，不断加重农民负担，致使年年讲给农民“吃定心丸”，农民连年心难定。到底是农业生产徘徊了，还是农村改革开放政策徘徊了？还是强迫命令、瞎指挥的旧病复发，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了？费桂龙担心，老这样“徘徊”下去，农业生产会不会又要大起大落？怎样才能按农业发展的规律办事？与农业有关的各职能部门如何实现科学配套，达到最佳组合？他花了一年时间，写了一部16万字的小说《隐患》，想用文艺形式反映农村问题，揭露农村矛盾，引起领导重视。当他捧着沉甸甸的小说稿时，心里也是沉甸甸的：农村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靠一部小说，就能解决吗？他又想研究农业发展理论问题，这比小说能更直接，更明确地给领导作参考。

## 超常规的理 论探索总有一天 会被人理解

要是挑担子、推车子，插秧、割稻，他费桂龙拿得起，放得下；而搞理论研究，他只能当小学生，一切从头学起。他节衣缩食，买了哲学、心理学、《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等一批理论书籍，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看书学习，利用各种机会向人请教。“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古代的人草莽英雄，在国家危难之时，拔剑而起，报效祖国。费桂龙经过学习和调查研究，开始构思理论写作，也“拔笔起蒿莱”了。每到夜深人静的夜晚，他便坐到桌子前，聚精会神，奋笔疾书。他用系统论观点，研究农村43组功能体系协调运作的特点，探索其规律：不懂什么是农业发展规律，怎么能按客观规律办事呢？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一部42万字的《中国农村功能体系工程理论》脱稿了。他像母亲怀抱者婴儿，抱着厚厚的书稿，跑南京、上北京，到处奔走，希望得到领导、学者专家的支持和论证。没想到，人家一看他那副上访告状农民的模样，门卫不是嗤之以鼻把他轰走，就是“客气”地把他拒之于门外。他虽有些失望，却没有完全气馁。他从各单位门卫同样提出“你找谁”的问话里得到启发：我要找谁都说不清姓名，人家怎么会让我进去呢？他决定给在报纸上见过的农业部长写信，寻求支持。

这位部长看到了这封信的摘要。在一次会上他偶然提到，江苏省江都县有个叫费桂龙的农民写信说，他正在研究农业发展工程理论问题，不知道具体内容有没有实用价值。江苏有关部门得悉后，立即电询江都县委，江都县委连费桂龙何许人都不知道，马上问杨庄乡党委，乡党委的书记回答说：“费桂龙现在是我们乡水产养殖场场长，他平时不太安心工作，有人反映，他常在夜深人静时，写写画画，谁也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听了杨庄乡的汇报，县委感到更有必要调查清楚，农工部两位干事，肩负县委重要使命来到杨庄乡，立即把费桂龙叫到乡里，当面调查。这两位干事，听了乡党委的介绍，认为费桂龙写信的内容“一定有名堂”，便单刀直入地问道：“你给部长写信，反映什么问题？省里、县委领导都很重视，特意派我们来查清楚。”费桂龙一听说，他们错把自己当作写信告状的，连忙解释说：“不是写信告状，而是研究农业发展理论问题，请求领导支持帮助。”费桂龙匆忙辩解，似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两位干事追查的劲头更足了：“研究问题好呀，那你把稿子给我们看看，我们搞不清楚。就带回去，请领导帮助你审

阅。”费桂龙一听说他们要把稿子拿走，十多年心血就可能付之东流，忙说：“我初稿刚写完，现在正修改，不能够让你们拿走。”两位干事见费桂龙既没给稿子看，也不让带走，“告黑状”的嫌疑更大了，便严肃起来：“那你就给我们说清楚，你到底写信反映了什么问题？”费桂龙说：“我已经说清楚了，是你们带着框框来，听不进去，我有什么办法呢！”好你这个费桂龙，竟然反攻为守。一个年轻的干事猛拍桌子大吼道：“你写信告黑状，要负法律责任，情况不实，就要定你诬陷罪！”胸有成竹的费桂龙，不紧不慢地反问道：“你们还不知道，我到底写了些什么，就能定我的罪吗？”那位年轻的干事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乡党委书记立即批评费桂龙没有认真向领导派来的两位同志“说清楚”，又连忙向两干事赔不是，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强对费桂龙的“教育”，把这件事“查清楚”。

再没有什么比不被理解更痛苦了。费桂龙垂头丧气地走回了家。饭不吃，水不喝，躺在床上就睡，家里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几乎在费桂龙到家的同时，他被叫到乡里“挨训”的事，就传到了村里。有的说，“他老老实实当场长多好，还瞎写瞎画什么呀，一个农民能画出什么名堂。”有的讽刺说：“兴许是画天鹅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有的互相咬耳朵：“听说他是写信告领导的状，那还有好果子吃吗！”亲朋好友都来相劝：“愚夫子，还是跟我们一块去做生意，抓钱去吧。你自己苦惯了，也该为老婆孩子想想了。”是啊，要论做生意，他费桂龙有文化，脑子活，肯定不比别人差，至少也会小富起来。可是现在他还是“一穷二白”，虽说贤惠的妻子从来没有怨言，也不懂丈夫省吃俭用，贴钱去“写鸡



费桂龙（左）与友人合影

画鸭”，到底图什么，他心痛丈夫日夜劳累，眼熬红了，人熬瘦了，还像着了魔似的。叫他去挑水，他拿起扁担就跑，到了河边，才想到忘记带水桶。回到家里，他扁担一扔，又抓起笔写呀。这会儿，她听到风言风语说丈夫“告领导状要挨整”，就心惊肉跳，害怕他又像当年的公公那样，便含着泪来劝丈夫别再写写画画了。妻子提起爸爸，深深刺痛了费桂龙。三年困难时期，乡亲们一张张浮肿的脸，惊呆了从上海回家探亲的爸爸，他回原单位说了一句“农村饿死人了”，就被打成“反革命”。虽然爸爸早年已平反了，可是妻子还心有余悸。费桂龙反过来安慰妻子说：“那是老皇历了，现在国家不会再搞整人那一套。大家早晚会理解，从根本上说，我现在所干的，就是要农村不再发生那样人为的灾难。”

费桂龙“超常规”行为开始有人“理解”了。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全国政协农林组组长蔡子伟的文章，说的正是我国农村功能体系配套问题。啊，北京有知音！他以往去北京探亲为名，悄悄地带着书稿，满怀希望地直奔北京，拜访蔡

老。蔡老住院，本不见客。当他听说一位农民，千里迢迢来访，非常高兴，特许他进入病房。蔡老看他厚厚的书稿，听了他满怀激情地介绍，心里兴奋不已；还是农民最了解自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竟然有这样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啊！“不过，”蔡老对费桂龙满怀希望地说：“理论研究只能提供参考，法律才能规范领导行为。你能不能在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把其中的观点提炼出来，从法律的角度加以阐述？”他没等费桂龙回答，又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要是有一部农业法就好了！”蔡老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费桂龙茅塞顿开：是呀，全国解放几十年来，上上下下，全凭多变的政策办事，常是政出多门，号不同音，歌不同调，农民无所适从。只有把经过实践检验的好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避免“领导换政策变”，才能不左右摇摆，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动摇，给农民“吃长效定心丸”。

费桂龙象吃了兴奋剂。立即回家着手起草《农业法》。他知道。曾未接触过法律的农民，要起草这

部农业大法，除了勇气和毅力，更需要法律知识、政策理论水平，自己必须抓紧补课，从头学起。他到处求人借书、买书，从《法学理论》开始，边读边作笔记；从县档案馆借来各级党政的农业政策文件，每晚挑灯夜读，逐一对照研究；利用亲戚关系，自费到苏南、浙江、山东、上海和北京郊区一百二十多个村组调查，征求农民兄弟的意见。他先后花了几千元，连女儿上卫校的学费都花掉了，准备翻盖房屋的材料也变卖了。如今人们看到，谈套村青砖红瓦的楼房丛中，费桂龙家那幢低矮的土墙旧瓦房，就象是谁家的库房。走进空空荡荡的堂屋，白土墙上没有贴传统农家的财神爷、观音像，也没有新富农家的美人像、风景画，却有不多见的世界名人名言条幅，显示屋主人的精神追求：

生命如铁砧，愈被敲打，愈能发出火花——伽利略

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爱因斯坦

在成名的道路上，流的不是汗水，而是鲜血，他们的名字不是用笔，而是用生命写成的。——居里夫人

在这些条幅下的桌子上，有纸墨笔砚，桌旁墙角堆放着鼓鼓囊囊几麻袋，既不是粮食，也不是化肥，而是费桂龙多年心血凝聚的手稿。日日夜夜、风风雨雨，一年多的反复推敲，五易其稿，他终于从这些麻袋里提炼出一部9章46条，包括总则、生产经营、责任义务、行政管理、职业职能部门协调等，共五千多字的《农业法初稿》。世界农业大国的《农业法初稿》，就诞生在这幢简陋的农舍里，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

## 代表九亿农民走上法制建设的神圣讲台

霜浓风寒的清晨，费桂龙向睡眠惺松的县水产站长、当地一贯支持他的领导田得胜请假，吃了他夫人特意做的一碗热汤面，满腔热情，悄悄地离开尚在睡梦中的家乡，直奔北京，给蔡老送《农业法初稿》，没想到蔡老去世了。他捧着《农业法初稿》，热泪盈眶，伫立良久。找谁去呢？他硬着头皮到中国农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说这是蔡老生前遗愿，现在请他们帮助审阅。人们将信将疑地审视着他，说：“起草农业法这件大事，不是你一个农民能操办的。”他找到农业部政法司立法处，高宽众处长说：“你写出《农业法初稿》肯定有价值，但目前农业部还没得到授权，一旦得到起草农业法的授权，我们一定同你联系。”他在北京大街上徘徊：难道我就这样来京城白跑一趟？还能再找谁去呢？在铁道部工作的哥哥那里是不想去了。因为他离开农村几十年，对农村的发展的成败没有切肤之痛，还怕我惹是非，曾劝我：“不要再写那些东西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不是写过去，为个人和家庭申冤诉苦，而为九亿农民讨说法，为国家农业未来发展献计献策。他回到寄居的北京朝阳区光华旅馆地下室，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忽然，他心头一亮：党中央领导一定关心农业发展，与农民心连心。他一跃而起，奋笔疾书：

江泽民总书记：

您好！我是苏北农民，中共党员，本人业余爱好农村理论研究近20年，并写了《农业法初稿》。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的通知和中央政策研究室要求实事求是调查农业的情况，我很激动，于本月13日自费来京，想论证此稿。几日来走访了一些农业领导单位和研究单位，回答是：1. 农业法不是我写的；2. 他们管理权力有限，

没有办法，只好用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写信报告给您，并随信寄来《农业法初稿》……

费桂龙敬呈于光华路旅馆

90年12月16日

费桂龙第二天寄出信便回家了。但他的心还留在北京，时刻等待着北京的回应。不久，他从《农民日报》上看到，一百多位人大代表、七十多位政协委员，汇集了各地农民的意见，纷纷提出议案和提案，强烈呼吁快制订《农业法》。从此，为制订《农业法》奔走呼号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热情之高，要求之迫切，所提议案、提案之齐全，都使费桂龙兴奋不已。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制订《农业法》大有希望了。

1991年6月3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费桂龙第一次接到农业部政法司来信，充分肯定他的《农业法初稿》，“是一份有意义的文稿。我们起草《农业法》时，将吸收你的研究成果。”就像播下的种子，有了收获的希望。果然，他第二次接到通知，请他1992年5月底至6月初，到浙江省萧山县，参加全国农村法制建设研讨会，主要是研究修改《农业法征求意见稿》。

然而，当他高兴地向乡党委书记请假时，这位书记却大为吃惊地问：“农业部通知你开会？党委怎么不知道？县委怎么不知道？县委要是知道，肯定会先通过我们，怎么直接通知你个人？”费桂龙说：“这是个研讨会，与会人员各抒己见，谁也不代表组织，我写过稿子，所以要我参加。”这书记直摇头：“那你更不能参加，现在以各种名义开研讨会，都是骗钱的。”费桂龙哭笑不得，忍气吞声地解释说：“这是研究农业法的大事，不可能是骗钱；再说，要真是骗钱的话，我也没钱让人家骗啊！”书记

见费桂龙仍“固执己见”。便严肃地教育他说：“你是党员干部，不能再到处乱跑，影响工作了。”费桂龙也有些生气了：“我没影响过工作。县水产站连年评我为先进，乡党委还出简报表扬我说，在抗洪救灾中，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场部被水淹了，我把抢洪指挥部搬到船上；渔民被洪水包围，顶风冒雨，把他们一户一户运到安全地带，日夜筑堤，七天七夜没吃过一顿舒心饭，没睡过一次安稳觉，没有回家一次……”乡党委书记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你必须遵守组织纪律，不准你去萧山开会！”费桂龙也急了：“这次会，我非去不可。那怕回来你处罚我也要去！”说完，便扬长而去。

钱塘江畔的萧山县，全国农村法制建设研讨会，如期在这里举行。各地来的专家荟萃，教授云集，还有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使费桂龙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第一次参加这样高层次的会议，他的心像钱塘江

潮一样，汹涌澎湃：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誉，而是当面听到这么多专家学者高水平的发言，使他大开眼界，拓宽了思路，长期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许多难题，得到了满意的解答。在会议的特意安排下，他激动地走上了讲台。首先他谈了农民兄弟渴望《农业法》早日出台的迫切心情，然后便对《农业法征求意见稿》，从文字到内容，提出了七条修改意见，特别是谈到要坚决减轻农民负担，不能再让“六顶大盖帽围剿一顶破草帽”时，与会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有人悄声地说：虽然全国农民现在还不认识他，但他确实实是代表九亿农民在发言！

### 一个平凡而又不 平凡的中国农民

1993年7月2日，是共和国农业法制建设史上最辉煌的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8月

初，以研究《农业法》如何实施为主题，在京召开了中外农村市场经济研讨会。费桂龙作为唯一的中国农民代表、《农业法》的最先起草者，出席了会议，受到国内外专家的欢迎。虽然他毫无炫耀之心，会后便悄悄地回家，白天和过去一样，在水边塘口忙碌，夜晚仍坐在窗口笔耕不止，赶写《关于深入宣传贯彻农业法，强化农业基础的建议》，但他起草《农业法》的事迹“曝光”后，立即成了江都县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县委书记、县长特地向他表示祝贺，并下令改善了他的工作条件，把他调到县农科所当副所长。费桂龙并没有在掌声和赞扬声中陶醉。他还没有忘记那42万字的《中国农村功能体系工程理论》，正准备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帮他审定呢。

好一个费桂龙，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中国农民！

（责任编辑 舒 蓝）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举行戊寅年新春联谊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京顾问、理事、会员新春联谊会，1月16日在文津俱乐部举行。

会长萧克到会向莅会同志致以亲切问候。常务副会长黑伯理代表萧克和研究会常务会议讲话。他说：“1997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香港顺利回归，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全国各条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团结奋斗，取得了显著成绩。研究会全体同仁，遵循我会的宗旨，开展了多项活动，取得了不少成绩。”他在一一列举过往工作情况后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和中华传统美德，围绕“中华文化与21世纪”这一题

目，组织学术研究，联系海内外学者，促进祖国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

联谊会由常务副会长冯征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有顾问李运昌、李力安、乔晓光、张致祥、刘导生、李学智、赵海峰、赵健民、强晓初、王宗槐、徐信、郑惕、胥光义等，有副会长庄炎林、杜导正、温济泽等，以及张钰秀、谭友林、谢振华、欧阳毅、杨秀山、贾若瑜、刘少卿、邓家泰、唐凯、鲍奇辰、王纯、马少波等老同志。

出席联谊会的理事、会员百余人，欢聚一堂，欣赏了北京市青年实验越剧团演出的精彩折子戏。

# 邹韬奋和

## 几位名人的交往

● 黄侯兴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我们从邹韬奋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交往中，看到的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和帮助。

邹韬奋先生出版过散文集《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堪称是现代散文家。自1926年主编《生活》周刊后，他的活动主要在办刊物和办书店这两项事业上，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受到左翼的、进步的作家普遍尊敬和信赖——无论是在人品上还是作品上。这在中国新闻界和出版界可以说是少有的现象。

先从鲁迅先生说起。

鲁迅与邹韬奋，1933年1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上海分会成立之时，他们二人均为执行委员。鲁迅对韬奋的道德文章是敬佩的，对韬奋的事业是关心和支持的。

1933年5月9日，鲁迅致邹韬奋信云：

韬奋先生：

今天在《生活》周刊广告上，知道先生已做成《高尔基》，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

我以为如果能有插图，就更加有趣味，我有一本《高尔基画像集》，从他壮年至老年的像都有，也有漫画。倘要用，我可以奉借制版。制定后，用的是那几张，我可以将作者的姓名译出来。此上，即请

著安

鲁迅 上 五月九日

做成《高尔基》，即韬奋正在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鲁迅如此热情与主动，说明他对韬奋的此项编译是倾力支持的。次日，韬奋复信表示要借用画像集。17日，韬奋用毕后即归还。

《革命文豪高尔基》于1933年7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7月17日《申报·自由谈》就发表了署名林翼之的《读〈高尔基〉》一文，指责了韬奋编

译上的缺点，至于它给读者的益处，却一句也没有说。鲁迅因此在《关于翻译(下)》一文中要为韬奋及其编译辩护。鲁迅说那本书他“曾经翻过一遍”，觉得除批评者所指摘的缺点之外，另有许多记载传主的勇敢与奋斗，胥吏的卑劣的阴谋，是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不能因为有了烂疤，就被抛在筐子外面了。要知道，30年代左翼文艺、进步文艺，包括翻译作品，往往因为存在某些缺点而被某些人说得一无是处，当做“烂苹果”扔掉，是很普遍的事。所以鲁迅要以《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为例，希望批评家们都学会“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是有益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许多文化人陆续撤退到香港，另筑“精神炮台”。此时邹韬奋已抵桂林，正由李任潮先生安排他来港事宜。因为他是国民政府参政员，又是秘密离开重庆的，人们担心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算。但他终于在2月10日平安到达香港。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一书中如此描述了韬奋此次来港的心情及其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他是一位十分讲究工作效率的人，同时对于蒋介石查封了各地的生活书店这件事非常愤慨，所以，在廖承志同志为他举行的欢迎便宴上，他说，当然最好是办报，但是为了尽快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反击，他已经决定先把《大众生活》复刊。因为生活书店在香港有分店，还有几位追随他多年的战友，所以办周刊可能比较容易。

此次来港的一批文化人，以韬奋为中心，目的是在港办报办杂志。当时蒋记的、汪记的特务都要破坏韬奋的活动，港英当局也不欢迎韬奋来办刊物，所以恢复《大众生活》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港英当局关于刊物登记条例规定,刊物负责人是发行人,而发行人须是“港绅”。韬奋必须找到一位港绅合作,《大众生活》才有望复刊。凑巧曹克安利用他父亲是港绅,早已登记好了要办一个周刊,只因没有合适的主编,故尔刊物没有问世。曹克安过去读过韬奋的著作及其主编的刊物,对韬奋的道德文章又相当熟悉,对于韬奋一向怀着敬佩之心。一经介绍,复刊的事就成功了。韬奋任主编,编委有茅盾、夏衍、千家驹、乔冠华等人。夏衍说:“韬奋的特点是用他特有的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和读者,同时又以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编辑和经营这份刊物。他不止一次说过,他办刊物的经验是亲自抓‘一头一尾’。‘头’是社论,‘尾’是答读者来信(就是‘信箱’和‘简复’)。社论绝大部分是经过编委讨论题目后由他亲自执笔的,而他花精力最多的,则是答读者来信。”复刊后的《大众生活》周刊,曾连载茅盾的中篇小说《腐蚀》和夏衍的中篇小说《春寒》。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后不久,韬奋等人陆续撤离香港。《大众生活》于12月6日出至新30号便停刊了。

邹韬奋先生于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终年49岁。10月1日上午,郭沫若在重庆,前往银社参加宋庆龄、黄炎培等72人发起的“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为主祭人之一。郭沫若送去了一副挽联:

凛谈百代传邹子 信史千秋哭贾生

郭沫若在追悼大会上发表了讲话,称颂韬奋先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位好工程师”。“你把你自己的慷慨地奉献给了人民,而你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很庄严的完整的艺术品”。沉痛的悼文交织着对国民党蒋介石媚日反共的悲忿激昂的控诉。郭沫若号召文化工作者继承韬奋未竟之业,继续用笔为争取反法西斯的胜利而战斗。“我们要纪念你,韬奋先生,我们定要永远地保卫这枝笔杆,我们不让法西斯再有抬头的一天,不让人类的文化再有倒流的一天。这也怕就是,你通过你的笔所遗留给我们的遗嘱”(《一枝真正的钢笔——在邹韬奋先生追悼会上的讲演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第493—495页)。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各界相继召开的追悼会上,都宣读了郭沫若的这一讲演辞。

韬奋逝世后,茅盾于9月18日撰写了题为《永远年轻的韬奋先生》一文,用“年轻”、“天真”等

字眼儿概括了韬奋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也是作者认为韬奋最可宝贵的文化品格。文章开头从韬奋的年龄说起,说他是一位饱经忧患的50岁左右的人了,然而初见时总觉得他不过三十多岁,“和他相处稍久,你便会觉得估量他有三十多岁也还太多,实在他好像只有二十来岁”。文章接着分析了产生这种反差现象的原因,即韬奋在言谈举止上还保留着青年人“活泼和热情”的特点,不过在精神气质上,青年人却“未必能有韬奋先生这样的天真”。作者指出:

对人的亲切,热情,对事的认真,踏实,想到任何应该办的事便马上去办,既办以后便用全副精神以求办得快,办得好,想到人世间一切的黑暗和罪恶便愤激得坐立不定,看到了卑劣无耻残暴而又惯于说谎的小人,满嘴漂亮话而心事不堪一问的伪善者,便觉得难与共戴一天——这些都是韬奋先生的永远令人敬仰之处,然而,我以为最可爱者仍是他那一点始终保持着的天真!

茅盾写出了韬奋所具有的歌直、正派的品质,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光明正大、嫉恶如仇的本色。但是,韬奋还有不同于其他文化人的特殊品格,那就是“始终保持着的天真”。

接着,作者像是絮语、浅唱,歌吟着韬奋的天真——“不计利害,不计成败,只知是与非,正与邪”;“对于畏首畏尾的朋友,他有时会当面不客气地批评”;“办一件事,有时会显得过于操切”;“为了忘记疲劳,会在噱头主义的歌舞影片之前消磨数十分钟而尽情大笑”。

作者写出了韬奋的真实的人格,它不是深不可测的海洋,而是清澈透明的溪流。这清澈透明,恰是韬奋人格的可爱之处。“要他在一个恶浊的社会中装聋作哑,会比要了他的命还难过。他需要自由空气,要痛快的笑,痛快的哭,痛快的做事,痛快的说话。他这样做了,直到躺下,像马革裹尸的战士”。正因为“多了一些人情世故圆熟得像一个‘太平宰相’似的青年”,多了一些装聋作哑的人,韬奋的那份“天真”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茅盾在悼文中反复吟咏韬奋的“天真”,似乎显得过于单纯与平淡了。然而,它正是从复杂的社会人生中提炼、筛选出来的单纯;那平淡,也正是经过极度绚烂却包裹着虚伪和丑恶而终于返璞归真、显露出真正的人的本色的平淡。

茅盾的这篇文章,写得最精彩,最富神韵,最形象、最生动地画出了韬奋的像。

(责任编辑 舒元璋)

# 我和艾青的师生谊

● 丁 帆

艾青老师走了，他走的是那么平和，那么安详，那么静谧，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对他悲伤，哀悼、流泪、哭泣……还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我和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马琦、中央音乐学院一级演员前民去看望他，艾青非常高兴并幽默地对前民说：“你这个‘杨白劳’也老了！”前民曾是歌剧《白毛女》中扮演杨白劳的，给艾青留下深刻印象，他一直不忘，有时不呼名字直称“杨白劳”。我当时正在写《我和艾青》这篇文章，就以此作为对他的怀念吧！

早在40年代初，我读高中时，便吟诵过艾青成名之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它完整的艺术构思，独特的艺术魅力，一下子便把我吸引住了，特别是它的进步思想，使我敬佩倾倒。1946年3月，沈阳《文化导报》被国民党捣毁查封，我们避开敌特追捕，到北平新华分社《解放》三日刊工作时，不断读到他写的《北方》、《我爱这土地》、《黎明的通知》、《向太阳》等，更使我尊崇爱戴。不久，由于国民党驻北平军警宪特制造“四·三”事件，非法逮捕了我《解放》三日刊工作人员，党中央立即提出严重抗议，并通过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叶剑英提出交涉，加上我们坚持斗争，广大解放区和进步文化团体也大力支援，最后终于获得胜利。释放后，经过组织同意，我于4月18日越过敌人封锁线到张家口，入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当时艺术学院院长是我党卓越的艺术教育家、翻译家沙可夫同志，副院长便是我国现代的杰出诗人艾青同志，其他还有萧军、丁玲等一批学者、知名人士、艺术家……这使人对到华北联大学习，感到很幸运和自豪。

在华北联大，艾青同志是我们的直接领导，

也是老师，给我们讲授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课。记得在筹备新年联欢会时，系里一个同学代表大家向艾青副院长建议，请求排演曹禺名剧《原野》，并已设计好由他扮演仇虎。这样的建议请求，在日寇刚投降不久，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正调兵遣将积极挑起内战进攻解放区的时候，显然是脱离当时斗争实际情况，很不合时宜。但艾青院长并没感到奇怪，对待学员脱离实际的狂热，不是责怪批评，而是亲切温和地加以引导，并带着商量的口气向大家解释：“你们刚入校不久，排演《原野》的条件还不具备。况且，现在抗战虽然胜利，国民党的战火硝烟从未停息，张家口是新解放的城市，人民群众对我们还不十分了解，他们很需要了解解放区的民主斗争生活，喜欢争取和平鼓舞斗志的现实节目，你们想排戏，想法很积极，我建议你们是否可考虑排演《把眼光放远点》？”同学们被说服了，按艾青院长提议排演《把眼光放远点》，提建议的同学在剧中扮演大刚，一个积极抗日的青年，演出后获得好评。

1946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攻袭张家口，学校奉命转移撤向河北冀中，经过八百里小长征，师生们经受一次长途跋涉的战斗洗礼，政治思想有很大提高。学校为保密改叫“平原宣教团”，三中队即艺术学院，住进束鹿县小李庄，上课便在打麦场或枣树林中。艾青院长的文艺思想理论课就在这里讲授，他讲课时深入浅出，形象生动，非常有吸引力，是同学们最喜爱听的课程之一。尤其他的讲课艺术，语言缓慢平和，诙谐幽默，有时妙语横生，有深刻的寓意并富有哲理，常获得同学们的掌声与笑声，深受好评。如讲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自命清高、好高骛



远、自以为是，他以农村中毛驴拉磨来作比喻：“小毛驴戴上蒙眼后，一走半天，它自以为不定走出去多远的路呢？结果蒙眼摘掉，却仍在原地绕圈，没走出去一步……”这种非常通俗生动形象深刻的比喻，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在笑声中却留下深深的烙印，受益匪浅，至今仍铭记在心。

艾青院长从来没有那种名人、学者、专家所特有的高傲酸气，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常与同学打成一片，无上下级之分。每逢年节，他常到系里同学们住在老乡家的宿舍，一起包饺子，话家常，讲笑话，这样不仅化解了同学们思亲之念，密切了师生感情，而且一点也不拘谨，更尊敬他，爱戴他，有些心里话或思想上有什么解不开的问题，都愿意和他谈，他也饱含浓厚的阶级感情，以一个兄长的态度，全身心地来帮助每个人。他既不强加于人，更不勉强委曲求全，完全让你自觉地愿意接受他的意见或看法。因此，除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同志关系外，还有一种最珍贵的师生爱、战友情。

我在系里是干部，又在新华分社工作过，校领导比较了解我，也受到艾青院长的偏爱与器重，有时在节假日，他常带我一个人在田野里散步闲谈，面对冀中农村的平原风光，大都谈论人生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话题，也谈他自己在法国留学时怎样被法国人看不起，又如何受到十月革命时期的小说和诗歌，尤其是惠特曼、凡尔哈仑、马雅可夫斯基、布莱克等人的影响，与诗结下不解之缘。当然，更主要的是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他还谈到有次回上海坐人力车与警察作斗争等往事，偶而兴致所至，也吟起诗句，谈些诗的创作，显得异常儒雅直率而爽朗。他曾说：“诗与伪善是绝缘的”，诗人“必须有勇气向大众揭示真理。”至今想来，这也恰是他多年来一贯奉行的人生准则。经过几十年的人海沧桑，我去看望他，他说：“人活着就应该微笑。”这话的内涵是很深的。我感到与他接近交往，不单受到他诗人气质的感染，而且受到他的睿智，他对祖国、对党和人民的无限深情，以及对当时自卫战争胜利的信心与乐观情绪的感染，使我在愉快亢奋接受充满哲理的教诲中，



著名诗人艾青

增长知识，受到启迪，加强了我为革命胜利而学习工作的使命感与紧迫感。

在我即将毕业就要离开学校的七八月间，我和艾青院长接触的较多，谈话的次数也最多，我觉得他非常关心爱护我，也特别理解我，交往比较深。我翻了保存的日记。1947年7月23日是这样写的。

“午睡后，我和艾青同志谈话，内容是谈思想，主要是我毕业后的工作去向，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我首先谈了自己想法，主要想回东北到野战部队去。艾青同志根据我的情况，他从历史谈到当时的斗争形势，并针对我的思想谈到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改造问题。要我从个人观念解脱出来，一切要有远见。”的确当时我非常思念故乡，存在家乡观念。艾青同志认为我很有工作能力，想留校作一短时期的事务工作，然后分配到文工团。这却是个矛盾，让我很好考虑后再定，最后还是决定我到阜平陈南庄中央局分配，看有没有可能去东北？……”

8月23日举行毕业典礼，26日全文艺学院召开送别会，沙可夫与艾青两位院长向毕业同学赠言：加强主人翁思想，培养对新社会的感

情,重视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无论到任何单位要尊重组织,看别人的长处,尊重工农兵干部,向老干部学习,有不足的地方要善意提出批评……

分配到陈南庄中央局去的路最远人最多,4男8女共12名同学,而且有病号。艾青同志宣布名单时要我负责带队,并准备好了路条、介绍信和动员证……。临行前,他又单独和我谈一次话,嘱托我多注意全组的安全,保证身体健康,作好同学们的思想动员与解释工作,并要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安全顺利到达中央局。最后一再叮嘱我,如果去不了东北最好还回学校来。出于对学校的留恋,师生的感情,特别是我与艾青老师的个人情谊,我真是恋恋不舍,热泪盈眶,以至泣不成声……

一路上,我牢记艾青院长在1947年新年晚会上的祝词:“时间似列车,新年似车站,我们要赶上列车,不要误了钟点。”我抓紧一切时间,严于律己,团结同学总算平安到达中央局。遗憾的是,由于战争情况,交通断绝,根本无法去东北。后几经辗转未成,便于10月上旬返回学校。

10月8日的日记:

“中午到校,首先到院部去看艾青同志,他一见我们异常惊喜,忙问情况,我说过后,他说:“太好了,我非常高兴地欢迎你们回来,学校正需要人,你们先到文工团报到去,有什么事以后再谈。文工团团团长周巍峙同志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这样,我们的工作总算定了下来,我又开始在艾青院长的领导下工作了。”

11月12日中午,院部的钟声突然响了起来,是全中队紧急集合的号令,大家猜想一定是石家庄解放了。果然,中队门前已聚集很多同志,有的大声喊:“石门解放了,石门解放了!……”接着鼓声锣声连成一片,秧歌腰鼓队很快组成了。我老远地看见艾青同志满面笑容站在那里和大家打招呼,我招招手相互表示祝贺,便随着响亮的锣鼓声与沸腾的秧歌腰鼓队,如同卷在潮水中一般地向街心涌去,天空中荡起“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

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文工团更名华北大学文工团,团长为舒强同志。1948年9月19日成立大会上,艾青同志在同志们热烈欢迎下离开座位微笑着说:文工团是个年轻的团,应根据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大胆创作,过去实践证明,它为群众所熟悉,易于接受得到欢迎,对形式上要求轻松活泼幽默些,对主题思想,当然要严肃。以前只有戏剧与音乐,形式单调,今后应丰富些。华大文工团要继续强调思想性,今后应强调现实性演出,它应争取,也必然要成为华北解放区文艺团体的模范。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由于工作需要,艾青同志离开学校到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做军代表,记得是1949年3月初,我被通知参加一次座谈会,艾青同志在会上讲述了党对文学艺术以及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8月,我光荣地参加了在布达佩斯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后曾送一本《世界美术家名画集》给艾青同志。

1950年底,我自愿从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参加抗美援朝到朝鲜战场,便和艾青同志阔别了。以后经过“文革”,他到新疆我在东北,师生都住牛棚,整天请罪、写检查……一直到80年代我们都平反落实了政策。尤其到90年代初我离休后,每次去京都都要去看望他。他永远是我的老师,并且我永远牢记在1947年8月26日,我从华北联大毕业,离开驻在冀中东鹿的母校去陈南庄中央局时,艾青老师给我的临别题字:“永远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已从一个年轻小伙子变成一个74岁的老人。多年珍藏在我心底的师生情、战友情、同志情,经受着时间和烈火的考验,年代愈久,愈加闪耀着珍贵的光华。

现在老师走了,怎能不让我痛心。然而,艾青老师他并没有死,作为诗坛泰斗,他的生命并不依靠肉体而存在,他和他的诗将永存!我需要敬爱的老师,人民需要与他们共苦乐的歌手,祖国需要他来歌唱,诗坛需要他的声音……他伟大的人格力量和他的诗文,永远也不会死亡,他是不朽的!

(责任编辑 徐 孔)

编者按：《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原是本刊向戴煌同志的约稿，刊登在1995年《炎黄春秋》第11期上。在此之后，本刊又先后发表由他撰写的在胡耀邦同志关怀下平反的多起冤假错案的文章。这是戴煌同志经多年积累又作了八个多月的采访写成的力作，全书三十多万字。这些事实准确、内容生动感人的文章，为全国数十家报刊分别发表或转载，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反响。1997年9月，首先由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先生为董事长的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结集出版，1998年新春再版。现特发表张黎群同志撰写的对此书的一篇评论。

# 勇敢的义举，勇敢的创作

## ——评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 张黎群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是一本好书，问世不多日，即再版印行。好书人人爱，众人读，大家受益。

胡耀邦以非凡的勇敢精神，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同志的领导、支持下，经过复杂艰苦的斗争，取得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全胜。戴煌以非凡的勇气秉笔直书，真实地记下、描绘了我党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举措，产生了这部传世之作。

胡耀邦之所以能够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业绩，根本的因素是共产主义精神将他铸造成无私无畏的品格，大智大仁大勇，“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认准真理，义无反顾，锐不可挡，无数冤假错案，一一翻过身来，还以本来面目！千百万横受株连者脱离苦海！纠正了“左”的路线的危害，吸取乱整人、乱判案的教训，创造了心情舒畅、祥和团结的大好局面。

戴煌之所以能够完成这部真实、全面、感人的史书，根本的因素是，人民记者的责任感，共产党人的责任感，促使他以勇敢无畏的精神，克服困难，历经险阻，如实地将胡耀邦的历史功勋公之于世。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戴煌本人就是大量冤假错案中受害者的一个，有真情实感的体会；他唯真理是从，置个人恩怨和安危于不顾，出以公心、真心、诚心，写出反映事实、讲真话、感人肺腑的好书。

这本书老一代人看了，从中悟出更深更多的真理；年轻一代看了，从中认识到伸张正义的深远巨大意义；执政的领导看了，从中明了秉公执法、清正廉明与人命关天的重大关系！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人都可从中吸取深有意义的东西。

（作者系原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 罗素 20 年代

## 对中国未来的预言

● 岳健国

伯特兰·罗素，英国哲学家，是 20 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1950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20 年，他来到中国作了一年的讲学，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行为习惯等作了大量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他以自己特有的睿智、远见和洞察力，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文明作了深层的分析、透视，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评析了中西文明的特征、优劣和价值。他当时在中国各地的演讲以及回国后不久就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后来结集为《东西方文明比较》），受到我国进步人士的热情欢迎和赞赏。孙中山先生称他是“唯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的《中国人的性格》一节中，罗素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他认

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性格品质上的明显差别表现在：西方人生性好战喜欢竞争，中国人气质平和，安于现状；西方人爱权，中国人爱钱；西方人重视人际交往的直率，中国人讲究人际交往的客套；西方人办事倾向彻底，中国人办事喜欢妥协；西方人崇尚变革，中国人易于保守；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突出优点是对生活目标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中国人可以从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效率的品质，而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罗素是抱着寻求救世良方的目的来中国的。针对当时西方侵略者对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的诬蔑，罗素非常珍视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有益于全人类的价值，坚决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调，认为“中国的文化问题，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全人类都具有最重要的意

义（《中国的文化问题》）。”

在本世纪 20 年代，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罗素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作了许多天才的预言，现列举以下几段。

### “他们很可能 会超过我们！”

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一节中写道：

“……中国的学生很能干而且特别勤奋，中、高等教育苦于缺少资金，缺少图书馆，但绝不缺乏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尽管迄今为止中国文明在科学方面有缺陷，但它从来没有包含任何敌视科学的东西。……我敢断言：假若中国人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充裕的资金，那么在将来 30 年内，他们将会在科学上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很可能会超过我们，因为他们具有勤奋向上的精神，具有民族复兴的热情。”

我们到了 1949 年才有了一个稳定的政府，关于拥有

充裕的教育资金，现在恐怕还没完全做到，但中国确实已在科学上创造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 中国应不应学习西方？怎样学习西方？

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一节中说：“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与艺术已不像过去那样具有生机，孔子的儒教已不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需求了。凡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的新因素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他们希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国人不被煽动尚武精神，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更加灿烂的文明。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罗素在《中国人的文化问题》一节中又说：“我相信，假若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中国人应不应向西方学习，应该怎样学习西方，中国人自己争论、探索了半个世纪，现在我们似乎已找到了正确的办法，而这种办法20年代罗素就已经提出并说得非常清楚了。罗素提到的

“尚武”精神，是指当时的日本而言的。他认为日本人在学习西方优点的同时，也学会了西方的好战、好侵略的缺点，他认为这种东西不利于中国创造新文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人没有向西方人学习这种“尚武”精神，当然也不会重蹈日本成为战败国的覆辙。中国人正象罗素预言的那样，正在开辟一种更加灿烂的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

## 假如中国人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理所当然地实行变革！”罗素肯定地写道。他又在《中西文明比较》一节中说：“……中国人认为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恶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西方白种人那种对其他民族的人民实行集权统治的欲望。……中国在世界上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本质上有一种宽容和友好的态度，他们表现出谦恭有礼，并希望别人礼尚往来。假如中国人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他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中国人的某些行为方式，但大规模地改变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却是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中国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之后，仍保持一腔宽容友好的和平心态，反对战争，保卫和平，那中国肯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总想支配他人的缺陷。

## 罗素最天才的预言

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一节中写道：“中国只要在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结合移民和大规模的控制生育，是永远可以消除饥荒的。”他这里提出的计划生育观念，比马寅初“人口论”中的计划生育观点早了几十年。

在同一节中罗素又写道：“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除了有点懒散和缺乏激情外，大凡聪明能干而又多心多疑。但是，这只是他们性格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会狂热激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集体的狂热激动。……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使他们变得不可捉摸，甚至对中国人的将来也难以预料。你可以想象他们中一部分人会变成积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勇敢无畏的抗日救国者、狂热的基督教徒或狂热地献身于某个最终宣称自己为绝对统治者的领袖。……”

罗素的这些言论都写于1925年以前，他能预料到中国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预料到中国可能会发生的抗日战争，预料到没有外国人奴役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命运主宰者的诞生！

我想，如果今天的我们能认真读一读罗素70多年前对中国的分析评价和预言，那么在对产生惊叹和崇敬之情外，肯定还会产生认识现实中国问题和推测中国未来的许许多多的感想。

（责任编辑 舒元璋）

# 爱国思乡织锦诗

## ——记“千联斋主人”谢鸿轩

● 郭静洲

台湾学者、著名的收藏家、诗人谢鸿轩教授于1997年8月16日偕夫人周弘及子女一行5人回乡省亲。

谢氏自1992年开始已三次还乡，已将毕生收藏部份珍贵书籍1276册，无偿地捐献给繁昌县图书馆。1997年8月18日下午，繁昌县人民政府在繁阳宾馆举行“欢迎谢鸿轩先生回乡省亲暨赠书仪式”。对谢氏眷念乡里与无私奉献的精神，作了高度的评价。

谢鸿轩教授是安徽繁昌县人。1917年出生于诗礼世家。因酷爱收藏典籍，尤喜楹联，所以又自称“千联斋主人”。谢氏自幼入塾，饱读四书五经。10岁学古文辞，12岁习诗词，14岁开始习作骈体文，才名盛传乡里。后由芜湖广益中学毕业，升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从唐文治大师研习治学之道。家藏唐老夫子编纂的《十三经读本》线装120册，在台湾成为孤本，已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传世。

“七七事变”，日寇入侵。谢氏愤而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6期，毕业后，复入中央政治学校学习。1944年他又被派往青年远征军第二〇八

师任政治督导员。抗战期间，他驰骋疆场，屡立战功。抗战胜利以后，他敬业桑梓，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谢氏浮海去台，即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曾任嘉义市立女子中学校长、嘉义市立工业职业学校校长兼任台湾省立嘉义工业补习学校校长，并于议政之余，任职于台湾师范大学、私立辅仁、淡江、中国文化等大学教授，主讲骈体文40余年。主讲课程有《骈文选》、《散文选》、《诗选》、《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四书》及《春秋左氏传》等，及门弟子约有万人。据台湾《国语日报》1988年著文载：“至于目前在台学人而以骈文称家的有成惕轩和谢鸿轩，时称“二轩”。

谢氏学识渊博，著作有《骈文衡论》上中下三册，共18章，50万字，由广文书局发行后，一版再版，评价很高。另有《中国历史歌》、《中外历史纲要》3册、《本国史表解题纲》等。所撰《鸿轩文存》6集，均为骈文。

在台期间，他曾力主兴建丘逢甲抗日起义纪念碑。丘逢甲（1864—1912）台湾苗栗人，光绪进士，辞官主讲台湾

衡文书院。他得知清廷有割让台湾之议，曾刺指血书“抗倭守土”四字，台湾人民纷纷响应，组成抗倭起义军、与侵台日军血战二十余日，终因弹尽援绝，全军失败，从而内渡原籍广东定居。他的离台诗中有“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血泪诗篇，书生义愤，痛斥卖国者之言词，百世以下，犹凛凛有生气。1959年，台湾“考试院”院长、安徽巢县人杨亮功及历史学家萧一山先生创立“逢甲工商学院”（逢甲大学前身）于台中左屯。1966年，谢氏联名向“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提议兴建“丘逢甲抗日纪念碑”于起义地址。1973年复于“逢甲大学”建丘逢甲纪念馆，谢氏为撰写碑文，有云：“仰先生之浩气，扬历史之荣光。台人报国，典范长存，大义孤忠，勋猷永记。”对丘逢甲抵御外侮，爱国爱乡的精神作了适当的评价。

谢氏收藏近50年，收存古今名人字联千余幅，故号其书屋曰“千联斋”。1978年，谢氏新居落成时，仍由张大千大师为其书额，榜于门首。现斋内所藏书画约5千件，其中楹联就有2600幅。自1971年元

旦起，谢氏以收藏楹联编刊《近代名贤墨迹初辑》，至1992年止，已刊成12辑，共有600家楹联。谢氏为每一书家各写传跋300字。并拟再刊续编4辑，每辑百联，亦作书家简介，以完成“千家联”问世之宏愿。

1978年，张大千大师80寿辰，谢氏为撰寿序，楷书长卷奉祝。谢母童太夫人80寿诞，大千大师从美国寄来所绘《黄山图》为祝。“千联斋”珍藏有张大千大师的书画多件。

“千联斋”收藏名联，多次在台湾展出。1983年10月，台湾历史博物馆应日本书道协会及产经新闻社邀请，在日本东京举行书法作品展览会，在展出200件书法作品中，“千联斋”就提供了138件。

谢氏毕生精力多用在教育、学术、辞章及鉴藏方面，不遑临池，自谓不敢称为书法家，其实他的《百首回文联集》以及《近代名贤墨迹》为每家所书的传跋，洒脱隽逸，富有古风，与“名贤墨迹”相衬托，内容形式，相得益彰，诚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最为可贵的，谢氏旅台以后，怀乡心切，时以居住在安徽省青阳县的慈母为念。每年除夕，向北痛哭，思母辍宴。当两岸冻结之时，常命其长子启中，经香港返回大陆，奔赴青阳县、问候祖母起居。每当老母寿辰，必在台设宴邀集亲朋，遥为祝寿。当太夫人80大寿时，国学大师钱穆曾为撰写寿联云：“白云天外人长寿；赤子心中日永春。”白云故乡，天涯赤子，骨肉之情跃然纸上。

至于他对回文联的创作，还是起步于抵台之后。在台湾学者中，擅长于回文诗联者首推溥心畬大师，溥与谢氏早

年同参“国大”，议政金陵。抵台后，又同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溥曾书赠回文一联曰：“低云片水临风晚；远树寒窗对月明。”已编入《近代名贤墨迹二辑》并于其辑中影印清人沈景修《回文楹帖》。谢氏治六朝文，蓄千家联，所藏2600副联中，名家所撰回文联仅此两副。谢氏公余之暇，经常欣赏古今名联，发现有回读可能的，则更动数字，成为回文联，逐年累积，积腋成裘。曾自作回文诗多首以遣兴。友人助兴，也为他刻“治骈骊文玩璇玑诗”石章，又刻“千联谢氏”、“鸿轩回文”小印。1986年，他作《丙寅新春书怀》回文绝句二首：

并序：年节命诸儿至历史博物馆抄溥心畬诗，为之检校，得二百余首，类皆锦绣之篇，间有璇玑之什，诵之回环，叹为观止。爰有效顰之制，亦属书怀之辞也。

波急涌天碧海遥，  
白头悲赋客魂销。  
多年历梦归帆去，  
岷岭啸歌半野樵。

茫茫碧海隔山河，  
老杜嗟时感事多。  
堂北映晖春日永，  
光华复旦待行歌。

归思（回文迭韵）七律二首

又序：抄校心畬诗二百首，书怀方罢，吟兴犹浓，藉迭韵之回文，寄遥年之归思。

迷烟远绕路遥遥，  
久梦归家思寂寥。  
啼雁宿沙平浅水，  
遏云停棹系横桥。  
凄凄雨落花倾泪，  
拂拂风轻柳舞腰。  
西照夕晖余淡淡，  
溪清爽岸对歌谣。

迷雾晓天海路遥，  
客留还梦若寥寥。  
啼莺乱拂红桃岸，  
舞燕轻盈绿柳桥。  
凄雨秋寒霜带鬓，  
拂云春气剑横腰。  
西东庆乐丰年岁，  
溪接江村满咏谣。

以上四诗，回环咏诵，诗情画意更深更美，字行里间，无不表达他的爱国怀乡、深念慈母恩情而思归不得的感叹。

1993年，谢氏第二次回乡，亲朋故旧索字留念，他又先后书寄回文联百余副，寄情翰墨，经慰乡思。至于他的《回文百联集》的出版问世，还有一点特别的社会意义。

1994年，甄雅堂主人刘国基、吴世芬伉俪谈到慈济功德会在济贫、医疗、文化、教育诸方面、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却引起他用百首回文联义展，以捐助慈济功德会的想法，并得社会各界一致赞同。于是定于3月1日至27日，在甄雅堂画廊举行回文联义展，所得义卖之款除装裱、印刷必要费用外，余款以甄雅堂与谢鸿轩两人名义捐赠给慈济功德会。凡参与义展慷慨捐输者，除得到一副行将失传的回文联外，更重要的是远在各地的灾民，能够感受到世人的一份爱心。义展以后，《谢鸿轩教授回文百联集》由海峡两岸工商文化协进会、慈济功德会等单位策划，由甄雅堂艺术有限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流传海内外。

笔者有幸在俞步老府上读到此集，爱不释手，特撰联以记之。联曰：“千联斋主藏清韵；百对回文尽雅声。”祝愿谢氏在两岸文化交流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舒元璋）

# 琦善所为的另一面

● 李文林

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是民族英雄，琦善则因妥协主和成为千古罪人，这已是铁打的历史事实，不过，细审之，琦善之罪过，只是在七八个月的两广总督任上犯下的，实难概括其一生的功过。琦善的其他行事是怎样的，特别是同时代的人对他一生的评价是怎样的呢？近日偶翻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有一些关于琦善的记载，虽文字数量不算很多，却是极具分量的，读后令人为之怔。无疑，这些记载是全面了解琦善其人的重要资料。

按《见闻录》所记，琦善是一个材全能钜的非凡人物，是国家难得的栋梁之材，甚至说他是“一代伟人”。在此，不妨就书中所记摘抄一些如下。

“闻琦相薨逝（琦善死于1854年——笔者）信，不胜知己之感。琦相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刑名钺谷、吏治营务，无不谙熟；究研孙吴兵书，手不释卷；延接属员，管教子弟，意在从严；摺奏不假他人手，诸事得体，而笔意简洁可法。在刑部时，佩七司印钥，纵（综）办秋审者多年，有白面包龙图之号。及膺外吏而兼圻也，未尝不徇情，然必于理不悖，始肯顺水推舟，断不為人择地，贻害地方；未尝不要钱，然必审度其人，实是可以造就，公事结实可靠，方肯收受，从未曾藉事恐吓，以贿完结，更不肯卖缺取财，择肥而嗜……余与琦相素不相识，升任蜀臬，道经保定，讷相（讷尔经额，满洲正白旗人，官至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

笔者）谓余曰：‘琦相无事不可为法，足下此去，幸得良师。’……及抵蜀，相见恨晚，誉之不绝口。后余升任黔藩，调任甘肃，复与公同事。番案被议，同人网罗……番案剿捕，琦相毫无错误，谗间者构成怨狱，倾陷而欲杀之……琦相一代伟人也，其受侮群小，实足彰具大节，如秦桧之陷岳飞，韩侂胄之陷赵汝愚，章惇之陷东坡先生，蔡京等罗织党人，千古名臣，每遭谗谤，而转瞬云开雾释，日光月华，与正人君子丝毫不玷，而小人遂为千秋唾骂。余系弩材，何幸窃附公后，得以同遭斥辱，流芳青史……公薨后，余极怆然，非痛公之未登大耋，乃叹国家栋折榱崩耳！崇雨舛（崇恩，号雨舛，满洲正红旗人，官至山东巡抚——笔者）曰：‘如琦相者，我国家数十年来，仅此一人，公乃溘逝，圻壤其无人矣！’”

张集馨字椒云，别号时晴斋主人，翰林出身，擅长文墨，著有《时晴斋诗赋全集》与《十三经音义字辨》。1836年以后的30年间，张在山西、陕西、四川、甘肃等省任过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等职。从1845年到1850年的六年间，他先任陕西督粮道，其时，林则徐为陕西巡抚，以后，他先后擢升四川按察使、甘肃布政使，适值琦善任四川总督、陕甘总督。看来，张集馨既作过林则徐的下属，也作过琦善的下属，且同为二人所赏识。《见闻录》是张集馨的一部自叙年谱，其主要内容是他任外官时对所经历的事和接触的人的记述，他生前没有为年谱取名，在他死后的一百多年间，年谱一

直以抄本流传，直到1981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由丁名楠作《序》。丁《序》谓，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广泛，尤对官场鬼域情形，刻画入微，故“编者将这部年谱取名为《道咸宦海见闻录》”，“我们认为其叙事基本上是可信的”。

那么，以上所摘引的张集馨对琦善的赞誉之辞是否基本可信呢？笔者是持肯定意见的。首先，这些赞誉之辞写在琦善已死之后，而不是写在琦善未死之前。更重要的是，它出自作者的自叙年谱之中，并非出自作者致琦善的函札之内，更不是为琦善撰碑志，或作寿序，故不应视为谀辞。其次，从以上摘引的文字中，还可以看出，不仅张集馨一人那样极赞琦善，讷尔经额和崇雨舛对琦善也极尽推崇。

另外，《见闻录》不仅记有对琦善的赞誉，同时还有关于琦善为人高傲，难与人共事等致命缺点的记述，如说琦善“惟性气高傲，不欲下人，才具素长，睥睨一切，当世名公巨卿鲜有人其目者，词气亢厉，令人难堪，故朝臣毁多誉少；又遇事接物，多用权数（术），不能开诚布公，是其疵类。”《见闻录》中还记有讷尔经额对琦善的全面评鉴：“琦中堂刑名、钱谷、例案、营制、兵法为近公第一人，我领教多矣；特其性情不能和平，为此公缺陷也。”张集馨这样不为尊者讳，将琦善的弱点、缺点亦于记载的直抒之笔，是与他为琦善的赞誉之辞相一致的。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清康熙、雍正年间，湖南省攸县发生一起虚捏垦荒案，历时45年，先后钦勘6次，受牵连革职的知府、县令4人，老百姓长期遭受沉重赋税痛苦。《攸县志》乾隆版的《回春录》，对此案作了详细叙述。

清康熙三十年，攸县县令吴光豫在清丈土地时，发现实际耕地与明末额载地差距甚大，捏造无图荒册抵敷，以为清丈邀功。虚垦案由此开始。

康熙五十三年，钦差来攸县勘荒，县令高攀嵩不察荒额虚实，凭前任荒册数，除积年已垦外，将存荒地2399顷捏造为老百姓实垦，造具虚名册上报。清政府据此数要攸县六年后升科征税。

康熙五十八年，浙江天台人陈溥来任攸县令，面临升科征税，清丈全县熟荒仅800顷，与前任认垦数差1599顷，为敷衍全额开垦征税，竟以“一亩实垦之熟，抵三亩无图之荒”，攸县人民从此背上三倍虚假垦荒的重税。

康熙六十年，攸县生员谭金声以“认垦虽定，荒累难堪”事泣呈县令陈溥向省直至中央报告。当时的湖南巡抚、长沙知府对攸县垦荒事有所了解，以攸县“田土瘠薄办赋唯难”的理由向上申报。

雍正三年，敕部议复“攸县果有不能升复原则之处”，要求详查分别造册上报，并指令醴陵县令邵元龙来攸县会勘。经“核实”，已垦数与康熙五十八年所勘无异。谭金声复以“垦额不能全敷，科则不堪再复”为题，呈请全免无图荒册税额。谁料湖南巡抚以“恐干部议”名，将攸县虚垦地以瘠薄例上报。会勘无济于事。

雍正四年，中央政府驳回湖南以瘠薄例报告，钦派杨道宪“临攸查勘，量为酌复”。谭金声闻讯后，又以“实垦则难再复，虚垦则无可复”为题，请求立即颁文。不料触怒杨道宪及随勘铁、

赵二令，非但不将攸县颁丈苦情上报，反而以“官民通同作弊欺隐”罪，将知府沈世屏以及攸县县令肖师谔、陈文言革职查办，陈溥挂误解职，生员谭金声连同被黜。导演了一出杀鸡儆猴的闹剧，“临攸查勘”，不了了之。

雍正五年，皇帝“恩允部议”拣选贤员，令将攸县熟荒秉公清丈，岂知地方官与勘丈官“计图苟免，仍肆虚捏”，在清丈未抛荒地和熟地时，捏增弓步，又捏造民庐民墓占地，凑足原额，玩弄新花样，归结丈案，使虚捏合法化。遂于雍正七年，正式实行“摊丁入亩”赋制。

乾隆登基，有感于“各省申报开垦者，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现在地亩之中”，敕令各省将丈量一事永行禁止。谭金声于乾隆元年将虚捏垦案写成三千字的《回春录》，并粘贴历详卷宗呈太子太保题请开除。至此，声震全国的攸县虚捏案才告一段落。

纵览虚捏案，初起于前令吴光豫好大喜功；继成于高攀嵩弄虚作假；终深于陈溥隐瞒实情，一令接一令，虚捏“接力”，酿成老百姓深重灾难。勘丈官贪赃枉法，所谓钦勘，形同虚设。

一介书生谭金声，以合邑公事被黜，虽在不久“幸蒙恩宥”，事洗得泽并敕赠“文行孝义”匾额，但终未获复用。年近七旬，仍以全县人民利益为重，冒命请疏，实属难得。全县人民嘉其义举，将其事迹写入县志，留得身

后美名。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号称康乾盛世的时代有这种事，当今的虚假之风也屡禁不止，巧立名目加重人民负担之事仍时有发生。重温一段史事，于今于世杜绝假大空，减轻人民负担，是很有教益和启迪的。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虚捏垦荒案 清初一震惊全国的

● 谭特立

# 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 (总第七十二期)



南开大学元老黄钰生教授晚年身影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钱光宣(左)和他的哥哥钱正

炎黄春秋 (总第七十二期)

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争论  
为恩师黄钰生教授错案平反奔走  
公审南京大屠杀罪魁谷寿夫目击记  
项南之父的传奇生涯  
蒋百里与他的“五朵金花”  
项英遇难调查实录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